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 关于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总结和思考
- 关于口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试探无终
- 北齐长城调查小记

1

2006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中央领导和市领导出席 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幕仪式

12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委员陈至立，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及专家任继愈、傅熹年同志，市领导龙新民、孙政才、赵凤山、张茅、刘志华、韩汝琦同志以及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幕仪式。仪式由龙新民同志主持，王岐山、郑欣淼、傅熹年同志分别致辞，贾庆林、刘淇、陈至立、任继愈同志为首博新馆揭幕。

仪式结束后，领导同志参观了首博新馆“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古代瓷器艺术精品”、“佛教造像艺术精品”、“古代玉器艺术精品”、“古代青铜艺术精品”、“古代书法艺术精品”、“古代绘画艺术精品”等展览。北京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随行汇报。

(图文由市文物局办公室、首都博物馆信息中心提供)



贾庆林、刘淇、陈至立、任继愈同志为首博新馆揭幕



梅宁华局长陪同贾庆林、刘淇、陈至立参观展览



贾庆林、刘淇、陈至立同志参观“佛教造像艺术精品”展览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南正遗址 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涉及北京段全长80公里，穿过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惠南庄、长沟镇、韩村河镇、城关镇、周口店镇、青龙湖镇和丰台王佐乡等。输水管线之下分布有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



南正遗址第二发掘区现场（北至南）

(彩二)

为做好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的管线埋藏区文物保护工作，受北京市文物局委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及房山区文物管理所对管线沿线进行勘探。沿线文物勘探工作始于2005年7月15日，至11月结束时共完成勘探面积272万平方米，发现古墓葬102座，不同时期遗址15处。

勘探结束后，南水北调考古队先对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北的南正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为勘探工程中新增的文物地点，涉及南水北

调工程北京段管线 HD6+900~HD7+092-172。根据输水管线的分布情况及遗址的地形特点，将南正遗址发掘区自西向东分为三个大区，分别以 I、II、III 表示。自 2005 年 11 月 28 日起对该遗址的 I、II 区进行发掘，至 2006 年 1 月 10 日第一阶段工作结束时，I 区共完成发掘面积约 1805 平方米；II 区完成发掘面积约 1000 平方米。

在 I 区发现汉代墓葬 3 座、窑址 2 座、灰沟 1 条。II 区发现汉代墓葬 8 座。在上述两区墓葬及地层中，清理了陶器、铜器、石器等遗物，并出土有大量的五铢钱及货泉铜钱。

11 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砖室墓，均为东西向。均不同程度的被盗掘。墓葬由墓道、墓门、墓室、甬道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由于墓主人的等级、身份不同，墓葬分为形制不同的几种类型。有单室墓 5 座，双室墓 3 座，多室墓 3 座。双室墓分为前室、后室；多室墓分为前室、后室、耳室（有的还有中室）。部分墓有券顶、棺床或器物台等。墓砖分为泥质青灰色、泥质红色两种。其形状均为长方形，多为素面，少数在其上饰粗绳纹，个别墓的墓门砖两端饰对称三角纹夹乳钉纹。墓室砖的砌法多采用底部先错缝平砌两层横向平砖，然后横立砖砌一层的砌砖方法。各室的铺地砖处于一个平面，铺法有一纵一横或二纵二横



M7 墓室



高空气球摄影



南正遗址第一发掘区工作现场

相间。墓壁起于铺地砖之上。大部分墓门为拱顶，单券或双券。葬具皆已腐朽无存，部分墓残有棺床痕迹。骨架保存状况较差，大部分已不存。

出土的陶器分为实用陶器及模型明器(俑)两大类。实用陶器有罐、瓮、釜、器盖等，以夹云母红陶、灰陶等占绝对多数。模型明器有仓、井、灶、动物及人塑等，分为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三种。铜器出土有镜、剑、带钩等。铜镜镜表呈深绿色，半球形钮，柿蒂座，内区为八内向连弧纹。上可识铸有“长宜子孙”4字。

由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析，可推断墓葬属东汉时期。目前，对南正遗址Ⅲ区的发掘，仍在继续之中。相信随着工作的进展会有更大的收获。

南正遗址的出土文物，是解决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编年的重要资料。此次发掘，为研究北京(特别是南部地区)汉代墓葬习俗、文化内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遗址所清理的陶窑，对了解汉代的制陶工艺、生产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文：郭京宁 孙劭 陈亚洲)



M2 出土铜镜



M12 出土铜剑

(彩四)



M10 出土遗物

北京文博

样初题

目 录

2006 年第 1 期(总 43 期)

文物工作

- 关于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总结和思考 梅宁华 (5)
- 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首都城市功能的展示与延续
——总体规划修编后对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探讨之二 孔繁峙 (10)
- 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工作总结及 2006 年工作要点 (15)
- 关于口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李 萍 (20)

博物馆学

- 浅谈博物馆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教育方法的创新 周正义 (23)
- 浅议现行博物馆管理体制对我市文博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 ... 李学军 (26)

文物研究

- 房山镇江营西周卜骨与《焦氏易林》 连劭名 (31)
- 试说北京现存转轮藏的宗教文化 李 妍 (33)
- 浅谈法海寺曼陀罗的深刻内涵 苗天娥 (39)
- 清代龙袍的十二章纹饰 孙秋霞 (45)
- 清代恭王府花园名称考略 张 军 (49)

北京史地

- 试探无终 韩嘉谷 (53)
- 北齐长城调查小记 岳升阳 (61)
- 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 陈 康 (65)
- 试论五代前期幽州的军事与战争 郝志群、王新迎 (71)
- 明熹宗天启六年地震新考 于德源 (79)
- 琉璃河桥维修纪略 孔庆普 (84)
- 清末民国国家体制的转型与北京寺庙历史变迁
——以北京外城西部寺庙为例 何岩巍 (89)
- 吴佩孚与故宫三大殿 张小林 (93)

资料信息

- 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杨康明 (96)

封面: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

封底:北京法海寺藻井

封二、彩插一:中央领导和市领导出席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幕仪式

彩插二、三、四: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南正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封三: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续五)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任:宿白 副主任:梅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刘超英 张 展 张增光 宋大川
陈 平 陈 旭 赵其昌 侯 明 晋宏逵 徐 伟 徐 明 高凯军 舒小峰
韩 永 韩 扬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钺

主 编:张 展 副主编: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韩建识

本期责编:陈晓苏 韩建识 陈 倩 美术编辑:宋世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1, 2006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 Sum-up and Reflection on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apital Museum by Mei Ninghua (5)
- Exhibition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 Urban Function in Protection for Famous Historical City Beijing—the Second Discussion on Protection for Famous Historical Cultural City Beijing after Compilation of *Collectivity Programming* by Kong Fanzhi (10)
- 2005 Sum-up and 2006 Outline of Work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15)
- Opinions on Importance of Rescuing Oral Cultural Heritage by Li Ping (20)

MUSEOLOGY

- On Opinion Change and Method Innovation in Museum Education by Zhou Zhengyi (23)
- Influence on Beijing's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Work by Pres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Museum and Countermeasures by Li Xuejun (26)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 Divination Bone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Zhenjiangying of Fangshan and the Book of *Jiaoshiyilin* by Lian Shaoming (31)
- On Religion Culture of Present Dharmacakra – pravartana – sūtra in Beijing by Li Yan (33)
-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Mandala in Fahai Temple by Miao Tiane (39)

Twelve Zhang Patterns in Imperial Robe of Qing Dynasty

..... by Sun Qiuxia (45)

A Brief Study of Name of Prince Gong's Mansion Garden of Qing

Dynasty by Zhang Jun (49)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Tentative Research of the Wuzhong by Han Jiagu (53)

Investigation Notes of the Great Wall of Northern Qi

..... by Yue Shengyang (61)

Opinion on Li and Fang, Helmet and Village in Youzhou and Ji

City of Tang Dynasty by Chen Kang (65)

On Military Affairs and Wars of Youzhou in the Early Five Dy-

namies by Xi Zhiqun and Wang Xinying (71)

New Study of Earthquake in Tianqi 6 of Emperor Mingxizong

..... by Yu Deyuan (79)

A Brief Account on Maintenance of Liulihe Bridge

..... by Kong Qingpu (84)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ystem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

public of China and Vicissitude of History of Temples in Bei-

jing—A Case Study of Temples in West Outer City of Beijing

..... by He Yanwei (89)

Wu Peifu and the Three Great Ceremonial Halls of the Forbidden

City by Zhang Xiaolin (93)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4th

Quarter of 2005) by Yang Kangming (96)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ü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 – chairmen: Mei Ninghua,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hi, Qi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xiu,

Wang Danjiang, Kong Fanzhi,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Zhang Zhan,

Zhang Ze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Zhao Qichang,

Hou ming, Jin Hongkui, Xu Wei, Xu

Ming, Gao Kaijun, Shu Xiaofeng,

Han Yong, Han Ya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Vice-Editor-in-chief: Chen Xiaosu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

ment: 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Han Jianshi, Chen Qian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

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 www. bjmuse-
umnet. org](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 –

mail: bjwb1995 @ yahoo.

com. cn

关于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 总结和思考

梅宁华

2005年12月16日,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作为北京市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工程——首都博物馆新馆(以下简称首博新馆),正式开始试运行接待观众。

从1981年首都博物馆安家于文物古迹孔庙内开始,建设一座与北京“文化中心”、“国际化大都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相称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一直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过问和关怀下,1999年北京市文物局的立项申请得到批准,2001年,经国家发改委报国务院批准实施,首博新馆工程前期工作全面展开。2001年3月,市政府成立了首博新馆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首博新馆项目办公室及首博新馆建设业主委员会。基建工程是由北京市建工集团于2001年12月动工兴建。首博新馆历时4年建设,终于在2005年底正式建成并试运营。

在首博新馆建设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也使我们对如何建设博物馆有了新

的认识,对它们加以总结和思考,必将促进今后工作的开展。

一、对首都博物馆特性的认识

首都博物馆在确定设计招标前和建设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代表北京乃至全国最高水平的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从内容到风格,从建筑外型到内部展览,应具有什么样的特性?经过这几年的思考、探索和实践,我们终于可以交出一个答卷,供社会各界来审阅。

1. 经典的建筑

首都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以文物为本,为社会服务”,强调“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代、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首都博物馆设计方案,是经过两轮国际招标,从16家中外知名建筑设计机构

提交的22个设计方案中选出的。博物馆建筑落成后,已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一致称赞。新馆建筑用地2.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3390平方米,建筑高度40米,地上五层、地下两层。建筑本身是一座融古典美与现代美于一体的建筑艺术精品,既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呈现鲜明的现代感。如:外观外倾斜的青铜体破墙而出,悬挑的大屋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出檐,青灰色砖墙模糊了古城墙与现代幕墙的界线。宽阔的广场和殿堂也取材于皇家宫殿高台建筑的手法。在博物馆中轴线上,大厅外地面镶嵌清代丹陛,大厅内有明代牌楼,体现中国传统中心轴线特点。在建筑材质上,青铜、木质与砖石的大量运用更显现一种历史的久远;钢结构棚顶、玻璃幕墙又表现出北京有力的时代步伐,高大的空间和通透的视觉效果更顺应了当代建筑的国际流行趋势。

新馆建筑内部分为三栋独立的建筑,即:矩形展厅、椭圆形专题展厅、条形的办公和科研楼。三者之间的空隙则为中央大厅和室内竹林庭院。自然光的利用、古朴的中式牌楼、下沉式的翠竹庭院、潺潺的流水,营造了一个兼具人文、自然的环境。

2. 完善的功能

首博新馆不仅是一座重要的文化设施,

同时也是北京地区文物保护、文物研究,面向公众和广大青少年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历史及科学知识的基地,还是北京市举办礼仪和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人民群众旅游和休闲的理想去处。中央大厅面积2000余平方米、高达34米,是举办重大礼仪活动和大型文化活动的理想场所。3000余平方米的临时展厅将为国内、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提供一流的展示平台。近10000平方米的藏品库将容纳25万件文物,10吨载重液压大型电梯,可使汽车直接驶入地下文物库房。新馆还配备了完善的接待、多媒体导览、观众互动项目、文化活动、餐饮、纪念品商店等服务体系,体现了当今博物馆功能多元化、服务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多功能会议厅具有多语种同声传译、数字电影播放、会议表决系统、会议厅专用网站等国内最先进的设施;数字放映厅可播放高清晰数字影片。

3. 丰富的展览

新馆的展览陈列以首都博物馆历年收藏和北京地区的出土文物为基本素材,吸收北京历史、文物、考古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国内外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形成独具北京特色的现代化展陈。新馆展陈由基本陈列、馆藏精品展览和临时展览三大部分组成,共计11个展览,上展文物5000



余件。基本陈列——“古都北京”(包括“历史文化篇”和“城建篇”)反映了北京历史发展脉络;“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展示了清末老北京的风情、民俗。精品展包括了“燕地青铜器艺术精品展”、“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古代玉器艺术精品展”、“古代书法艺术精品展”、“古代绘画艺术精品展”、“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和“书房珍玩展”等7个专题陈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北京地区有代表性的文物珍品。

另外,在展览的艺术形式方面,首博新馆力求运用全新的设计理念,营造不同类别的陈列氛围,具备形式上的亲和力、趣味性、互动性,做到雅俗共赏。其中,“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以大型场景为“内核”,“内圈”北京文物展览为“主干”,“外圈”外国历史文化为“辅助”,其形式为国内首创,与国际展览发展潮流一致,已赢得博物馆界专家赞誉。

4. 先进的技术

收藏、展示、研究是博物馆三大主要任务,首博新馆充分吸纳和采用了当今世界博物馆建设的先进技术,在这三方面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准。在藏品保护方面,新馆采用恒温恒湿的智能化空调系统。在展陈方面,广泛使用信息化多媒体技术等新的展陈理念和手段,打破了以往展陈教科书式的乏味与单调。例如:由三维多媒体技术建立的虚拟陈列系统,使展览现场在时间上得到拓展,观众可以在电脑上用虚拟方式自由地查询、浏览博物馆以前举办过的各类陈列展览。在研究方面,引进成套先进的文物保护和修复设备,利用高科技手段全面提高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水平,使首都博物馆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

绿色环保、智能化和数字化也是首博新馆技术方面的三大特点,并处于全国博物馆中的领先地位。其中首博新馆采用了太阳能发电板,是国内第一家采用太阳能电源的博物馆和文化场馆。馆内绿化实现

了自动微灌控制,也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首博新馆还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基于博物馆各专业子系统基础之上的服务于全馆各部门及观众的综合信息平台。

5. 优质的服务

新馆配备有完善的服务设施。首先在各大门处、大厅安装有参观导览系统。售票验票系统能够自动地接受多种硬币、纸币,观众同一天内允许多次出入参观博物馆。馆内有讲解员无偿讲解,并出租内存8种语言的语音导览设备,另有8种语言的免费宣传材料供观众索取。展陈区留有充足的观众休息空间及全面介绍博物馆展陈内容的观众视听室、播音室、电化教育室、观众参与室、文化教育等休闲、服务性空间。作为国内博物馆界的一项新尝试,首博新馆准备实行博物馆会员制,为会员们提供专门的文物鉴赏、研究等方面的高质量服务。馆内还提供物品自动寄存、邮筒、ATM自动柜员机及周全的残疾人服务设施,细微之处备显人文关怀。

由于首博是“三边工程”(边设计、边施工、边布展),首博新馆的这些特性,并不是谁凭空想出来的,许多方面在设计之初并没有完整的概念。现有成果的取得,全是参与建设的各方人员,不断摸索和完善的結果,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对首都博物馆建设的认识与思考

从1999年首都博物馆立项得到批准到开馆试运行,已历时6年,其中产生的许多思考与认识值得留给后人借鉴。

1. 业主委员会运作方式的经验与不足

2001年3月,市政府成立了首博新馆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首博新馆项目办公室及首博新馆建设业主委员会具体负责博物馆的基本建设工作。在新馆基建过程中,业主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了建设

甲方的任务。所取得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利于工程管理。业主委员会主要由建筑业的专业人士组成,对建筑工程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和工程质量,并有效控制了工程造价;二是保证了工程操作规范、公开透明。首博新馆是阳光工程,所有项目全部招投标,按有关法规执行,招投标项目超过百项。在如此大的项目中,由于操作规范,未出现投诉,并且博物馆人员不参与工程建设,保证了博物馆人员在工程建设中没有腐败现象;三是责任明确。业主委员会对建设工程负有法定责任,避免了推委、扯皮,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业主委员会运作方式也存在不足:一是业主委员会中博物馆专业人员不足,对博物馆今后使用要求了解不够,使得建筑在一些细节上存在缺陷;二是由于业主委员会是临时机构,建设过程中博物馆工作人员介入不充分,使博物馆业务人员对建筑如何使用和管理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影响功能的开发。经过4年的基建实践,我们认为,今后开展大型文化设施建设,搞好基建工程的关键是要有一个高水平的施工总包单位,通过合同方式明确建设内容和责任,特别是做好前期工作,完善方案,就可以不必再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而为国家节约大量经费。

2. 博物馆工作人员应尽早介入工程建设

首博新馆在基建过程中,博物馆业务人员大多一直未直接参与甲方工作,造成了一些遗留问题。一是设计人员和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博物馆业务的特性,使得建筑本身存在了一些不足。例如:个别展陈空间安排不科学、没有无障碍通道,部分展厅观众的通道不是很便捷,自动扶梯和通道端口的两侧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展览的布置和建筑装饰有交叉的工程,如果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基建早期介入,可以为布展提前做好准备,为后期施工减少矛盾。

3. 要有突出地方文化特色的展览

一个城市的地志性博物馆,既要展示精美的文物,又必须要有反映自身历史和文化特色的展览。按以往其它国家和省市的经验,都是制作一个通史展览。但是,我们经过多方考察和论证后认识到,通史展览并不是十分受观众欢迎,而北京作为五朝古都,最有特点的是城市发展进程和老北京的民俗。由此,首博新馆在展览内容上大胆改革,重点突出北京文化特色。首先将一般的通史展览改进为“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和“古都北京·城市发展篇”两个部分,以北京地域文化和城市建设的成长发展过程代替北京历史。另外,基本陈列增加“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展览通过北京一家人的生活习俗,展示北京文化的魅力,展示老北京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京剧是形成于北京的“国粹”,民俗展区专门建造一座仿古戏楼,制作了京剧文物展。人们参观展览之后,还可品茶听戏。

这些展览的制作,使北京地区的观众有了强烈的亲切感,使外地和外省市的观众可以充分体验北京文化的魅力、城市的魅力,深入了解老北京人的生活细节。

4. 文化工程建设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目前,北京地区有多座博物馆由于当初建设时没有前瞻性又要新建。例如,中国科技馆于1988年建成一期工程,十年后由于面积问题又于1998年建成二期,一期的大部分展览移入二期内,现在二期展馆又出现面积狭小问题,又要在奥运村内重建中国科技馆。在1990年亚运会时建成的中国体育博物馆,现在由于面积和设施等问题,也不能满足观众需求,也要在奥运村重新建设。而50年代建设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则于去年完成扩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都将在近年内扩建。作为北京市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工程之一的首博新馆,在设计之初和建设过程中,一直

存在着是不是面积过大、现代化程度过高的疑问。经过我们的思考和预测认为,首博新馆整体建筑和功能设置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今后若干年内,仍可位于国内一流水平。我们认为,文化工程的建设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北京作为我国的“文化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和旅游的繁荣是必然的,国际化文化交往也必然增多,作为北京市所属最主要的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发展空间。

三、对首都博物馆 今后发展的思考

2005年12月19日首博新馆正式开幕试运行。这样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博物馆今后如何发展、如何发挥它的作用,是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1. 要有一流的管理

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馆,若要保证其正常运转并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发挥其应有作用,一流的管理是关键。首博新馆在博物馆硬件管理方面,要实行社会化、专业化。物业管理由专业的物业公司来负责,保安由武警和保安公司来承担,餐饮、纪念品的经营由具有较强实力和知名品牌的专业化公司经营。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优势节约了馆内人力资源,保证了运营质量。首博新馆在人员管理方面实行全员聘任制,人员可上可下、可进可出,人尽其用,保证人力资源的活力,并打破了传统文化单位的“铁饭碗”和“大锅饭”现象。在经费管理方面,实施计划预算管理制度和使用审核制度。保证每个项目在使用经费前要有科学的论证,使用后要对其发挥的效益进行论证。

2. 与国际接轨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馆,首博

新馆今后要在多方面与国际接轨。例如,在展览的内容选择上,要放眼世界,要以展示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为己任。在展览的运作方式上,从策划至展出要与国际先进博物馆运作方式相一致,也只有这样才能被国际接受。在科研方面,我们也要主动与国外博物馆和科研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在服务方式方面,也要向国际大型博物馆看齐。目前,国际上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都有6到12种语言的免费宣传材料,首博新馆现已做到的拥有8种语言的免费宣传材料。同时,在无障碍设施建设、人性化服务方面,新首博都要向国际一流博物馆看齐。

3. 要努力发挥多种功能

设施先进、功能完善是首博新馆的一大特点。所以在新馆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努力发挥其多种功能。例如:要充分利用首博数字化设备,力争建设起“北京数字博物馆”,通过网络向全世界展示北京传统文化魄力;要充分利用新馆礼仪大厅、多功能厅,为各种机构和企业举办会议、庆典活动提供服务;要利用新馆整体优势,为首都旅游事业做出贡献,成为国内外旅游热点;要利用首博人才和文物的优势,配合大中小学开展校外教育工作。总之,首博新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举办展览供人们参观的博物馆,而是要在多方面融入人们的生活,并最终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届时又将对首博新馆的一个考验,通过近三年的运营和调整,相信首博新馆会以最佳状态展示中国文化、北京文化,受到中外观众的喜爱。我们要不断改革创新、开拓进取,把首都博物馆建设成为与首都地位相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博物馆。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 首都城市功能的展示与延续

——总体规划修编后对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探讨之二

孔繁峙

国务院在对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进一步明确了北京城市长远发展的目标和今后的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在新形势下“要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强化首都职能,突出首都特色……”。对首都城市的总体建设与发展,着重强调“中心城市的建设,要以调整功能,改善环境为主,限制建设规模”,以促进和实现首都城市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对新形势下的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与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是当前时代发展所面临的两大艰巨任务,面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未来,怎样看待北京历史名城中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存在与发展,如何协调首都城市的建设与历史城市保护的关系,并以新的发展思路解决今后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推动首都建设与名城保护的“和谐”发展,这是当前全市落实新的总体规划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首都城市建设与历史名城保护的历史矛盾及变化

自20世纪50年代北京首都城市的确立,即产生了为社会关注的历史城市的保护与现代首都建设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发展的时代进程,围绕着北京城的保护与建设、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相互撞击也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社会上如何看待北京旧城的保护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客观地说,对历史城市和传统文化的如何看待和评价应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在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待历史城市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在处理首都城市建设和古都城市保护的关系及矛盾时,则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如50年代以后在思想政治领域开展的“反右”运动,加速了北京城墙的拆除;“文革”中的“破四旧”,更使北京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经历了一场浩劫;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思想解放”,又使全城出现了一批新的仿古建筑等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北京古都城市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确曾出现过否定和过多肯定的现象,使我们在古都城市与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沉痛的认识过程。

当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北京这座古都城市获得了新生,但随之开展的新北京选址问题的大讨论,产生了古都城市的保护与新首都城市建设关系之间不同观点的争论。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下,社会上普遍认为,经数百年形成的北京旧城与新北京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认为,旧的北京城是封建帝王统治的象征,是封建历史的糟粕;旧的城市妨碍了新北京的建设,影响了人们的新生活。因此认为,建设新北京就必须拆除历史上的旧城。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自建国以来开展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拆除历史建筑为前提

的。因此,当初首都城市兴建的各种政治、文化设施、市政道路等现代建筑,大多对古都的传统建筑和整体风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影响。应当承认,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预见到的,就如同当年拆城墙时不可能意识到会对以后历史名城保护造成怎样的损害是一样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全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才普遍开始对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引起关注。1982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保护历史名城的要求并将北京古都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首,北京古城开始步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轨道,保护历史名城的社会观念也逐步形成。近年来,首都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了城市更新、城市开发及旧城危房改造的步伐,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对历史名城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北京传统城市的社会舆论已日渐高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实施多中心与新城发展战略,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将历史名城保护摆在首都城市建设工作的首要位置。今后,历史名城保护将成为旧城内的首要工作。但对此社会上又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首都城市在旧城内的存在和建设,必将影响历史名城的保护,甚至认为,旧城内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存在,就无法实施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等等,使北京长期存在的建设与保护之间矛盾的从属位置,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二、首都城市建筑在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中文化性质的认定

长期以来,在对首都城市建设发展与历史名城保护的认识上,我们多是沿袭了建国初期因首都行政中心的建立而破坏古都城市的传统观点,此后,又多侧重于矛盾双方的对立性,从而形成两者之间矛盾绝对化的观念。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十分明确地将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要求构建一个融传统保护与现代建设为一体的、和谐发展的新型城市结构,从而使我们观察和认识首都城市建设与历史名城保护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观察视角更为宽广。采取这种将首都城市的建立置于我国民族历史与未来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考察研究的方式,反思建国以来首都城市的建设进程及其历史意义,不难看出,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岁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本身和当年象征全国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建筑,已具有了历史名城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超越时代空间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中华民族在人类发展的20世纪上半叶,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终于推翻了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被压迫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步入伟大复兴之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北京古都被确立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不但使古都城市从此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具有永久纪念的意义,而且从一个历史城市延续发展的角度观察,当年新中国的首都建筑,应视为今后北京历史名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首都城市的确立与发展是古都城

市历史功能的延续。早在辽金时代,北京就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从元代开始,北京城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已发展成为全国各民族文化精华的荟萃之地。再经明、清两代的继续营建,城市建设达到了历史顶峰,从而发展成为我国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古都城市。在进入人类的20世纪中期后,历史的发展再次确立了北京这座千年古都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现代文化汇集发展之地,实现了我国古都历史文化与首都现代文化在都城地域上的延续,使古都城市的历史功能在新的历史时代得以继续发展。

首都现代化的发展是民族历史优秀文化的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同几千年社会文明史的发展演化同步形成的。北京古都传统文化,更是高度汇集了我 国历代特别是元、明、清以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其内容丰富而广泛,涉及到历史名城的各个领域。其特点是随着朝代的更叠与时代的发展步伐而不断地继承、更新、发展,并在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著名的建筑、艺术、教育、文化和传统民俗等优秀内容,经过历史的“沉淀”及有批判地吸收继承,现已发展成为首都现代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不断深刻影响着首都现代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很多超越时代

与地域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传统理念,在当今的民族之间发挥着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意义。

三、首都城市建设在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中的定位

长期以来,我们对古都保护与首都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采用以往传统的认识模式,即首都“行政中心”的建设对古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但却往往忽视了在当今已经历半个世纪的历史岁月后,当初的首都城市建筑已从以往那特定的时代,发展成为不变的历史,当年体现建国初期的首都城市建筑,都从不同方面承载了中华民族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首都城市的整体变化与发展,使得最初形成的古城保护与建设的矛盾,也在逐步发生某些质的变化。从传统文化的意义讲,北京历史名城的形成,渊源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如果按照某些观点,将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范围,仅限定在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历史建筑,而将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后出现在古都内的各类近代风格的建筑排除在保护之外,那北京历史名城不就成了—座终止发展的古代城市“遗址”了吗?如不保护具有时代发展意义的城市建筑,那么若干年以后,北京历史名城就会出现城市发展史的“空白”期,而在今后形成的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新中国首都城市的这段民族复兴的历史及其发展变化,又如何在北京历史名城中得以体现呢?回顾北京历史名城本身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历史上的北京城市自产生之日以来的数千年间,各个时代都没有固守祖先的“历史”城池,而是不停地在汇集着每个时代的创造中得到不断地发展。元代更是在借鉴金中都城及我国历代都市建筑的基础上,才营造了著名的大都城。明

代又在大都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今日的皇城、故宫和内城,并经过不断的北缩南扩的发展,才最终形成北京城现有城市格局。而现存的元土城遗址、明皇城、北京内城、外城等城墙遗迹,就反映了北京历史名城建设、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能否只承认和保护最早的元代大都城,而否认和排除明、清以来北京城的发展变化及其保护价值呢?显然不能。当前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现实中的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进程及变化后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讲,建国后在北京旧城内最终确立并建成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发展与时代选择的必然结果,首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承继着历史与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今后的“历史”标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水平和创造能力。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在高度评价北京城建设成就时,将新中国首都城市的建立,比喻为北京古都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因此,我们可以说,北京历史名城的确立与保护,并不是北京名城历史的终结,而是在名城的保护与首都城市的发展中,促进名城历史的延续与名城传统文化的发展。毫无疑问,具有国



家民族与时代意义的首都城市的发展历史及建筑,应列为北京历史名城保护范围。

还应明确的是,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都城市列为历史名城保护的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在旧城内的一切建筑都具有保护价值,需要列入名城保护的,只是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具有代表意义的时代建筑,如天安门广场周边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以及民族文化宫、北京站等。特别是时至今日,人们在提及当年“十大建筑”时仍多是称赞有加,而且在当代社会对首都“十大建筑”的称呼似乎已成为一个特定的时代性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及民众对这一时期的首都建筑及其价值的认同。从保护的角度出发,今后应逐步将建国时期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首都城市建筑,确定和升级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建筑,采取文物保护管理措施,而对于建国后不同时期建造的没有保留意义的生产、生活等建筑设施,应按历史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采取改造、调整、拆除等不同措施。

妥善处理首都政治中心与古都历史文化中心的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是今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建国初期建成的以天安门及周边建筑为代表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坐落在古都历史文化中心区——昔日象征封建帝王统治中心的皇宫前院,二者构成了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两大中心依托联系的新的都市格局,昭示着首都城市的历史与现代和传统与发展,这是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核心区域,建议在今后深入落实所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工作中,将天安门广场周边区域的建设规划,调整为保护规划,应正式确立为新中国首都的政治中心保护区——即首都中心区,要从名城保护的角度保持和突出广场及周边建筑,如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建筑外立面的艺术特色和原有规划、建筑格局,保持这一区域内所形成的历史与现代相

联系并构成的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使两大中心区域的文化特色得以保护和延续。

同时还应看到,北京首都城市将成为一座快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功能仍面临继续发展的需要。但根据名城保护规划,新的发展与建设必须服从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旧城内新的建设将受到严格限制。为解决首都功能与历史名城保护的矛盾,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在旧城内划定出首都城市功能建设发展区域——即体现首都政治、文化功能的建筑,集中于长安街及延长线。从目前发展的现状看,长安街在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建设,已承载了首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功能的建筑。按照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所进行的战略调整,北京城市功能将逐步从集中走向分散,以缓解旧城中心区功能集中造成的诸多压力。现有旧城也将实现“整体保护”。首都政治、文化功能的完善和发展,则继续汇集于长安街及延长线,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完善、发展过程后,长安街延长线及建筑与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将共同承载和体现首都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功能,并在历史文化名城中构成共和国首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历史缩影。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的文明史中,北京文化名城发展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北京历史名城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又是北京历史名城发展中最为灿烂的一页。建国初期形成的首都城市及其代表性建筑,几乎蕴涵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大地上的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和国家兴旺发达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所有信息,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将产生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因此,建国初期形成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及其建筑,与北京古都城市一样,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保护价值。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工作总结 及 2006 年工作要点

2005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下,在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面的进步和突破性的发展。

一、2005 年工作总结

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新进展

去年 3 月份,市人大审议通过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这是北京市制定的首个全面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法规,对北京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意义重大。通过认真学习,市文物局明确了《保护条例》赋予文物行政部门的职责,确定了相关的管理程序和管理规定,统一了各区县的审批标准,为今后依法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管理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名城保护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同时,市文物局严格行政审批,依法控制和掌握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内的建设项目,有效地保护了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的环境。同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推进前门东侧路、三眼井、玉河等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试点工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四合院保护的思路,即:“既要积极探索维护古都风貌、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新方式、新方法,同时又不企求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而

是把当前和长远结合起来考虑。对于有争议的地方不轻易采取行动,等条件具备了再行处置。”

2. 文物修缮和保护重点工程顺利推进

列入今年市政府“实事”和折子工程的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佛香阁、北海琼岛古建群修缮工程相继启动,西什库教堂抢险修缮工程已经完成。列入市政府《“人文奥运”倒排期折子工程》的项目进展顺利,目前故宫已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的前期论证并安装了部分设施,奥运村龙王庙及石刻保护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明年可全面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2005 年度项目顺利推进,安排的 22 个修缮项目已经全部启动,地坛方泽坛、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等 5 项工程已经完工。年内还有两件重大的文物保护事件。一是戒台寺山体保护和加固工程,这是几十年来困扰戒台寺保护的的根本性问题。经过反复调研,向市政府汇报后,下决心对山体进行加固,关闭周边采石场,确保文物绝对安全,工程投入近 6000 万,戒台寺的安全问题已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二是国子监全部腾退收回并成立孔庙、国子监管理处。2005 年,国子监内的少儿图书馆全部迁出,交由文物局管理。首博也全部迁出,对孔庙、国子监进行百年以来最全面的修缮。据初步计算,自 2000 年以来,全市已经修复和整改的文物项目超过 200 项,是前 50 年修缮总和的几倍,充分表明了北京文物工作近年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配合奥运场馆建设,先期对五棵松篮球馆、国家体育场、新奥公司体育场配套工程、国家体育馆、奥林匹克会议中心、数字北京大厦、奥运村工程、奥运一期工程等8处奥运场馆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勘探面积达110余万平方米,发掘清理古墓葬450余处,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圆满完成了保护、抢救文物的任务,为奥运场馆的顺利开工建设铺平了道路。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工程,对沿线地下文物进行了考古勘探,文物勘探面积达到127万平方米,超过原定勘探面积60.8万平方米的108%;发现文物分布面积14000平方米,超过原定发掘面积9900平方米的41%。

3. 文物安全工作有新举措

近年来,市文物局逐步加大安全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安全隐患。年初对全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形成了《关于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检查工作的情况报告》,对全市文物安全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建议。为加强和改进古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四城区居住在文物保护单位内的9600余户居民配发了灭火器。作为今年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也作为列入市政府今年“实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市文物局安排专项经费1700万元,解决了戒台寺、太庙、鼓楼等10处文物保护单位长期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2005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市文物局积极转变工作思路,依法对16家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的28个使用单位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对占用的文物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和整改。此举引起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充分肯定,各使用单位也相继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此项举措开创了文物保护和执法的新方式,贯彻和体现了依法行政的精神。

年内继续加大巡视检查力度,对6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两次巡视检

查,对8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抽查,共查出问题和隐患200余处,已责令有关部门进行了整改。全年共查处违法违规案件20起,行政罚款10.5万元。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对八达岭、戒台寺、天坛、圆明园等3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执法专项检查,对7家国家文物局指定抽查的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组织完成了我市长城保护执法检查检查工作并形成了长城保护状况的报告。年内还对十三陵保护区内公共墓地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各区县、各局属博物馆也都采取有力措施排查安全隐患、落实安全责任、狠抓安全整改。经过各方努力,全市文物的安全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4. 博物馆事业呈现新面貌

2005年,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年内完成了多座博物馆的新建和改建工作,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下,作为北京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的首都博物馆新馆于12月15日起正式试运行并于19日举行了落成开幕仪式,贾庆林主席、陈至立委员、刘淇书记及任继愈先生亲自为新馆落成揭幕。首博新馆建设历时四年,凝聚了无数建设者和设计者的辛劳和汗水。试运行以来,首博新馆以先进的功能、丰富的展陈、完善的设施、一流的服务赢得了国家领导人,市委、市政府领导,社会著名专家,博物馆同行,广大市民及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成为当今国际国内一流博物馆的代表。另外,作为中国电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献礼,中国电影博物馆也将于年底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首博新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的相继落成,对北京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全市博物馆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平西纪念馆、平北纪念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一批抗战纪念馆陆续完成改陈,举办了新的大型展览,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

影响。年内宣南文化馆、百工坊等博物馆也相继落成,中国警察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也都在积极推进。

2005 年,各博物馆纷纷采取多种手段宣传博物馆、开展多种活动吸引观众,为提高广大市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发展北京市旅游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市文物局利用“5·18”国际博物馆日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自“八·一”建军节开始市属博物馆对全国解放军、武警的义务兵免票参观;为中小學生制作并发送了数万份博物馆参观护照;编印发放了 3 万份“北京地区博物馆指南”;编制发售了 6 万份北京地区博物馆通票。在十余座博物馆中推出观众可参观的科普互动展并赴澳门特别行政区展出,胡锦涛书记还在中山公园参观了我局所属博物馆制作的互动展。年底前,还将为北京市民免费提供 8 万份“北京地区博物馆地图”,推出多项临时展览,并充分利用电子网络的优势,与新浪等网络合作,推出网上互动展览。许多博物馆还将展览送到学校、军营、监狱,受到了热烈欢迎。

5. 文博基础性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2005 年,市文物局大力开展文博基础工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全面启动,目前已经制定完成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保护规划》、《故宫总体保护规划大纲》、《北大红楼保护规划》、《恭王府保护规划》和《北京大学海淀校区保护规划》。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划定工作陆续展开,其中西城区已经划定完成;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划定进展顺利,长城北京段的划定工作已经开始。年内还完成了 1-4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的制订工作,完成了第六批 53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项目的编制和上报,完成了故宫保护范围及缓冲区的划定和上报,完成了《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考古规划报告》的修改和上报。启动了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的整理和核查工作;启动

了全市四合院调查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启动了市属博物馆及区县属文物收藏单位文物清库、建帐和建档工作;启动了 17 座博物馆的多语种服务工作,开始制作多语种导览机和宣传册。开展了北京地区博物馆保管员、讲解员、科普人员的培训工作,完成了全市文物藏品腐蚀调查,完成了《北京文物地图集》、《博物馆译丛》、《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古建卷》的编写工作,编辑出版了《文物工作实用手册》。《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已经起草完成,该规划将对全市“十一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年内还制定了《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暂行办法》和《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等级参照标准暂行办法》,对区县的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6. 文物市场继续迅猛发展

截止到 2005 年底,全市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文物拍卖公司已经达到 44 家,经我局审批的文物商店达到 18 家。全市各大拍卖公司举行大小拍卖会共计 137 场次(不含专场),拍卖标的 71285 件套,拍卖成交额 91.6 亿元人民币。我局参与组织、筹办的第八届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也创下了历届博览会最高销售额,达到 4.35 亿元人民币,共有境内外 165 家古董商参加了展会,其中海外回流文物占 21%。市文物局抓住近年来文物市场异常活跃的大好机遇,积极研究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对文物艺术品流通市场的引导和扶植力度。年内对全市文物艺术品流通领域现状进行了调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市推进古玩艺术品交易业发展实施方案》,用以指导全市文物市场更加健康、快速发展,巩固北京作为全国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地位。

7. 思想政治工作和反腐倡廉工作成效显著,文博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

扎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育成效显著。在局党组的领导下,圆

满完成了历时五个月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坚持重在联系实际,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积极引导广大学员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扎实推进教育活动各个阶段各项工作。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机关及局属 18 个党总支、党支部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地开展三个阶段的各项教育活动,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全体党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自觉投入教育活动中去,确保了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促进北京文物事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此期间,共起草文件、材料 56 份,简报 22 期。

围绕《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切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狠抓政务公开、厂(馆)务公开,“三重一大”等制度的落实,对文物修缮工程实行全程审计。认真推进“阳光工程”,对首都博物馆展陈制作招投标环节进行全程监督,确保了新馆工程的顺利进行。

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文博队伍建设。先后举办了《公务员法》培训班、党政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训班、全市博物馆科普培训班、区县文委文物保护管理培训班,举办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讲座、“四五”普法培训和考试。通过学习和培训,广大干部职工的业务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全面实施人才战略,以首博新馆开馆为契机,大力引进高级人才。制定了《北京市文物局“十一五”人才规划》,从高校和研究院引进各种紧缺人才和高素质人才,接收博士生 2 名、硕士研究生 6 名、本科生 23 名。人才队伍结构明显改善,高级人才所占比重逐步上升。

二、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一是文物建筑的保护和抢救难度较大。

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市仍有相当一部分有重要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长期被居民和单位不合理使用,如大高玄殿、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万寿寺东路等,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二是文物法律、法规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我市已经基本建立了文物、博物馆的法律、法规体系,但由于文物、博物馆事业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理念不统一,认识不明确,致使已制定的法律法规中,有些规定含糊,不易准确把握。在文物保护管理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现有的法律法规仍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有些规定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在管理中找不到法律依据,有些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北京作为首都,文物领域内的许多新事物都率先在北京兴起,如何依法处理这些问题,时常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有些在全国不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北京已成为急需依法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市在文物保护方面对北京特色的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是文物基础性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近几年来,通过狠抓落实,全市文物基础性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工程的管理上、在文物基础数据的掌握上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三、2006 年工作要点

随着 2008 年奥运会的临近,全市的文物保护工作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2006 年是文物工作至关重要的一年,全市文物工作者一定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物事业的发展,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文物工作方针,按照“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 2003 年全市文物工作会的工作任务,努力进取,扎实工作,全面推进文物事业的发展。

2006 年全市文物工作的重点是:

1. 创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思路,争

取在历史街区改造和风貌保护上有新突破。全面贯彻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配合有关部门和城区政府，认真总结和借鉴以往危旧房改造的经验，探索并创新历史街区改造和整治的模式。重点是在前门地区、大栅栏地区、玉河和三眼井地区等试点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历史街区改造和整治的新办法，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模式并在今后历史街区改造和整治的过程中全面推广开来。

2. 加大文物建筑保护和修缮的力度，确保有“亮点”工程。通过“3.3 亿”工程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实施，北京市有一大批年久失修的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修缮并向社会开放，但是，全市仍有一些高等级、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建筑被不合理使用，得不到妥善的保护和利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要加强对以孚王府、宁郡王府、万寿寺东路为代表的有重大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修缮。2006 年要继续推进“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实施，加大文物修缮的力度，启动太庙大殿区、十三陵泰陵、司马台长城、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的大修及保护工程，完成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佛香阁和北海琼岛古建群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修缮工作。

3. 抓住重点，大力推进文物基础性工作。2006 年要基本完成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划定工作，开展市级及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备案工作。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要求，各区县要公布一批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完成一批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划定。在对全市四合院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启动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标准制定和调查的前期准备工作。认真推进对北京市境内长城的踏查工作。按计划推进市属博物馆及区县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文物清库、建帐和建档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北京市博物馆条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的修改调研工作。

4. 加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水平。进一步整合全市博物馆资源，对北京地区博物馆有计划地实施改造。认真抓好首博新馆试运行工作，积极征求领导、专家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完善各项设施和功能及服务，完善首博新馆运转方式和管理模式，高标准、严要求，将其真正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设施一流、管理先进的博物馆。按计划推进孔庙、国子监博物馆的修缮和展陈。以 2008 年奥运会为目标，积极开展奥运培训，编辑宣传材料，认真策划奥运期间的展览和文化活动。督促全市博物馆开展环境整治和展览筹备工作，提高服务接待能力。精心组织“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和推动全市博物馆科普互动项目的研发工作和纪念品的设计开发工作。开展博物馆立法调研和博物馆工作改革调研。

5. 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文物安全工作力度，确保全市文物安全。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依法行政，全面落实《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建立健全各项审批制度，完善审批程序，按照法律所赋予的职责严格依法审批。加强法制建设，开展故宫缓冲区立法的调研，完成起草工作，开展《北京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的修改工作，做好《北京市博物馆条例》修改调研工作。继续深入开展文物保护各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加大对文物安全技防投入的力度，对德胜门、东南城角楼、中山会馆等 18 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改造，消除安全隐患。健全和完善文物安全市区两级执法体系和监管机制，加强巡视检查，加大对不合理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的监管和检查的力度。积极协调公安、规划、环保和城市建设等部门，依法加大对全市范围内文物违法、违章案件的查处力度。

6. 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认真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配合城市道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奥运场馆建设等工程，（下转第 99 页）

关于口头文化

遗产抢救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

○ 李 萍

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相互间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人类文明进程中,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远远早于文字。文字是在语言充分发达的基础上诞生的。在文字缺省的漫长年代中,口耳相传的语言更是独当此任,不单有横向的传播,也还有纵向的传承。代表性的有希腊的《荷马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有蒙族的《江格尔》等等。它们以云游诗人和民间艺人作为传播主体,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延绵不断。在其他方面,“包括作为传播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①,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以口耳相传的非文字形态传播和延续。

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传说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民间传说、口头文学、口传技艺等等,很难持久地流传,特别是在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当今,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等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没有文字记录的口头文化则更容易遭到破坏,甚至于消亡。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建议案》,2003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的是为了“抢救、保存、保护和复兴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中,口头文化遗产的抢救是一项重要内容,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口头文化是文化的重要存在形态

人类文明的全部行程中,有95%以上的时间是以口头文化作为基本甚至唯一的存在形态。即使在文字产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字也仅仅为少数人所掌控,如祭司、僧侣、贵族、文官、史官等等。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即便是文明高度发达著称于世的中国也是一个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更因为社会发展的严重差异,甚至直到今天,仍有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仍有广大区域处于文字严重欠缺状态。因此,作为文化主体内容的语言、艺术、表演、风俗、技艺,以及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依然是以口头文化形态存在。

另外,口头文化,或更广义的非物质文化与民族文化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它“包括了人类的情感,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价值。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以及各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等。”^②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口头文化是文化重要的并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形态,抢救口头文化遗产在本质上就是抢救文化本身,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抢救口头文化遗产是自然规律的需要

口头文化是群体乃至个体性文化。它可以存在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也可以存在于某一区域、某一团体、某一行业、某一特定阶段、某一特定个人。但其存储介质只限于人的大脑,这样就产生了文化的社会属性与个体占有之间的矛盾。按照自然界的生命规律,个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口头文化存在着随个体生命的消亡、个体记忆力消亡而消亡的巨大风险。其中以特殊技艺、重大事件的当事者、亲历者的讲述与回忆尤为重要。例如现今,仅存于世的抗日战争亲历者已无多,更不要说“五四运动”或辛亥革命了。历史上有多少事件真相因人的缄口而湮没、有多少特殊技艺因人的离世而失传,几乎是无法统计的。

如何对待个体性的口头文化,历史上有不少成功范例。在中国,孔子应该算作口头文化的典型代表,他“述而不著”,他的伟大著作《论语》是弟子们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

而德国人则这样做:他们给予晚年的大文学家歌德以特殊待遇,派两名书记员日夜陪伴,将他每时每刻的一言一行都做详细记录,生怕漏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思想火花。

在当代中国,虽然巴金先生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未能实现,但有不少年轻学者早已开始孜孜不倦地寻访在世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当事人,收集、整理他们的口述和各种有关文献。他们的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李辉的《再见昨天》应该是最典型代表。

在1993年收回东岳庙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当时的朝阳区文化文物局对尚存于世的

唯一一名原东岳庙道士傅长青老人进行录音采访工作,抢救性地为东岳庙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口头文化遗产以及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都具有一种不可逆性,也就是说一旦丧失就是永久性丧失,任何再生、复原的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这同样也归结为一种自然规律。

三、抢救口头文化遗产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前面提到,近年来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各民族、各地域之间交往空前加强。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的欧美文化几乎成了各民族文化发展趋向性标准。另外,地区性军事冲突、民族融合、交通和旅游业的高度开发、网络化、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等都对传统文化构成威胁,而口头文化更是首当其冲。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未超过30年,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异是任何人事先无法想象的。文化观念、价值认同、娱乐方式、欣赏习惯、语言词汇、服装服饰等等都发生和继续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有经济的、历史的、政治的、人文的各种深层原因,但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传统的、民族的特色文化的快速衰落。中国56个民族当中,还有多少种民族语言继续着生命活力?连满族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民族,其语言竟除了部分学者之外,会讲的只剩下关东农村不多的老者。异彩纷呈的各民族服饰也好像成了人大政协开会的一道风景。在自然环境方面,有人统计出生物物种在以什么样的惊人速度消亡。在社会学领域,虽然没见到相关的统计数字,各种包括口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项目的消亡速度应该同样惊人。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差异性的、原生态文化的兴趣和眷恋。英国学者罗素说过:“生活的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是的,如果我们把各自的、包括口头文化遗

产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遗产项目妥善保护,实际是对人类整体文明的巨大贡献。当这种保护成为一种抢救、一种与现代化迅猛潮流相争的抢救,则更加凸显这种抢救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四、抢救口头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技艺的传承特性需要

世界上的古老文字中只有汉文字一直沿用至今,文字的发展程度应该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但长期以来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文化知识、文字能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千百年来中国的民间文化,包括文学、诗歌、戏曲、舞蹈、武术以及算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建筑学,还有各种工艺、技艺大都处于口传身授状态。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中国手工作坊的技艺传承方式有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工艺表示了由衷的赞叹。同时又指出,那种传儿媳不传闺女、对学徒要留一手的闭锁式做法对技艺的发展和继承是十分有害的,甚至会导致技艺的衰落和消亡。中国的家传制和学徒制是技艺继承的主要方式,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和技艺项目。这种方式当中,将所传授知识转化为文字的少而又少,这主要是大多数的技艺停留在初级的经验阶段,还有就是传授者不掌握文字能力。民间文艺的文字整理也多是落魄文人不得已而为之。再有就是出于一种行业保密的目的。因此,固然中国有多项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明,但相关文献多不齐全,深层次的理论性研究并不多见,甚至有相当一批发明、技艺因此而失传。所以,面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技艺的传承特性,需要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尚存的口传身授的文化遗产给予积极抢救。

在中国历史上,章回小说的诞生与发展,可以看作是对口头文化的一种成功抢救。在明代,由于市井文化不断发展繁荣,

其中“说话”(说书)这种艺术形式盛极一时。不少失意文人加入了“话本”的记录、整理、加工和创作当中,并逐步形成保留话本原始形态的章回体小说。而不朽的中国四大名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口头文化遗产成功抢救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不光国际上对保护包括口头文化遗产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非常的关注,我国也开始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2001年以来,由于申报工作的得力,我国已有昆曲艺术和古琴两个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2003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计划用17年的时间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和稳步推进。力争使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基本得到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保护。2004年10月,北京民俗博物馆提请的“老北京商业民俗保护”成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一批签约试点项目,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项入选项目。现在,这一国家级课题工作正在全面展开,计划在2008年以前分阶段完成“老北京商业习俗调查”、收集民俗文物、建立图文数据库、举办商业民俗展览以及北京老字号、北京庙会、北京村落商业民俗、北京都市商业民俗的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在全部工作中,收集、采访、抢救口头文化遗产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随着北京城区改造的不断扩展,地形、地貌以及老居民、老住户难觅踪迹,这就更增加调查工作的难度和紧迫性。因此,加深理解抢救口头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对我们当前工作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①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② 邹启山:《如何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为北京民俗博物馆书记)

浅谈博物馆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教育方法的创新

周正义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发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正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着、前进着。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博物馆界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和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探索着、前进着。

教育与服务是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当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其中一个方面是博物馆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方法的创新。当今博物馆教育中传播给观众的知识信息量越来越大,新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多,知识的传播不再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的单向传递,而是双向交流,互动影响。西方有的博物馆学者认为:博物馆教育的目的并不在“教”,而在帮助观众“学”。有的学者更主张应该用“交流”一词代替教育,认为“交流”更能反映现代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实质。我国博物馆学著名学者苏东海也认为“博物馆是通过为观众自我学习提供服务而实现教育目的的”。这就要求我们博物馆教育工作者要以这种新的教育观念为指导,创造出更多富有博物馆文化特色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一、博物馆只有转变教育观念,不断创新教育方法,才能更好地为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服务。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素养是博物馆的崇高任务。博物馆要运用自己的优势,充分考虑青少年观众不同年龄层次的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区别对待。对小学生要着重向他们讲解与文物遗迹有关的历史事件、民族英雄、革命先烈的动人故事,从小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对中学生和城乡青年,要着重向他们介绍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不断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培养高尚情操;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要着重引导他们认清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自觉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二、博物馆只有转变教育观念,不断创新教育方法,才能为在校学生的校外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关系着民族素质和国家的前途。培养学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协同努力。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配合学校教育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博物馆与学校教学紧密配合,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外国都已经成为博物馆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

博物馆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科学教育活动,特别是对少年儿童学生的教育,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最基本的内容。美国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配合十分普及。在美国,不

论大小博物馆都设有教育部门,有的称为公众教育部,有的称为教育服务部。在它们的服务项目中,大量的的是配合学校教育工作者,为学生设立专门教室、实验室;开办专供儿童参观的陈列室或“儿童博物馆”;提供有偿借用的图片、幻灯、标本、模型等。一些大型博物馆还专门编制了讲座教材。如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两套为3~9年级学生准备的讲座,内容是《我们居住的世界》。每次讲座大约一小时左右,另有一小时结合讲座内容安排参观陈列,进行直观教育,把启发少年儿童热爱知识的兴趣同传授知识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博物馆的校外教育活动开展的还很不够。不少博物馆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措施不力,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即或开展了这一活动的博物馆,也大都还没有制度化、经常化,活动形式还比较简单,活动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传统教育向激发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发展,博物馆的校外教育的功能日趋重要。学生是我国博物馆数量最大的观众。我国的大中小学,加上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合计有两亿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1/5。因此,我国的各级各类博物馆必须对校外教育工作予以足够重视,从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工作重点、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迅速加强这一工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作为“校外教育基地”的作用,为全面培养和提高广大青少年的现代素质贡献力量。

三、博物馆只有转变教育观念,不断创新教育方法,才能更好地担负起社会教育的任务。

博物馆担负着社会教育的任务。在一些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的理想课堂之一。在成人教育中,博物馆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具有一定的优势。博物馆有丰富的实物教学资料,适合成人的学习特点;博物馆涉及许多专业,包容的知识面较宽,容易满足成年人综合学习的要求。在

美国,许多博物馆创办了一系列讲学活动如成人专题讲演、成人学习班、研究班等。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早在1882年就创设了职业教育的学校,每年可以接收3500名学员和10000名旁听生。学员要有高中毕业文凭,学习结束时,卢浮宫学校给合格的颁发证书。我国成人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薄弱,职工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几年各类成人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城乡广大成年人的迫切要求。成人教育急需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发各方面的潜力。在我国各地的博物馆,成人教育工作基本上还是缺项,至今对成人教育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我国的博物馆,特别是省、市一级的博物馆,在人才设备等方面具有较充分的基本条件,应当解放思想,为社会培养人才,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科教兴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博物馆的教育与服务包括诸多方面,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提高思想品德和文化素养服务,为在校学生的校外教育服务,为社会教育服务。只有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博物馆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法,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改变博物馆长期以来单一的说教式教育模式,进行多渠道、开放式的互动教育。博物馆所蕴藏的知识量是巨大的,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知识宝库向广大观众传授知识是我们博物馆工作者的一项艰巨任务。长期以来,大多数博物馆形成了以说教为主的单一教育模式。这一教育模式以讲解员的“讲”为主,观众成为被动的“听众”。这种说教模式只是一种知识的灌输,不利于激发观众的兴趣和调动观众思考的积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我们要改变这种单一的说教模式,采取多渠道的互动式教育,充分调动观众的积极性,使观众参与其中,由被动的“听”转变为主动的吸收知识。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

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使观众获得丰富的知识。

近年来,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博物馆教育模式的探索与转变。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北京地区唯一的一座在原址基础上建设并展示汉代出土文物的博物馆,陈列的文物是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中华传统科学教育的难得的实物教材。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在原址保存最完好的大型汉墓遗址,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地宫遗址及车马遗迹,是研究中华丧葬文化及北京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可是,如何利用遗址,如何拉近展览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成为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上上下下所关注的一个焦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博物馆的活动都只是一个模式,形式千篇一律,地点缺少变化。结果只能是,再好的文物展览在观众心中也是隔离和遥远的。可是如果没有观众,博物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市场和观众是检验一个好展览,甚至一个好博物馆的试金石。为了让更多的人亲近历史,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改变以往孤芳自赏的僵硬教育模式,在多次论证和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利用遗址博物馆的优势,以继续推进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为重点,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引入博物馆教育当中,率先推出了青少年动手参与项目的尝试,开发了“考古小奇兵”活动。这一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青睐。每年都有上千名学生参与“考古小奇兵”活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这种教育模式,充分调动了参与者的积极性,使参与者在活动的过程中,不但获得了快乐,而且增加了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博物馆要转变观念,求主动。长期以来,大多数博物馆认为只要把展览做好就行,有没有人参观是另一回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使我们的许多好的展览并

没有吸引太多的观众,没有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再好的展览如果没人参观,那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要转变这种错误观念,力求主动,坚持把我们的展览推出去,从而使更多的人受惠。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地处北京城的西南,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偏僻的地理位置。由于离市区比较远,因此前来参观的人不是很多。为了将自己的展览推出去,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馆领导带领大家转变固步自封的观念,坚持走出去的方针,主动与外界联系,把自己的展览推向社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国西汉文化和古代文明。2004年,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推出了针对中小学生的“历史实践课”。为了使更多的中小学生参加“历史实践课”,博物馆主动与丰台区各中学进行联系,把中学的历史实践课教育引入博物馆。许多中学与博物馆建立了联系,把历史课堂搬进了博物馆。此外,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还始终坚持把自己的展览推向社会。2005年7月,我馆与市科委联系,参加了第二届青少年科技博览会,把“穿越时空,体验古代科技生活”系列互动展览搬到了博览会。这一展览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展出的几天里,展览前总是围满了青少年观众,他们通过动手参与,了解了我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通过这次展览,更多的人知道了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了解了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博览会后,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慕名来到博物馆参加活动。

总之,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们更加坚信,只有转变观念,不断创新,才能把博物馆办出特色,办得生动活泼,办进观众的心里去。

(作者为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馆长)

浅议现行博物馆管理体制对我市 文博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

李学军

近年来,我市的文博事业成绩显著,注册博物馆已达 127 座,其类别已从单一的历史类扩展为文化艺术类、科技自然类、宗教民族类、风物民俗类、区域地志类、革命纪念馆及遗址类等十余个类别。这些博物馆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充分展示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辉煌成就。

作为博物馆的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文物局负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各博物馆进行属地管理,完善博物馆在展览、社教、科研、文保等方面工作的责任。但就现实情况看,在全市博物馆行业管理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管理力度不大、行业主管部门权威性不强的问题,许多政令及相关工作规范不能得到贯彻执行,甚至“文物保护法”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在某些博物馆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证。究其原因,主要是管理体制不顺、隶属关系复杂、政出多门所造成的。

我市目前现行的博物馆管理体制是各博物馆直接隶属于各自不同的上级主管部门,无统一的直接领导,其人员、机构、经费、收支等均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控制,而博物馆的具体业务工作又是由博物馆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宏观协调和指导,两者之间由于所处的位置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在工作任务、工作重点上往往会不一致,不利于博物馆行业的整体发展。因此,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加强对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管理力度、提升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从而提高博物馆行业的整体水平,是需要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我市博物馆行业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

通过考察外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了解到,在外省市 80% - 90% 的文博单位均直接隶属于文物系统,为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直接管理,其人员、机构、经费都由文物部门直接掌握,业务工作的开展相对容易。此外,除北京外其他省市均未实行博物馆的注册登记制度,个别文物系统外的博物馆并未纳入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因此,与之相比,我市文博单位从管理体制及隶属关系等方面看,都具有很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综合分析,我市文博单位的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一) 管理体制造成隶属关系复杂,非文物系统博物馆比例大且逐年上升

目前我市共有 127 座注册博物馆,与外省市 80% - 90% 的文博单位均隶属文物系统相比,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博物馆隶属关系极为复杂,北京市文物局属博物馆仅 16 座,占博物馆总量的 12.60%,各区县文委属博物馆 27 座,占博物馆总量的 21.26%。而非文物系统博物馆共有 84 座,占全部博物馆数量的 66.14%,其中中央属博物馆 43 座,市属博物馆 23 座,民办馆 18 座,分别隶属于各中央在京部委、大专院校、公安部队、科研院所、行业企业集团及市园林、宗教、民政、科委等部门,以及社会公民个人。这些博物馆与我市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我局无权在人员、机构及经费

投入等方面进行管理,由于管理体制上的问题造成了行业主管部门属地行业管理工作的难度很大。

(二) 中央级、国家级博物馆相对集中在北京市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由于中央国家各部委机关绝大多数设在北京,因此众多中央级、国家级博物馆均选择在北京建馆,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属国家文化部)、中国美术馆(属文化部)、中国体育博物馆(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地质博物馆(属国土资源部)、中国农业博物馆(属农业部)、中国军事博物馆(属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印钞造币博物馆(属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国印刷博物馆(属新闻出版署)、中国现代文学馆(属中国作家协会)、国际友谊博物馆(属国家文物局)、中国钱币博物馆(属中国人民银行)等,而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中央级博物馆还有中国电影博物馆(属广电部)、中国汽车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属中国妇联)、中国警察博物馆(属公安部)、中国民航博物馆(属民航总局)、中国邮票博物馆(属国家邮政总局)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上级主管部门级别高、博物馆规模大、设施先进、馆藏丰富,代表着我国某一领域的最高成就和水平。但作为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来说,对于这些国家级大型博物馆的行业管理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三) 新的博物馆类型及运作方式大量出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的类型及运作方式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自然类博物馆日益受到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广泛欢迎,中国科技馆、中华航天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在我市的科普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各界对博物馆的普遍重视,各行业

产业和企业集团主办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大量涌现,如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北京警察博物馆、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等。此外,民间收藏热推动了民办博物馆的产生,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等民办馆已达18座,同时还出现了以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等为代表的企业形式运作的博物馆。从以上这些博物馆的特点和展示内容看,其与传统文物类博物馆的距离更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其馆藏品及其行业历史、特点更是不甚了解,管理起来更加生疏。

二、现行管理体制对我市文博工作的影响

通过以上博物馆行业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管理体制的错综复杂、行政隶属关系上的条块分割,是造成我市博物馆行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对于文博单位的行业主管部门来说,现行的管理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行业管理工作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其直接隶属的上级主管部门不了解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属地管理又缺乏力度,从而形成了一些博物馆在业务工作上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统一性和规划性。

从总体情况分析,现行管理体制对我市文博事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部分外系统博物馆在初建时缺乏博物馆专业人士的参与和指导

博物馆学是一门专业学科,包含了从博物馆建筑设计、文物藏品征集、展览主题的制定、展陈大纲的编写、展览形式设计到观众接待服务等等一系列专业知识,博物馆的各项建设都需要具备博物馆专业知识的人参与其中。许多部门、行业、企业的建馆宗旨和初衷是好的,起到了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丰富首都文化生活的作用。但由于隶属关系的问题,一些博物馆的主办者并不十分

了解博物馆行业的规律及特点,在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又较少与行业主管部门沟通,没有得到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指导,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和陈列形式也缺乏专业的论证,因此往往造成博物馆的“先天不足”,如博物馆建筑不符合展陈的需要,藏品库房设施达不到藏品保护的要求,办公、展览、库房等区域划分不合理,没有预留临时展厅等问题,结果往往造成主办者事倍功半,办不出自身应有的特色,博物馆整体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二) 行业主管部门对全市文博单位的情况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

作为全市文博行业的主管部门,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各文博单位的业务工作数据和基础信息,这些数据包括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开展的活动、从业人员情况、机构部室设置、观众数量统计、硬件设施配备、博物馆的经费投入及经营收入情况、馆藏文物的类别质地、征集修复、珍贵文物数量、库房及相关设施、科研课题及研究成果等各个方面。以上这些信息的统计与掌握,将为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与协调、制定文博事业长远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博物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但由于行政隶属关系问题,一些单位上报信息及相关情况需先行请示其上级主管部门,往往造成数据报送的延误,一些涉及内部管理的资料更是从不对外提供,尤其是涉及博物馆三产情况及经营收入、上级单位的财政拨款及专项经费数额等更不会轻易透露。有些单位甚至不按要求向行业主管部门上报相关报表,致使许多工作情况、工作信息不能得到及时的沟通与传递,许多数据不能汇总到行业主管部门。此外,某些单位出现文物损毁事件也不按文物法要求及时向主管部门上报,这样就限制了行业主管部门发挥作用,掩盖了许多可以及早解决的问题。

(三) 博物馆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力度不够,许多业务工作要求得不到落实,造成博物馆工作的不规范

文物部门由于是行业管理性质,对于直

属单位以外的各博物馆只是履行文物法规定的审批职责及进行业务指导,而其人员、机构、经费均无法管理与控制,无法靠行政命令来开展工作,因此造成了在行业管理上存在着极大的难度。同时,由于“文物保护法”在内容上只提出了对文博工作的要求,但缺乏相应的罚责,因此造成行业主管部门在实施行业管理方面得不到法律保证,管理力度不大,无法对外系统博物馆实行有效管理,客观上致使某些单位的博物馆业务工作不够规范,长期存在着馆藏品底数不清、文物藏品建帐建档工作不完善等问题,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业务工作要求得不到真正落实。

(四) 各单位对所附属博物馆的重视程度及资金投入直接决定了博物馆的质量

由于博物馆隶属关系复杂,其上级主管部门及领导的重视程度和对公益事业的态度往往决定了博物馆的资金投入和专业队伍的建设,而以上两点又直接决定了博物馆的质量。目前我市各博物馆经费来源情况非常复杂,有些博物馆能获得全额经费支持,有些博物馆只有人头费而无事业经费,更有一些博物馆是自收自支单位;同时,各单位的经费来源渠道也千差万别,有靠各级财政拨款的,有靠上级部门拨款的,有基金会提供资金的,有靠经营收入维持的,有的是企业集团提供资金,由此导致各馆在软硬件设施及内部管理水平方面相差悬殊,博物馆的整体质量参差不齐。

由于某些单位在博物馆业务工作的资金方面严重不足,文物库房及展厅内设施简陋,普遍缺乏恒温恒湿设备及日常监测设备,文物保护修复及文物日常养护等工作无法有效开展。还有一些博物馆只在建馆初期有开办经费,而没有固定的长年业务经费,因此缺乏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上级主管部门也缺乏对博物馆的长远考虑和发展规划,因此一些博物馆缺乏生存的能力和强有力的经费支持,博物馆还要利用各种手段去挣钱维持生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业务工作的开展。

(五) 文物系统外的博物馆缺乏博物馆专业人才

文物系统以外的某些博物馆,由于并非以博物馆业务作为主业,博物馆只是附属机构性质,因此在人才引进方面并没有特意考虑博物馆专业的特殊需要及今后的长远发展,缺乏具备博物馆专业知识的人才,导致某些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缺乏专业能力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更谈不上对观众心理学、博物馆展陈学等方面深层次的研究,造成博物馆在展览、科研、文保、社教等方面工作质量不高。

(六) 各文博单位之间缺乏横向的沟通与合作

对博物馆个体来说,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存,但由于各自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博物馆之间往往缺乏横向的沟通与联系,缺乏信息的交流与博物馆资源的共享,不能形成在博物馆资源上的互补,在业务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政,很少能够利用本馆以外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七) 部分博物馆对业务工作缺乏系统研究和规范管理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对博物馆业务工作缺乏具体和有针对性的要求,因此某些博物馆特别是一些行业、产业类博物馆缺乏对本单位在藏品管理、展览设计、文化内涵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同时由于行业主管部门在业务工作方面的要求得不到博物馆的重视和落实,因此某些博物馆在业务工作方面缺乏规范性。例如在藏品管理方面,某些博物馆的藏品从入馆到命名、定级、计件、登帐、编目、排架都没有一套规范的程序,馆藏品的鉴定随意性也较大,如将照片、模型、现代书籍等均归于文物类统计,造成文物数字统计上的混乱。

(八) 博物馆上级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上的交叉造成了博物馆工作的困难

因隶属关系的不同,上级主管部门的直

属管理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属地管理之间,由于各自所处的位置和出发点不同,在对博物馆提出要求时,在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工作重点以及发展的长远计划方面会出现不一致甚至冲突和矛盾,这种局面会让博物馆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不利于博物馆的发展。

三、工作对策的探讨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目前本市博物馆的数量虽居全国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博物馆内部管理、文物保护科技水平、现代化展陈手段、文物修复与复制、讲解服务水平及旅游纪念品开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

笔者认为,我市的博物馆如能像其他省市一样,大多数博物馆能够实现统一归口领导,统一调配资源,统一博物馆规划,统一使用经费,将十分有利于我市博物馆的发展。目前,我们只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

(一) 加大对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力度,提升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是针对所有文博单位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各单位都应严格遵守。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有责任宣传文物保护法,维护其权威性与严肃性,并遵照文物法的要求对博物馆实施行业管理。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对文物法的宣传力度,针对不同级别的从业人员开展法规培训,让博物馆的主办者和从业者了解法律、遵守法律,逐步树立法规意识,主动与行业主管部门沟通情况,配合行业主管部门把工作开展好。

(二) 积极呼吁国家适时出台针对博物馆的优惠政策

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更需要国家在优惠政策方

面的大力扶植。希望国家、市政府能够在原有对博物馆门票免税的基础上,尽快出台针对博物馆行业的优惠扶植政策,以政策的形式扶植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还应针对那些能够补充博物馆经费不足的博物馆附属产业实行减免税优惠政策,以进一步促进我市博物馆的健康发展。

(三) 建立博物馆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实行博物馆的分类分级管理,有利于区别情况,制定、执行相应政策。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与政策上的扶植将日益增大,今后将逐步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同时就会出现扶植政策向哪类或哪级博物馆倾斜的问题。而实行了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后,管理部门就可依据实际情况,对基础好的馆提出更高要求,对基础差的馆给予相应的扶植,并为将来不同级别的博物馆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奠定基础。此外,分级标准的确定还将利于针对不同性质、内容的博物馆制定相应的审批、管理规范化条件,使博物馆工作从开始便走上正规化道路,具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建设标准。

(四) 进一步规范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开展

行业主管部门应从博物馆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以新文物法为指导,规范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的工作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完善法制体系,逐步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和工作规范,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博物馆的行业管理工作,提升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力度。同时鉴于博物馆工作的实际需要,国家也应尽早制订颁行《中国博物馆法》,以使全国的博物馆事业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而作为全国文博事业最高管理机关的国家文物局,也应在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实施一套具有科学性、系统性、普及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行业标准及工作规范,并在全中国范围内推行。

(五) 主动加强与各文博单位的沟通,发挥桥梁作用

作为博物馆行业主管部门,要从博物馆

服务者的角度出发,为博物馆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成为政府与博物馆间上下沟通和各博物馆间横向沟通的桥梁,鼓励各文博单位间的横向联系,合理配备博物馆资源,形成资源的优势互补,办出特色鲜明的展览,着力改变现有博物馆各自为战、缺乏凝聚力的弱势,努力联合各馆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同时开展博物馆整体宣传、建设博物馆系统网站,建立信息发布与交换平台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 积极争取市财政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博物馆建设

北京地区博物馆众多,虽然隶属关系十分复杂,但所有位于北京市行政辖区内的博物馆,特别是隶属关系不在北京市的各中央级及军队系统的大馆,均为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益的是北京的广大市民。因此,为支持和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行业主管部门应建议市财政参照我市3.3亿文物修复经费的办法,设立“博物馆事业发展专项经费”,用于支持、鼓励新博物馆的建设及老博物馆的扩建改陈,促进博物馆展览档次的提高,开展针对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培训,由此也可以吸引博物馆主办者投入相应的配套资金,以提高博物馆的整体水平。行业主管部门只有主动地为博物馆特别是外系统博物馆争取利益,在税收、门票补贴等方面真正为博物馆着想,才能得到整个博物馆群体的认可和支持。

总之,面对目前如此复杂的博物馆管理体制,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对各类型、各系统博物馆特点的研究,区别对待,立足于为博物馆服务的宗旨,积极为博物馆提供帮助和业务工作方面的支持,不断探索博物馆管理工作上的新思路、新方法,克服博物馆现行管理体制的不利影响,提升北京博物馆的整体水平,以真正实现对我市博物馆行业的有效管理。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主任科员)

房山镇江营西周卜骨与 《焦氏易林》

◎ 连劭名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1986年至1990年在北京房山区镇江营进行发掘,出土西周卜骨一片,编号FZT0226,图版见于该所编著的发掘报告《镇江营与塔照》。^①

卜骨为牛右胛骨,经过加工,骨白朝下,上有钻凿,残长13.1厘米,宽9.5厘米。正面左下,刻有筮数两组:

六六六六七七

七六八六五八

依照奇数阳,偶数阴的原则,可转写为《周易》中的〈临〉与〈蒙〉,系二爻变,即〈临〉初九变〈蒙〉初六、〈临〉上六变〈蒙〉上九。李学勤说〈临〉之〈蒙〉“系三爻变”,不知如何理解。^②

古代占卜之后,还要查阅书籍,如《尚书·金縢》云:“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文选·思立赋》李善注引汲冢竹书《师春》云:

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置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重灵降诛,尚复其所。

镇江营卜骨筮数可参阅《焦氏易林》,该书〈临〉之〈蒙〉云:“白茅醴酒,灵巫拜祷,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应该说结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巫祝祈祷,鬼神欣然接受祭品,消灾除祸,使人长寿,《周礼·太祝》云:“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郑玄注:“永,长也。贞,正也。求多福,历年,得正命也。”

《焦氏易林》的解释全本于卦象,试分论之。

(一)〈临〉下卦兑。《周易·说卦》云:“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依五行学说,西方为秋,其色白,其日庚辛。《诗经·静女》云:“自牧归荇。”郑玄笺云:“茅,洁白之物也。”故兑为白茅。

(二)〈蒙〉下卦坎。《周易·说卦》云:“坎为水。”亦为酒,《周易·坎》六四云:“樽酒,簋二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虞翻注:“坎为酒。”《周易·困》九二云:“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李鼎祚《集解》云:“坎为酒。”醴酒为祭神之物,《说文》云:“醴酒,一宿熟也。”其味甘美。《仪礼·特牲馈食礼》郑玄注:“祭酒,谷味之芬芳者,齐敬共之,惟恐美之,告之美,达其心,明神享之。”酒可养老,《礼记·射义》云:“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白虎通·封禅》云:“醴泉者,美泉也,状若醴酒,可以养老也。”

(三)〈临〉上卦坤。《周易·系辞》上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荀子·正名》云:“道之工宰。”杨倞注:“工能成物。”知坤亦可为工。巫工同义,《楚辞·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些。”工祝即巫祝。《说文》云:“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又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兑亦为巫,《周易·说卦》云:“兑为巫、为常。”恒、常义同。郭店楚简《缁衣》云:“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筮也,其古之

遗言与?”

(四)〈蒙〉上卦艮。《周易·说卦》云：“艮为手。”故曰拜。《尚书·大甲》中云：“伊尹拜手稽首。”孔传云：“拜手，首至手。”又，《周易·蒙》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虞翻注：“艮为求。”《周易·颐》云：“自求口实。”虞翻注：“艮为求。”求、祷同义，《礼记·檀弓》下云：“善颂善祷。”郑玄注：“祷，求也。”《吕氏春秋·顺民》云：“祷于桑林。”高诱注：“祷，求也。”又，兑为口，巫祝以辞事神，《说文》云：“祷，告事求福也。”

(五)坤为身，与神相同。《周易·艮》云：“不获其身。”虞翻注：“坤为身。”《周易·蹇·象》云：“君子以反身修德。”虞翻注：“坤为身。”《周易·系辞》上云：“言出乎身。”虞翻注：“坤为身。”身如神，《释名·释天》云：“申，身也。物皆成其身体各申束之使备成也。”《说文》云：“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以铺时听事，申旦政也。”坤为生，凡人之本性，嗜生恶死，坤亦为嗜。坎为饮食，《周易·需》上坎下乾，〈象〉云：“君子以饮食宴乐。”《周礼·宰夫》云：“掌其牢礼委积膳献饮食宾赐之殽宰。”郑玄注：“饮食，燕享也。”

(六)“使君”用伏象，乾为君，坤为土，有国之主，《周易·说卦》云：“乾为君。”《周易·师》上六云：“大君有命，开国承家。”虞翻注：“乾为大君。”《周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虞翻注：“乾为君。”寿考为长生之象，坤为永，《周易·坤》用六云：“利永贞。”〈象〉云：“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依据《焦氏易林》并结合《周易》，推测镇江营卜骨的贞问事项可能是疾病。《周易·豫》上震下坤，上互坎，故六五云：“贞疾，恒，不死。”〈象〉云：“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灵巫是恒的象征，《论语·子路》云：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坎北方卦，其数为一，守一即是恒。

〈临〉初九云：“咸临，贞吉。”〈象〉云：“咸临贞吉，志行正也。”恒其德则志行正。

《尚书·金縢》记载西周初年武王有疾，周公占卜，“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永终即坤之永贞，与“恒”同义。

根据《左传》、《国语》中的记载，古人解《易》时要结合本卦与之卦的卦象。《周易·临·象》云：“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卦有国君之象，坤为国，震为威，故曰临，《谷梁传》云：“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范注：“临，抚有之也。”又，《礼记·中庸》云：“修道之谓教。”无穷与无疆皆为永终之义，积德行善则永终，《礼记·大学》云：“〈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周易·蒙·象》云：“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勇决之义。君子修道当毫不犹豫，要勇于献身。《墨子·修身》云：“志不强，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国语·吴语》云：“莫如此，志行不果。”韦昭注：“果，勇决也。”《国语·晋语》云：“若是道也果。”韦昭注：“果，必行也。”《国语·晋语》云：“其身果而辞顺。”韦昭注：“果谓敢行其志。”

“以教思无穷”与“果行育德”具有相同的意义。《礼记·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云：“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儒家主张修道是去除灾祸的根本方法，《论语·述而》云：“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谏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也久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祷者，悔过迁善，以祈神之佑也。无其理则不必祷，既曰有之，则圣人未尝有过无善可迁，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祷久矣。”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北京出版社，2000年。

②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

（作者为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智化寺藏殿内转轮藏建筑上的木雕抽屜

试说北京

现存转轮藏

的宗教文化

李妍

转轮藏,是一种源于宗教法器的建筑形式,是汉、藏两族建筑的结合体。其建筑本身既具有古典建筑的美感,又包含了设计建造者对佛教教理、教义的领悟,是宗教文化物化的表现形式。

首先,让我们从转轮藏的原型谈起。

一、藏密法器与“转藏”制度

转轮藏建筑的原型是藏密宗教的法器——摩尼桶。公元7世纪,佛教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西藏。传入西藏后,形成了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或称为“喇嘛教”。

西藏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范畴,包括显宗和密宗。由于藏传佛教多是密宗,故称为“藏密”。但是,藏密不只讲密教,也很注重显教^①。因此,“藏密”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藏传佛教的众多派别。

我们经常能在佛教场景中看到“法轮”。“法轮”象征意义深远,它起源于古印

度神话。在古印度神话传说中曾提到转轮王有法宝,可以降服四方,只要出兵征战,敌国望风而降,转轮王可兵不血刃而一统天下。佛教故事中沿用了这个典故^②。“法轮常转”是显示佛法力量的一种途径,是轮回中悟道的标志,而摩尼桶就是用这种表达方式宣扬佛法的。

在藏密寺庙的屋檐下常会有一排排木制或铜铸的圆桶,这些木桶大多为红色,高一、二米,上面刻写或内装着六字真言,外有木框、上下有轴,藏语称其为“古拉”,一般人称之为“摩尼桶”。较小的佛教殿宇廊下会有三、五个这样的摩尼桶,较大的殿宇回廊四周会有上百个这样的转桶环绕。朝礼的信众们依次从转桶旁经过,用手轻推一下,使转桶转动一圈,表示将摩尼桶上的经咒念了一遍。除了这类大型经桶,还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摩尼转。它是用银、铜金属打造的,转桶上面不光刻有六字真言,还浮饰着精美的图案,转桶下配有手柄。桶上还坠有小锁链,用以加速它的转动。信徒念咒时,可以手持此轮,边念边转。从使用的方法来说,

摩尼桶就取了“法轮常转”的这一层意思。

将摩尼桶这种宗教法器与汉地传统的建筑相结合,便形成了一种外观看似花塔,塔内上下有轴,可以转动的转轮藏。

转轮藏巧妙地运用了我国古代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它虽是一个藏经架,但却被设计成一个下檐八角形,上檐圆形的亭子。亭身设有经屉,可以存放佛经,看上去很像一个缩小了的建筑模型。这种建筑形制早在南朝时的梁代就已经出现,宋代的建筑师李诫在他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对转轮藏有详细记述。

而佛教的“转藏”制度始创于南朝梁代的傅大士(497~569),他姓傅名翕,字立风,又称善慧大士、双林大士,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所谓的“转藏”,就是转读大藏经之意,与“看藏”不同。“看藏”指每天读经时,自首至尾一字不漏,而“转藏”只读经文中每卷之初、中、后数行而已。

转轮藏属于经藏的一种。经藏就是藏经楼,是收藏佛教典籍的书库,又称经楼、经堂、经阁等。藏经楼一般陈列为一排排的书架,但是经目繁多,不是一般人可以遍读的。傅大士创建了一个大型的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便可快速地检索出所需要的经书。而且,转轮藏还能方便那些不识字的民众,以及那些没有时间去研读深奥佛法的信众。《神僧传》卷四中有这样的记载:“初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龕,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从劝世人有发于菩提心者,能推轮藏,是人即与持诵诸经功德无异。今天下所建轮藏皆设大士像,实始于此。”这就是转轮藏最初的模型。傅大士所创的转轮藏法门对佛教界的影响很大,至今许多寺院尚存有转轮藏的设施。

二、北京现存的转轮藏

北京现存的三处完好的转轮藏。一处建于明代,是智化寺藏殿内的转轮藏;另外两处建于清代,一处位于雍和宫内,一座处

于颐和园内。

1. 市井深处的转轮藏

智化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是受汉传佛教影响的明代寺庙,整个寺庙的主题是“法轮常转,帝道遐常。佛日增辉,皇图永固。”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和大悲堂。“藏殿”是智化殿的西配殿。在这样一间貌似普通的殿堂中竟藏有一件绝世的艺术珍品——明代的转轮藏,它与智化寺特有的京音乐以及藻井艺术并视为绝世珍宝。

一般来说,转轮藏有两个用途,一是收藏经书,二是做法事时,可以边转动法轮边诵经,取其“法轮常转”的寓意。可以转动的转轮藏,一般内部装有机,转轮藏里装有的“内容”越多,在转动转轮藏时,信徒所能传递的宗教信息就越多。也有一种不能转动的转轮藏,信徒可以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围绕它步行,一样可以起到对佛法礼拜的作用。位于智化寺藏殿内的转轮藏就属于后者。

藏殿内的这具转轮藏高4米多,主体部分为木制八角形的经柜。在经柜的每一面上都有45个长方形抽屉,一共360个,与一年的天数基本一样。当信徒围绕转轮藏一圈后,就表示已将一年所要读的经文诵读完毕,表达了信众希望早日成佛的愿望。每个藏经抽匣的表面都浮雕着一尊佛像,佛座为双层莲花座,莲瓣肥硕,带有鲜明的明式佛造像风格^③。并且,360个藏经柜是按照千字文的顺序排列的,更适合汉传佛教信徒的习惯。

这具转轮藏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细节上极尽奢华。《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建智化寺穷极土木。”作为权倾一朝的太监,王振的家庙从内部装饰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尽显其追求富丽堂皇的本色。整座寺庙就是一部精雕细琢的艺术巨著。因为智化寺毕竟是一代权监王振的家庙,从建筑规模上不能逾制。通过繁缛的修饰来传递宗教信息是这位权贵炫耀自身地位最好的途径。

围转轮藏一圈,我们能看到:在转轮藏



智化寺转轮藏

底部的须弥座上枋上刻有“吉祥八宝”，并且在转轮藏上反复运用这八种吉祥图案来修饰，在经柜的转角柱上又阴刻填金八宝吉祥纹样。

相传这八种吉祥之物代表佛陀身上的八个部位。宝罐代表佛陀的颈，因佛法皆由佛陀口中流出，故宝罐又为教法、教理的象征。献上宝罐时，即代表祈愿众生获得这圆满无上的教义。宝盖，代表佛顶，在汉地名为白伞，置于佛陀顶上，能遮蔽风日。伞在古代印度原为贵族、皇室所用，象征尊贵威势，在此代表行者的威势，能除一切魔障，清净吉祥。献上伞盖是祈愿众生离苦得乐。双鱼代表佛陀的双目。佛陀以眼慈视众生，故又为智慧的象征。供养吉祥的双鱼，能祈愿消除众生的无明，得到了悟一切的智慧。莲花代表佛陀的舌头。象征佛以广长舌说一切法，使众生都能悟入开示佛之知见。献上莲花，祈愿具有启悟众生的能力。法螺代表佛陀的三条颈纹。佛陀的法音广大悠扬，如螺一般清净美好，使一切有情入于解脱。盘肠代表佛陀的心，代表佛陀心法无尽，也可看成为两个“卍”字交搭而成，是佛陀心

脉的象征。宝伞代表佛陀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教的胜利。代表除一切烦恼魔障，得大胜利，究竟解脱。法轮代表佛陀的手掌，以示法轮常转、佛法无边。

在转轮藏的顶部有雕刻精美的莲瓣数层，上坐一尊圆雕毗卢遮那佛，面东而坐，高高在上，十分神秘，甚至不易察觉。在佛教中本有五方佛，毗卢遮那佛是位于中央的一尊，其他四尊是东方不动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为毗卢遮那佛护法的是大鹏金翅鸟、龙、龙女，这三者取自佛经中的天龙八部。在大乘佛经中说，当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龙是“天龙八部”之一。佛经上说在无数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的龙王，他和8岁时的幼女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佛之相。他的女儿就是后成佛的龙女。而护法的大鹏金翅鸟就是天龙八部中的迦楼罗，汉文译为金翅鸟，两翅膀张开有336万里。

围转轮藏一圈，还可看见石座转角处雕有“天龙八部”经柜角，柱上雕象、狮、四不象、菩萨、天王、韦驮与金刚，无一不是精美绝伦、栩栩如生。这样的一处转轮藏，其本身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佛教教科书。

2. 皇家寺院中的转轮藏

清中期，统治者非常重视藏传佛教。这一时期的宗教建筑体现出统治者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以促进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治国思想，雍和宫永康阁中的转轮藏和颐和园万寿山上的转轮藏亭就是体现这种思想的建筑代表作。其中，雍和宫里的转轮藏是北京现存转轮藏中等级最高的。

雍和宫创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原是康熙皇帝在明代太监官房的旧址上为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皇帝）修建的府邸。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后，改称雍亲王府。胤禛登基后，于雍正三年（1725）钦定雍和宫。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暴死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中，后把灵柩停放在雍和

宫,为此,雍和宫内的主要建筑由绿琉璃瓦改成黄色琉璃瓦,提高了建筑等级。此后,这里又成为供奉清帝祖先的祠堂。

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为笼络蒙藏上层人士,将雍和宫赐给西藏喇嘛,并将雍和宫改建为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成为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雍和宫是由王府改建为寺庙,所以在建筑格局上仍然保留王府的形制,既有宫殿金碧辉煌的建筑,又有寺庙庄严肃穆的气氛。其建筑以法轮殿和万福阁最为辉煌,是一座融汉、满、蒙、藏建筑特色于一体的喇嘛教寺院。



雍和宫永康阁中的转轮藏

万福阁是雍和宫内最高大、规模最宏伟的殿阁。在万福阁东西两侧架有飞虹天桥,西通延绥阁,东通永康阁,形成并肩三开式建筑组。永康阁中的转轮藏与智化寺内的转轮藏一样,是室内转轮藏,它有两层楼高,很像颐和园的转轮藏亭,是一座描金彩绣的花塔。花塔的每面都有一尊坐佛,佛身镏金,法相庄严。在花塔的梁枋上都见镏金的和玺彩画,这种彩画是最高级别的彩画,一

般只在皇宫中才能看到,可见其等级尊贵。花塔前供奉着“吉祥八宝”法器及莲花枝。

由于采用了平面增高的施工法式,为在万福阁两旁的永康阁、延绥阁内设置木制“转轮藏”和“开莲观佛”的地下机关装置创造了良好的地形和装设条件。在礼佛时,可以启动转轮藏下的机关,转动花塔,每面花塔佛像前的门会一开一合,营造出神秘的宗教气氛。

崇佛是统治少数民族的需要,用喇嘛教联系、控制少数民族领袖,是清朝统治者的统治政策,更被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自觉地运用着。雍正皇帝生前曾多次在雍和宫内举办法事,在统治阶级上层掀起了一股崇佛之风。

在规整的阁楼建筑下,此处深藏于王府之中的转轮藏以镏金、彩画等多种形式来体现着非凡的皇家气派。

3. 皇家园林中的转轮藏

颐和园的转轮藏建筑群位于佛香阁的东侧,由正殿、配亭和“万寿山昆明湖”石碑组成,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清漪园建筑,主要用于帝后贮藏经书、佛像及念经祈祷。

当我们考查颐和园这处转轮藏的特点时,首先要考虑到它是一组建于帝王之家祈福纳祥的建筑物。转轮藏,以及和它在同一等高线上的五方阁,都是为实现封建统治者宗教统治思想服务的。

转轮藏的正殿是一座两层的藏经楼,楼阁面阔三间,歇山式三重檐,楼顶为三个勾连搭攒尖顶,上面站立着形态完美的福、禄、寿三星的琉璃塑像。正楼两翼用弧形游廊连接东西两座配亭,亭内分上下两层,每层正中安设彩油木制转塔,木亭底下设有机关。当帝后礼佛时,便可以启动转轮藏亭下的机关,以使转轮藏能够像摩尼桶一样旋转。转轮藏亭每转动一周,即表示帝后已经将内贮的经文念诵一遍,向内藏的佛像参拜了一遍。既不失宗教仪式的神秘、威严,又融于山水之趣。

这处转轮藏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出统治



颐和园佛香阁
东侧的转轮藏建筑
顶部的“福”“禄”
“寿”三仙

者揉合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乾隆皇帝受其父雍正的影响,雍正皇帝很注重让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同时也很注重儒道两家的作用。雍正认为:儒释道三者是共通的,都是教育百姓如何做人,如何从善。并且,雍正皇帝认为“性命物二途,仙佛无二道。”为此,他经常帮助调和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矛盾^④。

乾隆皇帝十分推崇“弘扬佛法,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并运用到造园艺术上。“佛”与“孝”是中国封建社会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而“孝”是儒教学说中的支柱理论。清朝是以少数民族来统治汉族,必然在任何场合都会把儒家思想置于神圣不可动摇的位置上。乾隆皇帝在设计整个“万寿昆明佳山水”时,打着为母庆寿的幌子,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他在万寿山的建筑中展示着儒家“知恩必报”的处世哲学,也是“以孝治天下”的一次实际应用。

另外,佛讲轮回,教育人们要在今世多修行。对于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来说,抄写经文和诵念经文都是修行的好方法。从孝的方面说,乾隆皇帝设置的这处转轮藏可以更快地为其母积功德,以报养育之恩。

颐和园的转轮藏吸收了“看藏”和“转藏”两种形式,主体建筑藏经阁就是我们前边所提到的“经藏”。无论是在汉传佛教的

寺庙中,还是在藏传佛教的寺庙中,藏经阁都很常见。佛教的教义玄妙深奥,典籍浩如烟海,“藏经”是学习佛法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僧人们把经文一卷一卷地放置起来,也被看成是对佛法的一种崇敬。

转轮藏亭是对藏经阁的变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外形美观,又十分方便那些不精通佛教典籍的人,以及没有时间去看“看藏”的信众,帮助他们在短时间内积攒功德。皇室成员前来礼佛时,只要启动转轮藏亭下的机关,转轮藏亭里的木塔便如两个巨大的摩尼桶一样旋转。可以说,转轮藏建筑群的设置迎合了皇室成员诵念经文的需要,又寓情于景,远远看去只见亭台楼阁,其间又有佛像金光闪耀。

乾隆皇帝崇佛,并且很早就开始接触佛法,被雍正皇帝收为弟子。雍正皇帝自号“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意为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乾隆皇帝是雍正皇帝收下的几名皇室弟子中的一员,自认悟性很高^⑤。所以,他在设计万寿山上的建筑物时,不仅要表达出自己的一份孝心,更是要高调宣扬自己所信奉的佛教理念。当然,这就是他与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沟通感情的基础。

颐和园的转轮藏主殿上立有琉璃的福禄寿三星的塑像,这是颐和园独特的福寿文化的体现。我们知道,福禄寿三星是中国民

间崇拜的神仙人物,分别代表了幸福、官禄和长寿,是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帝王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民间有所谓“三星在户,福寿绵长”的说法。

不过,在皇家御苑中放置福禄寿三星还有更深的用意。福星本为木星,又称“岁星”,星相术中称“岁星所照,能降福于民。”有人分析说昆明湖象征寿海,而像一个寿桃的万寿山则意喻福山,正是取了福山寿海之意,有几分道教文化中人间仙境的意味,又暗含福荫于民的统治意识^⑥。

《韩非子》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出了人生的终极追求,就算是生于帝王之家,一生追求的也不过是这几样东西。从这几点因素来看,转轮藏正殿三个勾连搭攒尖顶上站立的福、禄、寿三星的琉璃塑像蕴含了丰富的含义。它们是民间文化中的俗神,是道教文化中的仙人,是传递吉祥的使者。这样的三尊塑像只可能在园林山水中出现,因为室内的转轮藏上没有与天相接的背景,无法映衬这样的三位仙人,而在雍和宫这样的王府内又是等级森严,神秘莫测,也不适合使用这样的造像。所以,这样的既贴近民间,又居高临下的三尊神像是颐和园福寿文化特点的一个体现。

三、小 结

转轮藏从建筑形式上实现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融合:它可以与古典建筑中常见的亭台楼阁相组合,比如颐和园内的转轮藏;或与汉传佛教中的庙宇楼台相组合,比如智化寺藏殿内的转轮藏。

北京现存的这三处转轮藏保存完好,它们各自散发出不同朝代、不同建筑规制下的佛教文化魅力。

从修建时间上说,建于明代智化寺藏殿内的转轮藏历史最为悠久,它位于一座汉传佛教的寺庙中,与民俗生活相连,由民间香火直接供养。曾是一代权监家庙的它,不需要像皇家寺庙那样制造出过多的神秘气氛。跟皇家庙宇相比,它是开放的,它需要民众

的参与来实现香火的旺盛与人气的聚集。一座不能转动的转轮藏虽然少了几分开合之间的神秘感,却大大方便了佛教信徒们的礼拜,尤其是不识字信徒的朝拜。虽然不能转动,但是这座转轮藏建筑却满载了宗教信息,它运用多种建筑手法直接向信众普及佛教知识。

清代的两处转轮藏建筑是民族宗教政策的产物。但是,从建筑等级上说,位于雍和宫内的转轮藏因为其主人而非同一般。雍正皇帝在未登基前就与喇嘛交往甚密,此处转轮藏主要是用于法事活动,所以,雍和宫内的转轮藏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的风格。并且,它又处于王府深宅之中,显得十分森严、神秘。虽然雍和宫与智化寺一样,都是平地建寺,但是采用了平面增高的施工法式,使得在高大的阁楼下可以安装机关装置,做成可以转动的转轮藏。

乾隆皇帝为庆母寿时修建的转轮藏亭,虽然从建筑的外表上看不如智化寺的转轮藏华贵精美,但是它在更深层次上融合了儒释道三种文化,又隐于锦绣山水之间,庄严又不失秀美。它在一组建筑中既保留了传统的藏经习惯,又吸取了藏传佛教中的摩尼桶的形制。这处建于苍松翠柏中的亭式建筑,满足了“福山寿海”的自然环境,虽有皇家风范,却不像雍和宫内的转轮藏那样森严、神秘。

① 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前言”,2000年2月第1版。

② 刘若晏:《颐和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77页,1996年10月第1版。

③ 智化寺管理处:《古刹智化寺》,北京燕山出版社,132~139页,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

④ 司马哲:《细说清朝十二帝》,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⑤ 向斯:《皇帝的佛缘》,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158页。

⑥ 殷伟、殷斐然:《中国民间俗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作者为颐和园研究室工作人员)

浅谈法海寺曼陀罗的深刻内涵

苗天娥

法海寺坐落在京西石景山区风景优美的翠微山南麓,为明代皇家宝刹,建于正统年间,已有560余年的历史,素以大雄宝殿内美仑美奂的佛教壁画享誉中外。但是在法海寺还有一大特色鲜为人知,那就是镶嵌在大雄宝殿天花板上的三个大曼陀罗藻井和231块法曼陀罗天花板。它不仅在建筑艺术上富有特色,而且还蕴藏着深刻的佛教内涵,为国内所罕见。本文仅就法海寺曼陀罗的性质、内容作一浅显的剖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同行诸好。

一、密宗概况

密宗起源于印度,是印度佛教的最后一个阶段,有“金刚乘”、“大乘”、“真言宗”和“密教乘”等各种叫法。佛教自释迦牟尼死后便分裂为许多派别,其中一派是密宗,此派自称其经典仪轨都是由释迦牟尼亲自秘密传授,乃真正佛教正宗,因此又叫真言宗,据传龙树为开山鼻祖。密宗是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和印度地方一些民间信仰的混合产物。在强调供养诸尊的同时,念诵与供养的种种规定也逐渐完善,并组成具体的方形或圆形的土坛,将诸佛位置安排妥当以便祭拜。这种土坛就是曼陀罗。这种密咒的修行与《法华经》的哲学相结合,由此建立的宗教体系就是秘密佛教,简称密宗。

密宗崇拜的对象是集密、胜乐、大威德等本尊及各种度母,其中把大日如来(即大毗卢遮那佛)视为根本佛。可以说大日如

来是密宗各如来的代表,也就是密宗佛的代表。为表现其直观的意趣,而有大曼陀罗。密宗认为六波罗密不必采取特殊复杂的仪式,很容易通过观想曼陀罗达到究竟的境界,即身成佛。

密宗修法有专门的场所,也就是曼陀罗,它不仅显示密宗法力的形象,而且也解释宇宙的构成,相当于密教的立体经变,它是有历史渊源的。约在东汉初期佛教东渐,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流行的儒教、道教日趋融合,并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直至最后三教合流,完全汉化,因此佛寺庙宇采用原始印度教建筑形制中轴对称(如印度最早佛教塔庙为了强调其永恒的纪念性,著名的桑基大塔、菩提伽耶大塔等都是采用十字轴线对称的布局形式)和中国传统祠庙相结合的样式,多讲究十字对称和布局规整,其造型正好与中国传统的明堂做法不谋而合。由于密宗的作法仪轨和中国传统的祭祀形式很相似,曼陀罗的构图又和中国坛庙(如明堂)的构图基本一致,所以密宗也容易被中国人理解接受。喇嘛教保持着较多的密宗内容,非常重视以形象说教,所以密宗作法受戒时通常采用的方圆相间、十字轴线对称、九宫分隔的祭坛型建筑——曼陀罗就被当作宣传密教宇宙观的模式而普遍应用。

二、曼陀罗的形式与内容

曼陀罗(Mandala)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又称曼达、坛城、法坛,被看作密宗最精

华的东西,是诸佛设坛修行成佛的地方,也可解释为佛教理想中的极乐世界,密教用它来比喻世界观和宇宙观。曼陀罗本是密宗法师做法事的坛位,习密者修法时为了防止魔众侵入,在修法场地筑起圆形或方形的土台,国王即位或剃度僧人,均在台上举行仪式,迎请诸佛菩萨亲临作证,并在台上绘出他们的形象。后又引申为神佛位序,以至宇宙构成。它们的形式大都是十字轴线对称,方圆相间,四向设门,中心为圆轮,轮中按“井”字分隔为九个空间。

归纳起来,曼陀罗的主要意思有三个:(1)供奉密宗诸佛菩萨的道场或坛场;(2)表现诸佛菩萨悟道的图像、图画;(3)附于佛画上的咒语。简单讲就是在画面上设方形或圆形的土坛,在坛内安置诸佛菩萨之像,并加以供奉,是为曼陀罗本意。就其引申含义可以理解为蕴集精华、辐射光芒、轮圆具足的意思,也就是说:曼陀罗在坛中聚集诸佛诸德成一大法门,就像古时木制车的大车轮,只有具备了毂辋輜辐,并经过不停的运转,才能成为一个圆满的车轮,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曼陀罗也是一种修习的境界,把它画在布上,刻在碑上,或做成模型摆在殿堂里,令僧人从中发现佛界宇宙的含义。慧果和尚说:“真传密藏,经疏隐密,不假图画,不能相传。”因此曼陀罗借丹青的功力来表达它的深刻内涵,现存于雍和宫的许多唐卡画坛城和金银等材料制作的立体曼陀罗模型以及法海寺大雄宝殿天花板上的曼陀罗造型都是这种理念的真实再现。

据密宗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所述曼陀罗构成,坛中佛、菩萨、金刚、供养、天女等都是按四正四斜八方配置。通常曼陀罗中绘有五方佛,以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呈九宫式对称分隔,间隔为五方,周边为八方;在此格局内配置八大菩萨、八大明王、八大供养等等。《金刚顶经》在八方外再加上下两方而为十方,称曼陀罗“十方世界”,所谓“十方诸国土,天上及下方”、“四维上下界”即此观念。这是由密宗教义决定的,密宗认为:佛居宇宙正中,向四

方衍变为四种“波罗密”相,代表佛的“四智”;宇宙的中心是须弥山,有一主峰及四小峰,日月在其左右升降;主峰中央为佛的住所,名“帝释宫”,四面有供佛菩萨游玩的四苑;须弥山位于大海的中央,周围对称有陆地,名“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它们与须弥山共同构成九山八海;最外是宇宙的边缘,名“铁围山”。在这个布局严谨的宇宙空间中,各种佛、菩萨、天王、协侍都有各自的位置。总之,曼陀罗是一个十字轴线对称、呈九宫格局的模式,内中九山八海、神佛聚集。

曼陀罗就其直观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以下四种:(1)大曼陀罗;(2)三昧耶曼陀罗;(3)法曼陀罗;(4)羯摩曼陀罗。

大曼陀罗:总集诸佛菩萨形象之坛场,以图画来表现坛场的全景和诸佛菩萨的形象与位置,并用青、黄、赤、白、黑五色表示地、水、火、风、空五大,是我们眼中所见的诸佛菩萨世界的总体,表示宇宙的全体形象,故称大曼陀罗。

三昧耶曼陀罗:又称三曼陀罗,是不绘出佛、菩萨形象,只绘画诸佛菩萨手中所持的器械和印契的曼陀罗,及诸尊手中所持的器械及印契,如所持宝珠、金刚杵、刀剑、法轮及手印等,表达普救众生的誓愿而决不反悔,行者看见这些道具,就如同看到所代表的佛、菩萨。

法曼陀罗:又称种子曼陀罗,是描绘诸佛菩萨的种子真言和一切经典之文字义理的曼陀罗。这是用梵文种子字来表示真如真言的世界,每一个梵音种子,都象征密宗佛菩萨的广大威力。甚至经论之文字、言语之义理及真言种子陀罗尼等,凡关法文义理,均称法曼陀罗。

羯摩曼陀罗:表示作业、动作、铸造形象,包括佛菩萨身上的一切威仪及铸像泥塑等作业,称为立体曼陀罗,表示着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活动作用。

曼陀罗从内容上来区分,可分为俩部曼陀罗和别尊曼陀罗。

所谓俩部曼陀罗,一部指《金刚顶经》

之金刚界曼陀罗,描述诸佛菩萨得悟传至人间的过程,表示“像金刚石般伟大世界的曼陀罗”,犹如金刚石般坚固,不为外物所坏,不为一切烦恼所破,计有佛教诸尊图像1461尊。另一部指《大日经》之胎藏界曼陀罗,描述诸佛菩萨的得悟,表示“从此产生大悲母胎那样的曼陀罗”,犹如胎儿在母胎内,亦如莲花之种子蕴含在花中,由大悲哺育,计有佛教诸尊图像416尊。此两部曼陀罗以普门总体之大日如来为中台主尊,故又称普门曼陀罗。

所谓别尊曼陀罗,以皆自大日如来无量差别智印中之一智出现,成为大日如来之眷属,各主一门之德,故又称一门曼陀罗,如弥陀曼陀罗等。

三、法海寺曼陀罗的形制及内容

1. 大曼陀罗藻井

在驼铃古道模式口村长久以来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法海寺的木工,田义墓的石工,承恩寺的地工”,都是名副其实的绝活,简直就是鬼斧神工。法海寺的木工活以现存的大雄宝殿木结构建筑为杰出代表,其中更以藻井和天花板制作工艺最为精巧。藻井镶嵌在大雄宝殿的天花板上,共有三个,都是明代原物,属于大曼陀罗体系。

藻井是我国传统建筑室内顶棚上的一种装饰处理,顶部为穹窿状的天花,印饰以花纹、雕刻和彩画,故名藻井。《辞源》解释藻井为“绘有文采状如井干型的天花板,有荷菱等图案”。宋《营造法式》对藻井的做法、尺度有专门的论述和规定。藻井在建筑中的使用代表了尊贵与等级,它如同伞盖般高出天花之上,以烘托和象征天宇般的崇高和伟大。早期藻井形制都很简捷,到了隋唐时,图案趋向繁缛富丽,变幻多端,意味无穷。从现存古建筑的藻井实例来看,藻井一般位于寺庙建筑中神像的顶部和宫殿帝王宝座的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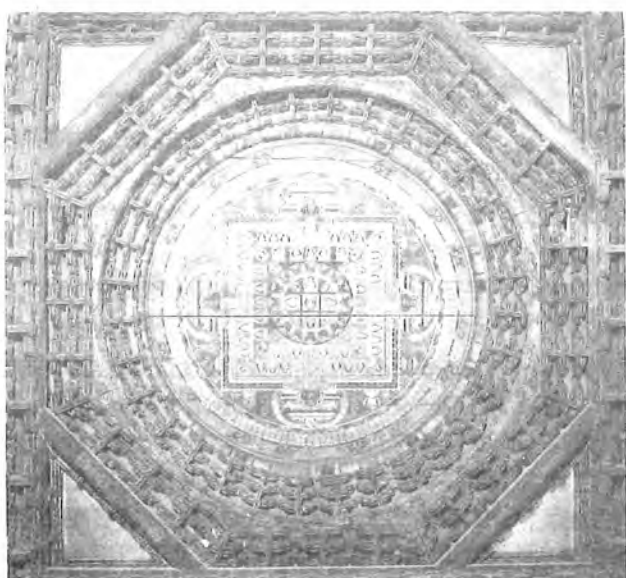
法海寺大雄宝殿内三个造型相同的藻

井,是我国现存的明代藻井实物中的精品。这三个藻井上圆下方,通高一米,分作三层,层层上收。最上层为圆形,中间层为八角形,最下层为正方形,可能象征着佛所居住的玄妙的须弥山。每层镶嵌小方木块拼成的斗拱,个个精雕细琢,巧夺天工,主要起装饰、美化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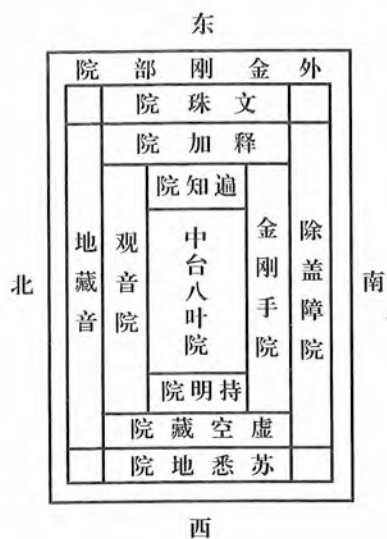
法海寺的三个藻井顶部都绘有曼陀罗,中央藻井顶部绘制毗卢遮那佛曼陀罗,东边藻井绘药师佛曼陀罗,西边藻井绘弥陀佛曼陀罗。先从形式上来看,法海寺的藻井曼陀罗属大曼陀罗体系。大曼陀罗就是总集诸佛菩萨形象之坛场,以图画来表现坛场的全景和诸佛菩萨的形象与位置,是曼陀罗的总体,因其广大,所以称为“大”。同时,“大”还含有“五大”的意思,因为图画的颜色都按照“五大”(地、水、火、风、空)的色系着色。这是大曼陀罗的定义,法海寺的藻井曼陀罗和它完全吻合。下文以中央藻井为例来说明。

中央藻井绘制的是毗卢遮那佛曼陀罗,整个画面展示的佛设坛讲经时的坛场全景,正中央是本尊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在密教,毗卢遮那佛与大日如来同体,或为大日如来之别名,乃现法身、智法身不二之体,有消除黑暗遍照光明之意。),四周具千百佛菩萨,井然而列。一眼所见,俱是诸佛菩萨,可谓“大”。密宗行者可将这些曼陀罗作为观想的对象,然后将自己置身其中,化入圣域空间,将“我”与“佛”变成一体,达到即身成佛的境界。同时,在神圣的佛坛上,装饰性的卷草纹俱按地(黄)、水(白)、火(赤)、风(黑)、空(青)的颜色为图画着色,体现了“五大”的含义。

另外,在诸佛菩萨庄严尊像的周围,还安放了一堂玲珑剔透的“袖珍仪仗”——八宝,即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长,佛说法轮为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物,法螺为具菩萨果妙音吉祥之物,宝伞为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物,白盖为遍复三千净一切药之物,莲花为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物,宝罐为福智圆满具完无漏之物,金鱼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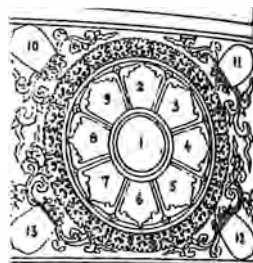
图一 中央藻井为胎藏界曼陀罗



图二 十三院



图三 法曼陀罗



- ① 毘卢遮那佛
- ② 西方阿弥陀佛
- ③ 白衣佛母
- ④ 南方宝生佛
- ⑤ 莽忙计佛母
- ⑥ 东方阿閼佛
- ⑦ 佛眼佛母
- ⑧ 北方不空成就佛
- ⑨ 救度佛母
- ⑩ ⑪ ⑫ ⑬ 四大天王

坚固活泼解脱攘劫之物,盘长为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物,这八件是佛家常用的象征吉祥的器物,更增添了神秘、庄严、祥和、圣洁的气氛。

再从内容上来看,法海寺藻井曼陀罗既有普门曼陀罗,又有别尊曼陀罗,其中央藻井为普门曼陀罗,东西两边藻井为别尊曼陀罗。

如前所述,普门曼陀罗中的金刚界和胎藏界曼陀罗都以大日如来为中台主尊,法海寺中央藻井曼陀罗的正中央正是密宗的本尊——大日如来,所以它属于普门曼陀罗。再具体一点划分的话,中央藻井曼陀罗属于普门曼陀罗中的胎藏界曼陀罗。因为这俩部曼陀罗都非常被重视,只是表达的佛教内涵略有区别,其智德以金刚界大日如来表示,其礼德以胎藏界大日如来表示;理、智虽然二分,实际亦不相离。密教仪轨规定,金刚界曼陀罗中的中台主尊大日如来位于五佛中央,现菩萨形,身呈白色,头戴五智冠,双手结智拳印,结跏趺坐于七狮子座,此即智法身;而胎藏界曼陀罗中的中台主尊大日如来位于中台八叶院中央之理法身,亦现菩萨形,身呈黄金色,头戴五佛冠,双手结法界定印,结跏趺坐于八叶莲花台上。法海寺中央藻井曼陀罗正中的主佛大日如来的庄严法相和胎藏界曼陀罗中大日如来应该具备的特征一模一样,由此断定中央藻井为胎藏界曼陀罗。(见图一)。

实际上此曼陀罗有十三院(见图二),图中只列出十二院。大日住中台,四佛四菩萨住八叶,合有9尊,为中台八叶院。四佛分别为无量寿佛、宝幢佛、开敷华佛、天鼓佛,四菩萨分别为文殊、观音、弥勒、普贤,分住莲花的八叶,八叶莲花表示八瓣肉团心,显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理趣。故中台八叶院为胎藏界曼陀罗之总体,其他院为别德。第一重之上方遍知院,是佛身重德庄严。下方持明院,是佛持明使者,皆如来部门。右方观音院,是如来大悲三昧,能滋润万善,故名莲花部。左方金刚手院,是如来大慧力用,能摧破三障,故名金刚部。第二重依次

为释迦院、虚空藏院、地藏院、除盖障院。一言以蔽之,大日如来居于正中,周围为四佛四菩萨,再与外道及天鬼神的最外院,合成四层同心方形,前十二院共安放佛、菩萨、金刚等神像414尊。第十三院为四大护院,是守护曼陀罗四门的四位金刚神,东门为无畏结护者,北门为坏诸怖结护者,西门为难降伏结护者,南门为金刚无胜结护者,号称四大护。

不过,法海寺中央藻井曼陀罗因空间所限并没有画出胎藏界的所有佛菩萨,只画了一部分佛菩萨,共217尊,内外共4重,圆中有方,方中套圆,形式上有变化和突破。中央中台八叶院非常明显,为圆形,9尊佛菩萨。往外第一重圆形上置16尊菩萨,四隅4尊,亦圆形排列。再往外为两重方形,分别安置佛像24尊和28尊。第四重圆形,在四座坛门之外,密布佛像136尊。所有佛菩萨像均贴金,闪闪发光,辉煌耀眼。

别尊曼陀罗以大日如来之眷属各主一门之德,如弥陀曼陀罗、药师曼陀罗等属此种,法海寺东西两边藻井的曼陀罗就是别尊曼陀罗。

以西边藻井弥陀曼陀罗为例。此图共二重,内院中央有大月轮,其中置八叶莲花,其上又画八叶莲花。内八叶莲花之中央台上置阿弥陀佛,头上戴宝冠,结定印跏趺坐;外八叶,各安八佛像,皆结定印跏趺坐。此之八叶,自东方顺次回转而安观音、弥勒、虚空藏、金刚手、普贤、文殊、除盖藏、地藏八菩萨。

2. 法曼陀罗天花板

法海寺大雄宝殿内天花板也是非常珍贵稀有的文物,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每一方格内都绘有法曼陀罗。这种曼陀罗均以本尊梵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作为主尊种子来代表本尊。据专家考证,中央为密宗本宗毗卢遮那佛,周围八瓣朱色莲花上分别是西方阿弥陀佛、白衣佛母、南方宝生佛、莽忙计佛母、东方阿处佛、佛眼佛母、北方不空成就佛、救度佛母。四角佛龕中为四大天王,

分别是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佛龕两侧靛蓝底色上绘制翠绿色蔓草,舒卷自如,采用描金画法。支条上画三股金刚杵,并与各个曼陀罗相连,制作富丽堂皇、严谨大方(见图三)。

那么,法海寺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密宗的内容?这与法海寺当年建庙时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分不开的。据法海寺现存碑刻记载,法海寺当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寺庙,表现在:一是该寺建于明初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功德主为御用监太监李童,许多达官贵人捐资,动用宫廷内官监能够干预插手的工部营缮所169名能工巧匠修建的,现存于法海寺山门外西侧山坡上的楞严经幢中有明确记载,修建法海寺动用了隶属于工部的营缮所18种工种,故此建筑风格、规制带有半官方的性质;二是法海寺开山初期有不少著名藏族僧侣捐资、参与设计、修建,如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弟子哑蒙葛、班丹扎释以及后世封的大智法王,还有“同开山喇嘛领占巴、扎失乳奴、扎失远丹”,这在北京寺庙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殿堂设计、装饰具有浓郁的藏传喇嘛教寺庙色彩,既有密宗造像(如位于大雄宝殿东侧十八罗汉前端的大黑天神),又有密宗曼陀罗,还有陀罗尼经幢三座、上刻有许多真言和经咒的青铜梵钟;三是高僧大德住持,显赫中贵助缘,宫廷多所眷顾,具有皇家庙宇的性质。法海寺的第一代开山住持是福寿禅师,任职僧录司左觉义兼大功德寺住持,第二代住持是福寿的高足慧义,任职僧录司左善世,皆为当时佛教界名流。不仅如此,为法海寺捐资助缘的还有明初大太监王振,其名列在助缘人名单的首位,其下有金英、范弘、喜宁、曹吉祥等著名太监,都地位显赫、大权在握。而且,皇家非常重视法海寺,寺成,明英宗赐额“法海禅寺”,正统十年(1445年)又赐《大藏经》,正统十二年(1447年)敕赐青铜梵钟,嘉靖三年(1524年)皇家又赐给法海寺一套铸铁花瓶。因此,法海寺创建之初就显

出与众不同,从曼陀罗的运用也可见一斑。

从艺术角度来看,曼陀罗真正体现了密宗的精华,堪称密教艺术的珍品。它的出现和发展,是密宗佛像通过绘画和雕塑,得到圆满的聚集和表现。所谓“圣贤聚集,万德交归”,把佛的世界转变成凡人眼睛看得见的形象,把密宗博大精深的义理和修法,通过独特的、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和布局流传后世,曼陀罗的出现,使密宗佛像的发展达到巅峰。

如此神奇的密教大宇宙——曼陀罗在法海寺藻井上出现,那么它的深刻内涵也就不言而喻了。像法海寺大雄宝殿内这样内涵丰富、制作精美的曼陀罗藻井在全国范围内已是十分罕见了。它的存在,不仅为我们研究明代建筑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填补了密教史上的空白,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①《中国佛教》(二),知识出版社,中国佛教协会编,1982年8月第1版。

②《佛教图像说》,巴蜀书社,弘学编著,1999年10月第1版。

③《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北京燕山出版社,常少如主编,1996年2月第1版。

④《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冉光荣著,1994年7月出版第1次印刷。

⑤《走近雍和宫》,民族出版社,雍和宫管理处编,1999年10月第1版。

⑥《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⑦《中国佛教图像解说》,业露华编著,张德宝、徐有武绘图,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⑧《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丁福保编纂,1984年1月第1版。

⑨《北京法海寺》,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汇编,2001年9月。

⑩《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宿白著,1996年10月第1版。

(作者为北京法海寺文物保管所副研究馆员)

清代龙袍的十二章纹饰

孙
秋
霞

清代皇帝的服饰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礼服、吉服和便服。礼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袞服、补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龙袍、龙褂;便服即常服,是在典制规定以外的平常之服。龙袍,是上下连属的通身袍,比礼服略低一等,是皇帝在一般性的吉庆宴会、朝见臣属的时候穿用的常见礼服,也是我们常见到的帝王服饰。

帝王们穿着的龙袍,在现代人的心中很容易产生敬畏与神秘的感觉。尤其对龙袍上制作精良、细腻、造型独特的纹饰图案充满疑惑,本文将对此做简单的介绍。

帝王的服饰上绣有各种寓意吉祥、色彩艳丽的纹饰图案。如:龙纹、凤纹、蝙蝠纹、富贵牡丹纹、十二章纹、吉祥八宝纹、五彩云纹等等。这些图案只为封建社会里的帝王和少数高官所服用,并不普及。如:龙、凤纹向来是帝、后的象征,除了帝、后之外任何人不得使用。十二章图案,自它在中国图纹中出现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专有纹饰,一直到封建帝制的灭亡,只应用在帝、后的服饰和少数亲王、将相的服饰上,从未在民间出现过。

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清乾隆明黄缎绣五彩云蝠金龙十二章吉服袍(图一)。此袍严格按照繁缛复杂的清代服饰制度制作。据《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志》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襟左右开,棉、袷、纱、裘,各惟其时。”说明到了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于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

这件龙袍上的每个图案都有着丰富的意义,起到特殊的作用。而且无论是选料还是绣工都是十分严谨工整的,代表了清代鼎盛时期的工艺水平。

首先,龙袍通身绣九条金龙。正龙绣得正襟危坐,一团威严,行龙绣得极富活力,似动而非动。四条正龙(图二)绣在龙袍最显要的位置——前胸、后背和两肩,四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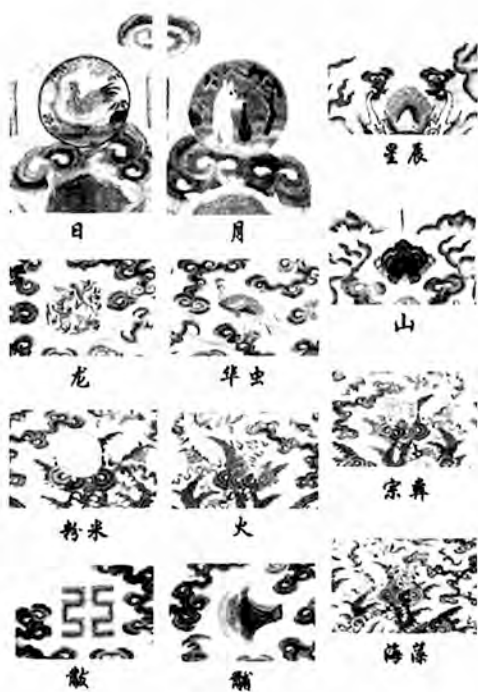
图一 清·乾隆明黄缎绣五彩云蝠金龙十二章吉服袍



图二 金龙纹—正龙



图三 “洪福”纹



图五 十二章



图四 水脚

龙在前后衣襟部位,这样前后望去都是五条龙,这寓意九五至尊。但是我们这样粗略的算下来却只有八条金龙,这与史书上记载的有出入,于是有人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本身就是一条金龙,穿着龙袍后金龙就达到九条了。其实这第九条金龙绣在里面的衣襟上,要掀开外面的衣襟才能看到。

在龙纹之间,绣以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等吉祥图案。五彩云纹是龙袍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图案,既表现祥瑞之兆又起衬托作用。红色蝙蝠纹即红蝠,其发音与“洪福”相同,也是龙袍上常用的装饰图案(图三)。在龙袍下摆排列着代表深海的曲线,这里被称为水脚(图四)。水脚上装饰有波涛翻卷的海浪,挺立的岩石,这寓意福山寿海,同时也隐含了“江山一统”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在这件龙袍上,寓意最深刻的却是十二章纹样,只是它们的面积都很小,再加上清代帝王礼服色彩鲜艳,图案丰富,使人们忽略了这拥有悠久历史、蕴含丰富的纹饰。这十二章纹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列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纁,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十二章纹发展历经数千年,每一章纹饰都有取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会绘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辩也。”^①(图五)也就是说:日、月、星辰代表三光照耀,象征着帝王皇恩浩荡,普照四方。山,代表着帝王的稳重性格,象征帝王能治理四方水土。龙,是一种神兽,变化多端,象征帝王们善于审时度势的处理国家的大事和对人民的教诲。华虫,通常画为一只雉鸡,象征王者要“文采昭著”。宗彝,是古代祭祀的一种器物,通常是一对,绣虎纹和雌纹,象征帝王忠、孝的美德。藻,则象征皇帝的品行冰清玉洁。火,象征帝王处理政务光明磊落,火炎向上也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意。粉米,就是白米,象征着皇帝给养

着人民,安邦治国,重视农桑。黼,为斧头形状,象征皇帝做事干练果敢。黻,为两个己字相背,代表着帝王能明辨是非,知错就改的美德。总之,这十二章包含了至善至美的帝德,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固照临之内”。

这十二章纹自出现开始,虽历经两千多年的朝代更替,因其意义深刻,始终保持着原始的形态,几乎没有改变,这也是其他普通装饰图案无法比拟的。十二章图案传说在虞舜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使用了。只不过在现有出土的甲骨文中没有发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是据《虞书·益稷》篇中记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即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黼、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②这是记载最早的关于十二章图案的书籍。在《虞书》中的这种记载,大概是周代史官们对前代的追述。这样看来,上述的所谓日月等十二种纹样,用五彩色施于衣裳上,即十二章花纹在周代以前就用画或绣的方法施之于最高统治者的衣服上了。说明周代以前就已经使用十二章图案,并且一经出现就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象征,具有政治意义。以后各代帝王的礼服上都装饰有十二章纹,只是十二章位置、色彩略有变化。

清代的冠服制度是中国服饰史中最繁缛复杂的。他们对于十二章纹的形状、色彩、位置等都作了十分细致严谨的规定。但是在乾隆以前,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都没有发现十二章纹的踪影。这也是伴随着清王朝讨论是否改装易服之事而产生的。

女真人的民族服饰:长袍、箭袖、紧身、下有开衩,利于骑马射箭。在满族政权建立之初,皇太极与群臣就是否易服的问题作了一些讨论。在崇德二年(公元1367年)“谕诸王、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迨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其徐悉

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③

由此便阐明服制是立国之经。皇太极告诫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训,“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一旦从习汉俗,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特别指出,汉族衣冠不利于骑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还要以武功巩固天下”。“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不能改变国初之制。这次讨论之后,无人再提易服之事。

满族在入关后学习汉文化,对于礼仪、服制更加重视。另外,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长袍箭袖已失去实际的作用,再次议论服装改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清前期的几位皇帝认为:衣冠之制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尤其是对定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考,于辽、金、元各代冠服之制,叙载未能明晰。奉谕:‘辽、金、元衣冠,初未尝不循其国俗,后乃改用汉、唐仪式。其因革次第,原非出于一时。即如金代朝祭之服,其先虽加文饰,未至尽弃其旧。至章宗乃概为更制。是应详考,以徵蔑弃旧典之由。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彝,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去其纯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况揆其议改者,不过云衮冕备章,文物足观耳。殊不知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龙藻火,粲然具列,皆义本礼经,而又何通天绛纱之足云耶?’盖清自崇德初元,已釐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而犹于变本忘先,谆谆训诫。亦深维乎根本至计,未可轻革旧俗。祖宗成宪具在,所宜永守勿愆也。兹就乾隆朝增改之制,……。”^④

可见在乾隆一朝又再次讨论易服之事时,不是盲目讨论,而是先对辽、金、元各代作了调查研究,认为全部因循汉制也不见得

是好事,并进一步认识到辽、金、元诸君,不循国俗,改用汉唐衣冠,使得“国势浸弱”,致使传之未久,趋于灭亡,深感可畏。另外,在崇德初年就定下了“上下冠服诸制”和不得“变本忘先”的训诫。最终决定:本着“不轻变祖训”的原则,在保持满族服饰特点的同时,吸收汉族帝王服饰的色彩和章法纹饰,如明黄色、补服、十二章纹等,再对服饰制度作一些增加补充,形成最终的典章制度确定下来。

因此,自乾隆以后,清代皇帝的朝袍、袞服、龙袍都装饰有十二章图案,并且把每一章的式样和位置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黻,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

但是到了清代的晚期,皇帝的龙袍上以及后、妃的朝袍上都装饰有十二章图案,或是其中的五章、六章。这也说明清代帝后们对十二章图案看得很重,认为只有穿装饰有十二章的衣服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同时也表现出,到了清代晚期,在制度上虽然更注重繁文缛节,但实际上随着政权的衰落,有些制度已经变样,不免有些随心所欲。

清代的服饰制度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是最庞杂、繁缛的,但是清代的龙袍制作工艺之精湛、用料之考究、艺术价值之高,都是前朝帝王服饰无法比拟的。清代的龙袍可谓是中华服饰中最精湛、最华丽的工艺美术极品。

① 王光镐主编、杨玲撰文:《文物珍宝——明清织绣》,艺术图书公司,1995年6月,121页。

② 华梅著:《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50页。

③ 《清史稿卷一百三·志七十八舆服二》,中华书局,1976年7月,3033页、3034页。

④ 《清史稿卷一百三·志七十八舆服二》,中华书局,1976年7月,3034页。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助理馆员)

清代恭王府花园名称考略

张军

恭王府是清代恭亲王奕訢之府,其前身为乾隆朝权臣和珅的宅第和庆郡王永璘的府邸。王府花园位于府邸北侧,占地面积约28860平方米,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后的王府花园于1982年实现对社会开放,现在已经成为京城一处独特的文化旅游景点。

关于花园的名称,目前流传甚广、且广为接受的主要是“恭王府花园”和“萃锦园”,前者是人们对花园的俗称;后者主要出现于一些介绍、研究恭王府的文章和著作中。对此种称呼,起初笔者也是确信不疑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萃锦园”并不是这座王府花园惟一的正式称呼,其名称存在一个变化过程。由于恭王府花园建造的历史年代尚有待考证,因此,本文关于花园名称的论述是从有确切资料依据的恭亲王时期开始的。不妥之处,敬请各方专家批评指正。

一、朗润园

提起朗润园,人们会想到北京西郊的燕园“朗润园”,然此朗润园又非彼“朗润园”。

对于北京西郊的燕园朗润园,恭亲王奕訢在其诗集里有这样的记述:

“圆明园池东而南,旧有园寓一区,俯枕长河,周围不过里许,是为春和园。咸丰辛亥,余承恩命赐居于此,特发帑金、鸠工、庀才,缮完补阙,是葺是营,肯堂肯构,薙榛莽剔瓦砾,无丹雘之饰,无雕甍之靡,不尚其华尚其朴,不称其富称其幽,而轩墀亭榭,凸山凹池,悉仍其旧。越明年壬子而园成,非创也,盖因也。是岁仲秋,复蒙皇帝临幸,御书易园额曰朗润。”^①

咸丰辛亥为咸丰元年(1851年),也就是说这年奕訢被赐居于圆明园东南的春和园。壬子(1852年)仲秋时,咸丰皇帝驾临春和园,有感于兄弟情谊,以御书匾额的形式把园名易成了朗润园。这座园寓是奕訢正式分府前的过渡性居所。^②

除了西郊的朗润园外,还有一座园也被

奕訢称为“朗润园”。据奕訢《萃锦吟》诗集记载：

“海淀园寓为咸丰辛亥显庙赐居，赐名朗润。当即镌额恭悬，并自撰记以誌。殊恩已刊入乐道堂文钞，兹不复赘。嗣于同治年间，邸园落成，敬将御书墨宝装裱悬挂，故亦名朗润。”^③

从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有座同治年间落成的“邸园”也被奕訢称为朗润园。奕訢所说的“邸园”是否就是指恭王府邸北侧的花园呢？仅依据奕訢的此段表述尚不能直接判断“邸园”（亦即朗润园）就是指现在府邸北侧的花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邸园”确指的合理推断。首先，“邸园”一词，从字面上解释当是指府邸花园，是府主对府邸花园的简称而已。与府邸花园在地理和空间上吻合的只有现在府邸北侧的花园。^④其次，奕訢《萃锦吟》诗集里的另一首诗也有助于推断的明了。在这首诗的诗序中，奕訢作了“和诗”说明，“佩蘅相国，醞卿大司农今岁皆八旬正寿，因于邸中朗润园置酒为贺。翌日，相国寄赠一律，即次元韵奉和”，其中诗的第一句为“怡神在灵府”，并在该句之后作了括注，指明“园内设席处为怡神所”。^⑤从诗序和括注看，奕訢是在府邸的“朗润园”花园与朋友相聚，且园内有处建筑被称为“怡神所”，这与现在府邸北侧的花园有“怡神所”建筑不谋而合。再次，奕訢次子载滢的《补题邸园二十二景》中的“邸园”，载滢也称它为“朗润园”^⑥，说明载滢与奕訢所说的“邸园”实际上是同一座园。而载滢所描述的邸园二十二景都能够现在的府邸北侧花园中找到相应的景点。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恭亲王奕訢时期，府邸北侧的花园被俗称为“邸园”，其正式名称为“朗润园”。

关于城内与城外两座园寓同名的现象，1940年出版的一篇系统介绍恭王府邸及其花园的文章给出了解释：

“对于郊区与城内两座花园重名的令人好奇而费解的事实我们得做一点解释。恭亲王自己写的一首诗曾说明了这个情况。

起初，咸丰皇帝按照传统为郊区花园题写园名，刻在匾额上。后来，同治年间城内花园落成了。由同治皇帝所写的‘朗润园’——白纸黑字确凿无疑，作为第一个版本的摹本，被刻在木质匾额上，挂在城内花园里了，恭亲王如是说。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保存两代皇帝的墨宝，作为一种纪念，故两座花园都有同样的皇帝墨宝。”^⑦

邸中朗润园的第一代园主恭亲王奕訢于1898年死去。考虑到“朗润园”名称的延续性，此处稍作交待一下奕訢死后与花园发生关系的几位王府人物的经历。载滢，奕訢次子，1868年出继给钟郡王奕詒为嗣，但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获罪洋人，被取消出继资格，于1902年回到恭王府。以后常在花园里读书、饮酒、作诗等，对于花园中的景点作有《朗润园二十二景》。溥伟是奕訢之孙，载滢长子，出继给载澂之后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位，成为府邸和花园真正的主人。他以近支宗室的身份参与清末的一系列活动，尤其是清朝覆亡后，变卖王府文物，组织宗社党，进行复辟活动。自1912年离开王府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溥儒、溥德是载滢的二子和四子，由于受其兄溥伟牵连，于1911年离开王府。作为没落的王孙，在1924年再次回到故园之前，一直忙于读书、留学、作画。

综合分析以上几位王府人物的经历，笔者认为在王府花园的下一个名称“萃锦园”出现之前，“朗润园”的名称一直在延续着。

二、萃锦园

恭王府花园被称为萃锦园，这在学界已是熟知的，但在名称的由来上却存在多种说法。熟悉京城风物的赵洛先生在其文中称，“咸丰初年，他住在西郊朗润园（今北京大学内，未名湖西北），以后才改建这府邸，成为恭王府。同治年间，又改建花园，奕訢称为‘萃锦园’”。^⑧ 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在《中国古代园林》一书中对恭王府花园名称作了这样的记述，“恭王府花园，原被恭亲

王奕訢命名为‘萃锦园’,意为集众芳园之精华。”^⑩著名专家杨乃济先生为文称“恭王府后的花园,在老恭王时代被命名为萃锦园。”^⑪故宫博物院已故专家朱家溍先生曾回忆:“溥儒居住时,每年春天请友人赏海棠,即席分韵作诗。溥儒祖父奕訢好集唐人句,后来成集,题名《萃锦吟》;溥儒引用作园名,将此园称为‘萃锦园’。这个名称首先出现在请柬上。”^⑫

上述对于萃锦园名称由来的认识,可以总结为这样两种:一、认为是恭亲王奕訢命名;二、认为是恭亲王奕訢之孙溥儒命名。对于这样两种说法,在依据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更认同后一种看法。理由如下:

(一)提出萃锦园名称是恭亲王奕訢命名的文章多是介绍性的,而非研究性的,说法缺乏历史根据。诚如笔者上面的分析,奕訢称呼邸北侧的花园为朗润园,怎么可能同一座园寓再称其它名称呢?形成这种说法的原因,可能是受奕訢《萃锦吟》诗集影响,进而加以推断产生的。这种推断是很自然的,毕竟“萃锦吟”与“萃锦园”只是相差一字。

(二)朱家溍先生曾受教于溥儒,并到过园中,“我1937年前后从溥心畬先生学画时,曾目睹过盛开的海棠”。^⑬因此朱家溍先生关于萃锦园名称由来的说法当更加可信。这种说法还可以从启功先生的记述中得到佐证。启功,爱新觉罗氏后裔,著名的书画大师,也曾受教于溥儒。“我从心畬先生受教的另一种场合,是每年萃锦园西府海棠开花的时候。先生必以兄弟两人的名义邀请当时有名气的文人来园中赏花赋诗”。^⑭

(三)就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看,在恭亲王奕訢及其子嗣的诗作、文钞中,只有溥儒提到过“萃锦园”:一处在其诗题中,即《暮春宴萃锦园会风寄一山左丞》;^⑮另一处在海印上人诗集的序中,序为溥儒书写,在序的结尾有“壬申暮春之初,溥儒书于萃锦园中”^⑯之语。

至于溥儒改称花园为萃锦园的具体年代,由于不见记载已不可考,但基本可以确

定一个大体的年代范围。依据朱家溍先生的回忆,萃锦园的称呼首先出现在用于邀请友人和有名气的文人到园中赏花赋诗的请柬上。透过这张请柬,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溥儒所应具备的条件:只有常住园中,才有可能把园子与自己的闲情逸致和名望结合起来;能邀请社会名人到自己的园中赏花赋诗,那自己也应当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我们便可圈出萃锦园名称出现的年代范围。

溥儒常住花园在时间上存在两个可能的阶段:1896~1911年;1924~1938年。前一个阶段,溥儒从出生到1911年随母及弟迁出恭王府,在此期间有可能住在园中,但此时的溥儒只是一个正在读书的少年,根本谈不上在社会上的名气。在后一阶段,溥儒1924年从西山戒台寺迁回花园,在此居住直到1938年把花园卖给辅仁大学。

那么溥儒是何时在社会上有广泛知名度的呢?关于溥儒成名的年代可以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南张北溥”说窥探到一二。据熟悉古城旧事的邓云乡先生回忆:“‘南张北溥’的提法和称呼,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第一,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成名的,时间都是在二十年代中叶以后”。^⑰另据近人黄潜记云:“师曾以癸亥病歿金陵,自后十年间,画家派则分歧,诸子亦风流云散。惟有溥心畬自戒坛归城中,出手惊人,俨然马夏”。^⑱癸亥是1923年,溥儒是1924年从戒台寺回城的,因此综合二人说法,基本可以确定溥儒是在1924年回城之后一举成名的。

明确了溥儒在园中常住的时间段及成名的年代后,萃锦园名称出现在请柬上的时间上限便可以确定为1924年,也就是说溥儒有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称呼花园为“萃锦园”的。根据溥儒为海印上人诗集所写的序言,“壬申暮春之初,溥儒书于萃锦园中”,壬申为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这是目前所见溥儒称呼萃锦园的具体年代,也就是说溥儒称呼花园为萃锦园的年代不会晚于1932年,这可以看作萃锦园称呼出现的

时间下限。

自溥儒改称花园为萃锦园后,由于溥儒

的社会地位及影响,“萃锦园”的称呼得到了广泛的认知,并延续至今。

花园名称	题园名者	园主	时间
朗润园	同治皇帝	奕訢 载滢 溥伟	同治年间至 1924 ~ 1932 年的某年
萃锦园	溥儒	溥儒 辅仁大学等	1924 ~ 1932 年的某年至今

三、结 语

基于以上对恭王府花园名称的由来及变化过程的考证,其脉络已经清晰,其延续性可以如上表所示。

在历史的变迁中,这座王府花园的正式名称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当恭王府邸及花园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开放时,花园是否要恢复其本来的名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① 奕訢:《朗润园记》,《乐道堂文钞》,卷五,八一—九。

② 奕訢的正式居所是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分得的恭亲王府,见单士元《恭王府沿革考略》,《辅仁学志》1938 年第七卷第一、二期。

③ 奕訢:《朗润观荷》,《萃锦吟》,卷五,八。

④ 奕訢在府邸旁边还筑有一座园,但在其诗集里明确称此园为“鉴园”,而不是“邸园”。

⑤ 奕訢:《萃锦吟》,卷三,三八。

⑥ 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师吴光辉教授家中藏有载滢于 1902 年留下的一页手稿,上有《朗润园二十二景》和《补题邸园二十二景》,说明“邸园”与“朗润园”是同一座园。吴光辉教授为载滢之子溥偁的女婿。

⑦ DH. S. Chen and G. N. Kates: Prince kung's

palace and its adjoining garden in peking, Monumenta serica, v, 1940, 62 页(H. S. 陈、G. N. 凯茨:《北京的恭王府及其毗邻的花园》,辅仁大学主办《华裔学志》1940 年第五期)。

⑧ 赵洛:《恭王府是不是大观园?》,赵洛著:《宝地》,北京旅游出版社,1983 年,76 页。

⑨ 罗哲文:《北京恭王府花园》,《中国古代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年,66 页。

⑩ 杨乃济:《漫话恭王府》,《蔷薇地丁集》,新华出版社,1998 年,82 页。

⑪ 朱家溍:《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故宫退食录》(下),北京出版社,1999 年,690 页。

⑫ 同上,691 页。

⑬ 启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溥儒《寒玉堂诗集》,新世界出版社,1994 年,6 页,7 页。

⑭ 溥儒:《寒玉堂集》(卷下),河北大学图书馆藏。

⑮ 释永光撰,溥儒辑《碧湖集》(序),民国 21 年。(注:释永光即海印上人,为溥儒好友,两人多诗酬应和。海印上人圆寂后,溥儒整理了其诗作,并在萃锦园中为其结集刊印。)

⑯ 邓云乡:《南张北溥》,《文化古城旧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330 页。

⑰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版,469 页。

(作者为恭王府管理中心助理馆员)

试探无终

韩嘉谷

一、《汉书》“无终子国”的地理位置

夏商时期燕山地区存在许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小国，无终是其中之一。古籍有关这个小国的史料不多，但它在反映商周时期燕山地区氏族部落的分布，以及山戎“病燕”等历史事件方面有其特殊价值，因此受到人们关注。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无终国在今天津蓟县一带，该书在右北平郡无终县下云：“无终子国。溇水西至雍奴入海。”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水经·鲍邱水注》，对相关的山水地理记得更加具体，其云：“溇水又东南迳石门峡，……又西南过无终山，兰水注之，水出北山东流，曲而南，迳无终县故城东，故无终子国也。《春秋》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绛纳虎豹之皮请和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右北平郡治此。《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其水又南入溇水，溇水又西南入庚水。庚水世亦谓之柘水也，南迳燕山下。”庚、溇音同，此庚水即是《汉书·地理志》的溇水。有关山、水地名以及它们的相对位置，皆可寻其踪迹。

关于无终山，其所属有二说。一是今蓟县城北的府君山，郎蔚之《隋州郡图经》云：“无终山，一名步阴山，又名翁同山。”嘉靖《蓟州志》云：“蓟州崆峒山，在城北五里，一名翁同山。……今久呼为府君山，山上有崔府君庙，故名。”另一说以为是今蓟县盘山，见智朴《盘山志》，以为东汉末年田畴避世乱隐居无终山，即是此山，因而又名田盘山。这二说以《隋州郡图经》较可信，因为无终山和盘山均见于《水经注》，前者为溇水所经，后者为洵水所经，显然不属一地，所以盘山不能是无终山，以府君山（崆峒山）属无终山的可能性较大。乐资《九州要记》亦云：“古渔阳北有无终山，上有昭王冢。”此渔阳即蓟县，城北即府君山，盘山在此西北，距离有三十多里。唐李贤注《后汉书》云：“无终本山戎国也。无终，山名，因为国号，汉为县名，属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渔阳县也。”知无终子国由无终山得名，此山虽然不高但影响却大。

经无终山及无终县故城东的兰水，今名黑水河，是溇水的上游支流，由遵化县境入蓟县境，经古强峪长城口、清王爷陵（亦称太子陵）等地，于淋河镇附近入淋河。淋河即溇水，《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俊靡县

下云：“湟水南至无终，东入庚。”汉俊靡县在今遵化县西北。《水经注》记云：“庚水又西南流，湟水注之，水出右北平郡俊靡县，王莽之俊麻也，东南流，世谓之车畚水。又东南流，与温泉水合，水出北山温溪，即温源也。……《魏土地记》曰：‘徐无县东有温汤，即此也。’”此温泉今名汤河，《遵化县志》记：“汤河，州西五十里，源出鲇鱼石山，东南入水门口。”又记：“温泉，州西北四十里，福泉寺下，宽平均半亩，其水无冬夏，常沸如汤，可浴。”《水经注》又记：“湟水又东南迳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此地今俗称龙门，两侧崖壁峭立，形势险峻，附近有石门镇。《遵化县志》记：“石门峡，州西六十里。”即此。

湟水下注的庚水，又称柘水，今名州河，当是取柘、州谐音。此水上游今名灤河，发源于河北遵化县东北境，《水经注》记该水“出徐无县北塞中，而南流历徐无山。”汉徐无故城在今遵化县，徐无山今名鹿儿岭，《畿辅通志》引《遵化州志》云：“鹿儿岭，州东五十里，灤河出此。”灤河西南流，于玉田县北境群山的北侧，今于桥水库处合湟水，燕山当在此处，这一带至今仍有大燕山口、小燕山口、燕各庄等地名。《遵化县志》云：“燕山，州西南七十里。晋咸康四年石虎攻段辽，辽将北平相裕望燕山以自固。”当即此。晋北平郡治为今遵化西南部之平安镇古城，位于燕山口东北。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曰：“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并引《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地望、里程皆和《水经注》合。

上面和无终国相关的山水地理，相对位置都比较明确，位于兰水（今黑水河）、湟水（今淋河）一线以西的今蓟县地，当属汉无终县地无疑，商周时期的无终子国应在这一带。虽然今玉田县也曾称无终县，但这是唐武德二年分渔阳县设置的，不是汉代的无终县地，所以至少无终子国的中心聚落应在今蓟县。

二、“无终子国”故地的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存

有资料表明，蓟县一带作为无终国故地，最晚从商代已经开始，早期文献记载称做“终北”。《列子·汤问》云：“禹之治水也，迷而失涂，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国名曰终北。”古之北海即今渤海，有《孟子·万章》记孤竹君“居北海之滨”可证。孤竹国地望包括今卢龙至辽西，属无终子国故地的蓟县正位于卢龙西，和孤竹同“滨北海之北”，可见商代的“终北”之国应当就是周代的“无终子国”。“终北”国在商汤时已经存在，表明其历史当从夏代已经开始。到周代发展成为有“子”爵封号的“无终子国”，整整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达千年以上，它一直在蓟县土地上繁衍生息，必然会留下相应的遗存。

考察蓟县一带古文化，夏商周时期确是有一支土生土长的青铜文化存在，这便是大坨头文化张家园下层类型、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这三个考古学文化虽然彼此文化面貌有异，但实际上是同一支文化的前后不同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但发展脉络清晰可寻^①。大坨头文化孕育于昌平雪山一期文化，它早期陶器群中居主要地位的陶鬲，在昌平雪山遗址 H66 龙山文化灰坑中即有与之相似的造型^②，甚至还有人认为雪山 H66 即是大坨头文化的遗存，略可见其密切关系。大坨头文化发展到商代中期，受到来自长城地带以花边鬲为代表的古文化影响，蜕变成为围坊三期文化，这在宣化李大人庄^③、涑水渐村^④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群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这些陶器群的多数器类乃至造型，依然表现出大坨头文化的特征，但花边鬲的出现无疑已开始了围坊三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周人灭商，在燕山地区建立燕国，围坊三期文化受到周文化的强烈冲击，在其内涵中大量渗入周文化因素，从而

蜕变成张家园上层文化,这是这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房山镇江营,张家园上层到西周中期为周人的姬燕文化所代替^⑤;在易县燕下都^⑥,具有张家园上层文化特征的遗存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这支古文化至此结束。有人认为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大约相当于黄河流域商末至西周时期具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年代基本相当”。此说缺乏根据,近年出版的《镇江营与塔照》报告,以翔实的地层资料进一步证明,该遗址具有围坊三期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第二期遗存,和具有张家园上层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第三期遗存,确是前后相接的二个发展阶段,不存在“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和“年代基本相当”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学者将二者统一称为围坊三期文化或张家园上层文化,不予区分为二个考古学文化,只是划分成几个阶段^⑦。

这支古文化在西周初年周文化大规模进入以前,一直是蓟县一带唯一的青铜文化,在当地有颇为广泛的分布。蓟县范围内已发现属大坨头文化遗存的地点有5处,属围坊三期文化有4处,属张家园上层文化也有4处^⑧。无终山(府君山)南麓的蓟县城下,修建三八水库时即发现大坨头文化的墓地。和无终山毗邻的蓟县城西渔山,有大坨头文化居住址。无终山东4公里处的围坊村,兼有大坨头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遗存,后者即由此遗址得名^⑨。但综观蓟县境内各遗址的堆积状况和出土文物规格,以蓟县西部的张家园^⑩和刘家坟^⑪二处遗址最具中心聚落址特征。

张家园遗址位于蓟县西部,紧靠一条季节性的沙河,由于长期水土流失,现存面积仅有7000平方米,但还是出土了较多有价值的遗迹和遗物。在属于大坨头文化的堆积中,发现面积近40平方米的房址,出土遗物除大量陶器外,还有刀、镞、耳环等引人注目的青铜器,这些铜器虽然都是小件,但由于涉及到青铜冶炼技术,因此在一般遗址中较少见,可是在这里却是几种铜器同时出

土,透露出遗址的性质非同一般。

大坨头文化结束后,这里未发现属围坊三期文化的居住址遗存,却有相当商代末年至西周初年的墓葬,出土文物规格更凸现出中心聚落址的品格和特征。墓共四座,都随葬鼎或鼎簋为组合的青铜礼器,以及金耳环,表明墓主人生前都是氏族部落的贵族。四座墓中,2号墓出土一件夔纹鼎,腹深而圆,柱足略粗,和殷墟西北岗出土的小铜鼎^⑫相似,属殷墟晚期。3号墓出土涡纹鼎和乳钉纹墓,鼎的腹壁呈圆弧,最大腹径在中部,与长安沣毛1号墓^⑬、崇信于家湾9号墓^⑭等同类器物相似,后者与先周式陶器共存,年代不会晚于商代末年。4号墓的垂珥簋和分裆鼎,鼎的类似形制也在商末和周初都能见到,属于商末的如安阳西北岗和山东费县^⑮出土的鼎、以及传世的亚貳父丁鼎^⑯,属于商周之际的有张家坡54号墓^⑰、宝鸡竹园沟13号墓^⑱出土的鼎,因此年代在商周之际或西周初年。如果将这批铜器和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作比较^⑲,可发现张家园出土铜礼器的三座墓葬,至少2、3号墓比琉璃河墓中年代最早的都要早,甚至年代最晚的4号墓也不晚于琉璃河墓中年代较早的墓葬,例如琉璃河墓M251是较早的一座,被推断在成、康之际,但所出涡纹鼎的腹部明显呈现出弛垂倾向;M253出土的董鼎,按铭文其铸造时间应在燕召公生前,而其腹部的弛垂特征更加明显,可见张家园墓的年代在整体上比琉璃河墓要早。琉璃河M1193号^⑳墓的墓主人“克”被认为是燕国的第一代侯,受封时间在成王之时,故张家园墓地的上限始于商末,下限当和琉璃河墓地的上限接近。墓葬的文化性质,虽然出土的青铜器都属典型的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形制,但金耳环的形式却和燕山地区土著族特有的臂钏相同,再加上东西向、俯身葬的葬俗,表明这是一处土著方国首领的墓地,不属周人墓。按照墓葬的年代和土著文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商代氏族方国首领的墓地,尔后又受到周人的封赐,因此随葬品组合出现周人的礼制习俗。这一变化与无终由

“终北”国变成为“无终子国”的历史正相合。

张家园墓还有一个与无终国历史有关的线索,即是 M2 铜鼎腹壁上的铭文“𠂔”字。此字未见著录,从结构看,由二部构成,左边是二个枣形大点,右边为一手,表达的意思似是地上散落有物,正在收拾。《说文》对“𠂔”的解释是“有所绝止。”疑此字含有秋收冬藏之意,是表示岁终的“冬”字。《说文解字》释“冬”曰:“冬,四时尽也,从𠂔女声。女,古文终字。𠂔,古文冬,从日。”𠂔是冰的象形,知冬有从冰和从日两种写法,但这都是由女衍生而来。《说文解字》云:“终,絲球也,从系冬声。”象形絲球的终字见于甲骨文,作。然而此字只表示事物终始,未见有表示时信的例子。故表示时信的冬字,即是在女字下加冰或日的冬字,有可能是后起的,较早的例子见于战国时期的陈驸壶。这一情况透露,表示时信的“冬”和表示事物终始的“终”,最初可能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含义,而“𠂔”或许正是表示时信“冬”字的最初形式。这类铭文一般多属商代氏族小国的徽识,它正好出现在无终国故地,似不属偶然。

到西周时期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阶段,张家园遗址又成为聚落址,虽然发现有石砌房基等较进步的房址遗址,但中心聚落已移到了南面 4 公里处的刘家坟,该遗址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中心区发现水井等遗迹。不过此居住址只经历了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时亦变成为墓地,共发现 8 座墓葬,打破居住地层,东西向、俯身葬的葬俗和张家园墓完全相同,其中有 2 座墓也出土鼎簋为组合的青铜礼器,具有西周中期特征,因此这是一批属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墓葬,葬俗和规格上和张家园墓一脉相承的特征,说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确是同一支文化的前后不同发展阶段,并不是“具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

从大坨头文化到围坊三期文化再到张家园上层文化,这支文化在蓟县一带的发展

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作为周人进入以前当地唯一的青铜文化,无终国的遗存非此莫属。此文化出土文物的品位,如张家园、刘家坟两地出土的青铜器、金耳环等,也和有“子”爵称号的“无终子国”相匹配,蓟县是无终国故地的记载可信。

三、蓟县无终和山西无终的关系

无终国故地在蓟县,但史籍记载无终的活动却多在山西,皆见于《左传》,有二则。一则是鲁昭公元年(前 514 年)的记载:“晋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另一则是鲁襄公四年(前 569 年)的记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这二条史料透露出如下信息:一、春秋中叶之时,无终的活动一直在山西地区,因此多和晋国发生关系,它还和“群狄”一起被晋国打败于“大原”。“大原”《春秋经》作大鹵,杜预以为在山西晋阳,即今太原一带,其聚居地当离此不远。二、在氏族部落的体系上,无终不是狄而是戎,因此《左传》将其和“群狄”分开,但它的活动却始终和“群狄”在一起,并且多和晋国发生磨擦,属于戎狄阵营,反映其文化性质。

春秋以后,无终的活动又向北转移,到了山西省东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一带,只是其名字被称做无穷而不是无终。《战国策·赵策》云:“昔者生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无穷,疑无终。”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无终,一作无穷,终、穷字通”。此“无穷”应当就是在太原地区被晋国打败的无终,后又向北转移到了和代国相邻的地方。《汉书·樊噲传》记:“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汉广昌地在今河北省涞源县,表明此附近亦有称无终的地方。河北涞源县和山西浑源县相近,有人认为浑源李峪出土的青铜器与无终有关^④,这不无可能,因为不只这些铜器的造型、纹饰多具燕

国铜器特点,尤其和唐山贾各庄铜器群接近,而且出土铜器的墓葬,采用的也是头东向的葬俗,和张家园、刘家坟等处的墓葬一致。这是无终在山西境内活动的最后线索。

不过,无终国(族)只有一个,它所以在燕山和太行山区都留下了活动的史迹,是由该国(族)迁徙造成的。对于这二地无终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曾怀疑蓟县的无终是由太行山区的无终东迁而来,其云:“无终为故无终子国,证以《史记》、《汉书》、韦昭《国语注》、《水经注》、《魏土地记》,无终之今为玉田县无可疑者。然《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子如晋请和诸戎,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汉书·樊噲传》击陈豨,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则去玉田千余里,岂无终国先在云中、代郡之境,而后迁右北平欤?”

不过从有关资料看,事情正好相反,因为蓟县无终的有关史迹均比山西无终要早,《列子》所说“滨北海之北”的“终北”之国,只能和汉无终县地发生关系,而它的传说年代是商代初期;由“终北”成为“无终子国”,也只能在春秋以前,更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无终还被认为山戎的一部分,韦昭注《国语·鲁语》云:“无终,山戎之国”;杜佑《通典》云:“古无终子国,一名山戎。”山戎见于史籍的主要活动是“伐齐”和“病燕”,这两件事的年代均要早于山西无终见于史籍的时间。《史记·匈奴列传》记:“……是后(指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六十有五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此事亦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记载:“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表》记为:“山戎伐我。”知《左传》的北戎就是《史记》的山戎。这一事件较山西无终在太原遭败要早将近二百年。《史记·匈奴列传》又云:“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这就是《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的齐桓公“二十

三年,三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时为公元前663年,也要比山西无终在太原遭败的时间早一百五十年。

还有迹象表明,山戎的“病燕”活动可能从西周较早之时已经开始,参与此活动的无终也应当是蓟县无终。山戎“伐齐”和“病燕”,一方面固然是游牧部落奴隶主的贪婪,垂涎农区的财富,因而不断发动对农区的掠夺;另一方面也包含有燕山地区土著族反抗周人统治的因素。周人建立的燕国是一个极端残酷的奴隶制政权,并不比商朝的奴隶制好多少,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多座奴隶殉葬墓^②足可说明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所以商代末年“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的孤竹君,入周后很快“耻食周粟”,这一变化充分表现出当地土著对周人统治的愤懑情绪。其实西周之时,各地土著部落反对周人统治的斗争皆很快发生,此起彼伏,绵亘不绝,在东方,周武王死不久,即发生徐、奄、淮夷的叛乱;在西方,《尚书·大诰》曰:“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诗·采芣序》说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在南方,《史记·周本纪》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在北方,即是以山戎为首的土著部落反对周人燕国政权的斗争,辽西地区不断发现西周初年的铜器窖藏^③,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迫使燕国派驻在那里的将领们仓皇撤离,因而不得不把重器窖埋地下。燕国西周时期的都城董家林古城,从西周中期起便呈现出残破迹象^④,也可能与以山戎为首的土著部落“病燕”有关。在山戎“病燕”过程中,燕山地区土著部落广泛参与,《管子·封禅》记齐桓公“北伐山戎,过孤竹,荆令支,破屠何。”令支和孤竹的地望从冀东到辽西,屠何兼见于辽西和太行山东麓的冀中地区。《国语·齐语》记齐桓公“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二国,山戎之与也。”孤竹和令支不只在地理上和蓟县无终毗邻,在文化上也属大坨

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谱系,它们在“伐齐”和“病燕”过程中都成为山戎的与国,因而受到齐桓公的打击,蓟县无终似不会置身事外。而且有迹象表明,无终不只参与了相关行动,并且还是其中的主要角色,正因为如此,它才会被认为就是山戎。刘家坟遗址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地层中,同出有直口扳耳鬲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片,后者是以赤峰宁城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土著青铜文化,属于山戎部落的遗存,清楚说明蓟县无终和山戎部落的密切关系。

参与山戎“病燕”的无终必定是蓟县无终,还有着地理方面的因素。《管子·大匡》记齐桓公北伐山戎的行军路线云:“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首先征伐的是令支,地在今冀东的迁安一带。然后过“鳧之山”,是为渤海北岸的碣石山,鳧之山是碣石山的谐音,前者取其景,后者取其形。接着便是斩孤竹,其地点有二说,一在卢龙,一在辽西,此孤竹已过碣石,当是辽西的孤竹,即杜佑《通典》所说的:“营州柳城郡,古孤竹国也。”唐营州柳城郡在今朝阳,该地区出土有铭文作“簪竹”字样的铜鬲,有学者认为即是孤竹^⑤,可信。斩孤竹后才遇山戎,则已到了辽西以远的地方,约当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宁城、赤峰一带。《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曰:“桓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此里程也正大体相当从齐都临淄到宁城地区的距离。山戎“伐齐”、“病燕”,出入燕山南北,位于渤海湾西北岸的无终国是必经之地。齐桓公北伐山戎,虽远至千里之外,其全部军事活动也都没有离开燕山南北。可见参与山戎“病燕”的无终,不会是山西无终。

从山戎“伐齐”和“病燕”事件,不只可看到蓟县无终早于山西无终的事实,同时还透露出产生蓟县和山西二处无终的原委,必是原先聚居于蓟县一带的无终,由于参与“病燕”而遭到齐桓公北伐的打击,其后便无法再在燕国都城肘腋之地的蓟县立足,于

是向太行山区转移,和从陕北高原东来的狄人部落杂处为伍,这便是在“太原”遭晋国打击的无终。此无终在“太原”遭打击后又向北转移,到晋东北地区的浑源一带居住,便是战国时期的无穷,无终国(族)的徙迁转移过程大体如此。

四、无终和山戎有别

韦昭说:“无终,山戎之国。”杜佑说:“古无终子国,一名山戎。”似乎无终就是山戎,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无终不等于山戎。

对于山戎,有人简单地按字面解释为山地之戎,似乎只要是活动于山地环境的戎狄部落都可囊括进去,这是不正确的。山戎是一个具体的部落实体,有着独立的历史和文化。《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段文字至少提供了如下信息:一、山戎有着悠久的历史;二、聚居地在“北蛮”;三、经济生活具有游牧部落特征。有关这些方面,由于今天考古资料的积累,已可了解其大概。

根据前举齐桓公北伐山戎的进军路线,知山戎部落的聚居地“北蛮”,是在辽西以远的赤峰宁城一带,今发现这个区域内,相当春秋早期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只有夏家店上层文化一种^⑥,这是一支有着独立发展历史的古文化,首先形成于赤峰地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早期遗存为龙头山类型^⑦,陶器群具有较浓郁的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色彩,似是该文化进入这个地区后的变种,¹⁴C年代测定为距今 3240 ± 150 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支文化较早地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拥有矿井,林西大井遗址¹⁴C测年为距今 2720 ± 20 年^⑧,表明是一支拥有较强实力的青铜文化,它制造的盞首式青铜短剑(亦称予式剑),在北方系青铜短剑中独树一帜^⑨。这支文化在发展中逐渐南移,到商周之际蜕变为翁牛特旗大泡子类型^⑩,陶器中的花边鬲显示出它与长城地带古文化已有了广泛联系。南面分布

范围已进入燕山地区,在张家口小白杨^⑩、丰宁城根营^⑪等地发现其遗存。

夏家店上层文化继续南移,到以宁城地区为分布重心的南山根类型^⑫阶段达到它的鼎盛期。和长城地带同时期的其它古文化一样,花边鬲亦由锯齿状花边变成略宽的叠唇带边,表明它们之间联系密切。^⑬文化内涵变得更加复杂,在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⑭等地出土许多青铜器,有的具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特征,个别还有铭文,如《许季姜簋》等,只是这些铜器是赠赐还是掠夺所得,不得而知;有的造型怪异,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这里出土的青铜短剑形式多样,有源于辽东地区的短茎曲刃剑,源于山西等地的铃首、环首刀、剑,还有在燕山地区常见的兽首刀、剑等,有的融不同谱系的特征于一剑,如曲刃剑身加触角式剑首等,显示出这里曾一度是不同谱系文化汇聚交融的中心。但稍后即急速衰落,宁城孙家沟墓葬共出的曲刃青铜短剑接近春秋中期^⑮,往后便不见更晚的遗存,夏家店上层文化约终止于此时。

观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地理位置、文化内涵和特征,至少有如下几点和山戎部落相合:

一、二者的分布重心皆在辽西以远的赤峰宁城一带。

二、山戎部落“随畜牧而转移”,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以牧畜为主的经济生活特征,并且还有自北而南的迁移经历。

三、《管子·大匡》记齐桓公北伐曰:“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北州侯莫来,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皂之山,斩孤竹,遇山戎。”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到南山根类型之时,具有一方政治文化中心的规模和气势,与“北州侯”的称号相匹配。

四、山戎部落的“伐齐”、“病燕”活动延续时间颇长,必然会在燕山迤南留下痕迹,燕山南麓正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分布,蓟县刘家坟遗址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地层中,发

现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陶鬲等残片。徐水解村^⑯发现的实心锥形鬲足、碗形矮足豆等陶器,具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特征。唐山雹神庙^⑰出土5件石范,皆为兵器,有釜斧、齿柄刀、予等,其中斧、刀的类似形制皆见于宁城南山根。宝坻安桥^⑱出土铜刀和猎钩各一件,亦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延庆西拨子^⑲出土一处青铜器窖藏,在一件青铜釜内放置有五十多件青铜器,包括鼎、匙、刀、猎钩、锥、斧、镞、戈、小铜泡、耳环等,多数器物见于敖汉旗周家地^⑳、赤峰蜘蛛山^㉑、宁城南山根等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一件年代特征较明显的中原式残重环纹铜鼎,属西周晚期,窖藏的年代当属此时或略晚,正是史籍记载山戎“病燕”的时期。这些遗存的发现说明,“病燕”的主角确是来燕山以北的山戎,燕山南麓的无终只是参与而已,可是它位于燕都肘腋之地的蓟县,为害更加强烈,因此给人们留下更深的印象,以致被人们认为它就是山戎之国。

① 韩嘉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83年4期。

②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③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5期。

④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4期。

⑤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⑦ 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的若干问题》,《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沈勇《围坊三期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93年3期。

⑧《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⑨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⑩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一集,1979年。天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8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4期。

⑪ 韩嘉谷等:《蓟县邦均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

⑫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10期。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考古》1984年9期。

⑭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

⑮ 王世民、张亚初:《殷墟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

⑯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1963年。

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⑱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图三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⑲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8期。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㉒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㉓ 李恭笃、高美璇:《试论燕文化和辽河流域青铜器文化的关系》,《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㉕ 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和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5期。

㉖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

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1期。

㉗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

㉘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7。

㉙ 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㉚ 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文物》1984年2期。

㉛ 张家口市文管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

㉜ 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

㉝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南山根的石棺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李逸友:《内蒙古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6期。宁城县文化馆等:《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文物资料丛刊》第九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㉞ 韩嘉谷:《花边离寻踪》,《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

㉟ 《宁城小黑石沟石棚墓葬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5期。

㊱ 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㊲ 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徐水解村发现古遗址和古城垣》,《考古》1965年10期。

㊳ 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遗物》,《中国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

㊴ 《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㊵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窖藏铜器》,《考古》1979年3期。

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2期。

(作者为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北齐长城调查小记

岳升阳

近年来,为编绘《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和《北京文物地图集》中的长城图,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市文物部门和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联合对北京境内的北齐长城遗址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在此述其一二,以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1. 寻找调查线索

北京地区的长城建设始于何时,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北齐年间。关于北齐修筑长城的记载多见于《北齐书》:天保七年(556)“发夫一百八十八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同年,“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北齐书·文宣纪》)“天统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请朝献,羨始以闻,自是朝贡岁时不绝,羨有力焉。诏加行台仆射,羨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北齐书·斛律金传附子羨传》)夏口即今居庸关南口,长城是由大同西北一直修建到渤海岸边。当时不但筑了长城,还在长城沿线每十里建有一座戍所。

北齐长城是用当地的石块垒筑而成,在长城本身很难找到可以判定年代的物品,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尚拿不出确凿的物证,来证明某一段长城是否是北齐时期所建,以至于时至今日仍画不出可信的北齐长城分布图来。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最好的办法是寻找与长城有关的戍所,有人居住的地方就

容易找到可供定年之物。思路一经确定,明人王嘉谟的一则游记自然就跃入了视线。明万历年间,王嘉谟到北京西北山区游历,在今昌平区高崖口西北见到了早期的长城:

再由走集西十里许为高崖。……又西北[1319]十里许为清水涧。……行可二十里,……有岭焉,名曰鰲鱼。……下山折坂而南,……曰六十,屈折汗邪黄芦、白沙之间,可六十折。再由走集,又西有陞,曰十八盘。……旁睨则北山矗矗,一阴一阳,闪脩孤日,含濡云彩。山之上平衍,西五里有岭焉,是曰长城。苍黯高竦,下视前坂。其巅瓦砾纵横,微有雄堞,剥蚀沆莽,是曰秦皇之址。^①

游记中所言地名,如高崖(高崖口)、清水涧(水涧沟)、鰲鱼(鰲峪)、六十(溜石港)等今仍在。由此可知,他所看到的长城正是今了思台西北一带的长城遗址。关于秦代长城今人考证论述颇多,这处长城显然不可能是“秦皇之址”,它或许就是北齐长城。我们的考察就由这里开始,目标是山巅的“瓦砾纵横”。

当我们驱车至了思台以西数公里处公路的最高点时,看到了长城遗迹,昌平区文物部门还在此立有标志牌。长城遗址位于山脊垭口的南北两侧,公路则从垭口内通过。我们立即对垭口周围做了观察,在垭口内外都看到有古道的遗迹,古道通过的垭口,很可能曾有戍所存在,这需要仔细地寻找。

长城遗址最明显的是垭口北侧的山梁,那是一条碎石堆成的石垄,由垭口向北通到山顶。石垄宽约3米,高约1米,石块大多碎小,直径多在10-15厘米左右,呈散乱堆积状,有的地段可以看到石块与土混合堆积在一起,可能当年曾用泥土作为填充和砌筑材料。在通向山顶的二百多米长的石垄上,仅

在局部地方看到有较大石块砌筑的痕迹。山顶上方圆不过十几平方米,既没有瓦砾,也没有戍所的痕迹。疑惑间,回首南望,见石垄在垭口南面的山脊上隐约出现,当视线顺着石垄落到南面的山顶时,不由得一阵兴奋。山顶上似乎有一块平地,嫩绿的草色将其与周围的山坡区分开来,很平整,颇似人工所为。

2. 昌平北西岭古长城戍所遗址

垭口南侧的山头略低于北侧,距公路的高程不过数十米,从公路向上爬,只有 100

多米的路程。我叮嘱同行的研究生注意脚下,看看有没有瓦片。刚走出不远,就在山坡的小路上发现了碎瓦,及至山顶,瓦砾就更多了。

此山在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上标注为“北西岭”,海拔约 1 千米。山顶上是一块人工修整出来的长形平地,平地沿山脊呈西南—东北向分布,长约 60 米,宽约 25 米,面积约 1000 余平方米,东北部有因侵蚀或人工取土形成的残缺。平地周围隐约可见残垣的痕迹,当年应是一处四周围有石墙的城堡(图 1,照片 1)。城堡与长城相连,居



图 1 北西岭北齐长城
戍所示意图



照片 1 昌平区北西岭北齐长城
和戍所遗址(箭头所指)

高临下扼守着通过垭口的古道。在这块平地上,由于近年来的植树,使许多埋在地下的陶片被挖了出来,暴露于地表。陶片中除了个别为器皿残片之外,其余都是瓦片,包括板瓦和筒瓦,其中的板瓦根据器型大小、厚度和滴水沿的纹饰,可以分为五型:

I 型,青灰色,瓦凸面为光面,凹面印布纹。瓦沿凸面饰指捏纹,纹饰由 15 个凹痕组成,瓦沿处宽 30.3 厘米,距瓦沿 26.3 厘米处宽 26.4 厘米,厚 2.3 - 2.8 厘米,残长 31.4 厘米。瓦沿的中间部位有一条裂纹,裂纹两侧有制作时为弥合缝隙而形成的指

捏凹痕,裂纹两边各有四个凹痕,瓦的另一面也有对应的凹痕。(图 2,照片 2)

II 型,较 I 型稍小,浅灰色,凸面光,凹面布纹,瓦沿凸面饰指捏纹,在凹面的相应位置亦有指压形成的凹坑;厚 2.0 - 2.3 厘米。凹面距边缘 2.5 厘米处有纵向凸棱一道,不连续,似为模具使然。

III 型,青灰色或浅灰色,凸面为素面,局部有类似绳纹的纵向沟痕,凹面为布纹,瓦沿为圆口,无装饰;厚 1.7 - 2 厘米。

IV 型,浅灰色或青灰色,凸面为素面,局部有类似绳纹的纵向沟痕,凹面印布纹,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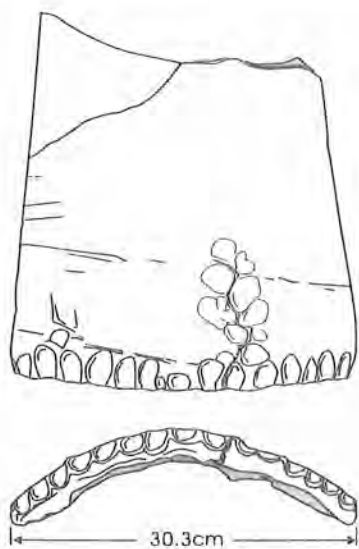


图2 北西岭指捺纹板瓦

照片2 北西岭北齐长城戍所
遗址指捺纹板瓦

沿圆口,无装饰;厚1.3-1.6厘米。

V型,青灰色,凸面为素面,凹面为布纹,瓦沿圆口,无装饰;厚1.1-1.2厘米。有的凹面距口沿2.5厘米处有横向凹痕,凹痕宽1厘米,深0.1-0.3厘米,似为模具箍痕。

筒瓦残片2块:

青灰色,外光面,内印布纹,瓦身厚1.7厘米。

器皿口沿残片:

陶质,灰色,圆唇,残长4.6厘米,唇高0.8厘米,厚0.9厘米,壁厚约0.4厘米。

I型和II型瓦最具特色,瓦沿凸面饰有指捺纹,应是用在房檐滴水处的瓦。瓦上的花纹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判定年代的理想之物。虽然此种瓦在北京尚无发现的报道,但在其他地区却有出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邺南城。邺南城是东魏和北齐的都城,出土有大量东汉至北齐时期的瓦。其II型板瓦的滴水花纹系用手指按压而成,发掘者称之为“指捺纹”,年代定为北齐时期^②。指捺纹瓦是北朝至隋代北方部分地区广为流行的瓦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判定城堡时代最有力的证据。

3. 门头沟大村古长城戍所遗址

仅仅发现一处遗址,还不能完全证明它与长城的关系,因为它有可能是山口处一个孤立的现象,可能早于长城,也可能晚于长城,因此还需要有新的证据,证明它与这道长城确实有关系。最便捷而有力的证明方法,就是沿长城遗址找到更多的戍所城堡。我们沿着长城遗址向远处寻找,在北西岭西南方,门头沟区大村南面的小山上,再次在长城与古道交会的山口处,发现散布着大量瓦砾的城堡遗址。

遗址位于大村西南约一里,长城在此处呈东西走向,系用碎石垒筑而成,如今也仅残存一道低平的石垄。在长城的南面,是一条通向永定河谷地的南北向山谷,古代道路即由山梁最低处的隘口通过。在隘口处,有一座略微隆起的小山头,小山面向北面的外侧山坡,被人工削出一道陡坎,这使人想到《北齐书》所说的“斩山筑城”。小山朝南的一面有一片梯田状的平地,平地北面窄,南面宽,形近三角,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近30米,南北向分为三级,每级高差1米有余,平地的边缘有用碎石砌筑的石护坡(图3,照片3)。在三级平地上散布有大量瓦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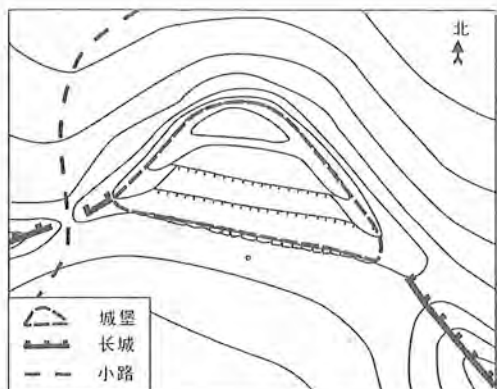


图3 大村北齐长城戍所遗址示意图



照片3 门头沟区大村北齐长城戍所遗址(箭头所指)

其形制与长城岭瓦基本相同,只是尚未发现筒瓦。其板瓦可以分为四型:

I型,红褐色,凸面为素面,凹面印布纹,瓦沿凸面饰指捏纹,凹面的相对对应位置也有因捏压而形成的凹痕;厚1.7-2.0厘米。

II型,青灰色,凸面为光面,凹面印布纹,厚2.2-2.5厘米。

III型,浅灰色或青灰色,凸面为素面,局部有类似细绳纹的纵向沟痕,凹面为布纹,厚1.6-2.1厘米。

IV型,青灰色,凸面为光面,凹面为布纹,瓦沿圆口,无装饰;厚1.1-1.3厘米。

其中, I型从规格上看与北西岭II型板



图4 北西岭和大村北齐长城戍所遗址分布示意图

瓦在大小上属于同一规格,也装饰有指捏纹。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它表明,这些城堡是这段长城的组成部分,城堡的年代可以用来确定长城的年代,而城堡的年代则可以用瓦的年代来确定。

这两处戍所城堡之间的距离约有10里(图4),符合10里1戍的记载。这一发现给寻找北齐长城提供了重要线索,循着这个线索找下去,近年来我们已在门头沟区到密云区的多个地点找到了北齐长城的城堡遗址,这在北齐长城的调查方面是一个突破。

北齐遗物在北京地区发现不多,遗址更未见诸报道,这些北齐时期的戍所遗址是研究北京地区北齐时期军事和文化的重要遗物,希望文物部门能够有选择地进行发掘,并立牌保护,以免在旅游开发和植树绿化中受到破坏。

①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32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邯郸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1期,1-9页。

(作者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

陈 康

唐代幽州蓟城是建在汉晋故城基础上的,其城市的基本情况在唐之前由于资料缺乏,至今尚不十分清楚。

1. 唐代幽州城的确定

唐代幽州地方政权治所在幽州城,关于它的原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掌握的各方面资料还不多。幽州城最早源于战国时燕国后期的都城蓟城,位置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这个位置从战国晚期一直到元代废蓟旧城、移建新城止,历经了 1300 多年,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燕蓟地方早在西汉时已发展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①。幽州已能与国内的大城市临淄、洛阳等地相提并论了,幽州是以其物产之丰饶、工商业之发达、北方地区之政治文化中心,防御北边之重要,奠定了它的地位。唐代幽州城的正式营建、发展,源于贞观十九年(645 年)唐太宗亲征辽东,集聚唐军主力于幽州,以李世绩为唐军前线指挥驻于幽州始,幽州城才有了明确的发展,其形制“蓟城城址北南九里,东西七里;周长三十二里(注:唐里合今里约二十五里)”^{②③},城廓呈长方形。

唐代幽州城的四至,史书并没有交待,今唐幽州四至的确定完全得益于近年北京唐志的出土,出土唐志作为其重要的依据,已基本得到了北京史学界的认同。

唐幽州城垣东城垣从今宣武门大街西侧的受水胡同、七井胡同、盆儿胡同一线

(见《姚子昂墓志》),南城垣在今白纸坊西街至东街一线(见《王郢墓志》、《王时邕墓志》),西城垣在今广安门站西街经甘石桥到小马厂路东侧(见《卢公夫人赵氏墓志》、《肖公夫人侯氏墓志》),北城垣于今白云观和西便门北侧,宣武门西大街北一线(见《许钦墓志》、《周元长墓志》),与史书记载的基本相符。唐代幽州城城区面积达 9 平方公里。

2. 关于“范阳”

范阳这个名字在有关北京的史籍中经常能看到,唐代以“范阳”为名的有三:(1)范阳都督府;(2)范阳郡;(3)范阳县。

范阳都督府即幽州都督府,设节度使,治所在幽州,天宝元年玄宗更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增领归川、归德二郡^④。

范阳郡,“天宝元年(742 年)将幽州改称范阳郡”^⑤。

范阳县,“隋为涿县,唐武德七年(624 年)改名范阳县”,“大历四年(769 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以隶涿”^⑥,范阳县在今河北省涿州市,其北部跨入了今北京市的房山区。

3. 幽州城的里坊

唐代城市布局,城内以里坊为基本单位,东西两都即洛阳、长安都建有里坊,纵横

各三门。古代城市多作方形,通常以南北主干道划分出四大块,每块再以纵横的道路及坊巷分割成封闭的方形范围。坊这个名称是隋代出现的。唐代规定了“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村”^⑦，“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⑧,坊、村名称区别十分明确,每坊都有纵横的街巷,坊有栅门,落坊额,唐人白居易《长庆集》五六“失婢”诗云:“宅院小墙庑,坊门贴榜迟。”《旧唐书》载:“今暂逢霖雨,即闭坊门。”^⑨作为唐代北方大城市的幽州在建设中也仿两京于城内设坊,幽州城“开十门”^⑩。但唐代幽州城究竟有多少个坊,以及这些坊的坊名都未见记载,宋初路振作为国信使在宋太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时途经南京,就其所见所闻,著有《乘轺录》:“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有鬬宾、肃慎、卢龙等坊,为唐时旧名”。这段话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路振在《乘轺录》中明确记载的是辽南京城的坊数,计有二十六坊,但这并不是唐幽州城的坊数,此时距唐末已过了百年之久,距唐初也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故路振并未见过唐代幽州城的模样,他在提到唐代幽州城时有些含混,实际上路振并没有说辽南京城的26坊数就是唐幽州的坊数,也就是说唐代幽州并不一定是26坊,究竟有多少坊数并不清楚。历代营建幽州城规划中无论是城市的大小、里坊的数量都是有很大变化的。我们可以得知如下线索:

(1)唐代幽州城确定是由坊组成的,但坊数、坊名不详。

(2)辽代南京城有26坊(见路振《乘轺录》)。

(3)金代中都有62坊(见《元一统志》卷二)。

(4)元代大都城有50坊(《元一统

志》)。

可见唐、辽、金、元四代在近六、七百年间所经营的幽州城规模、大小和坊数在各个时期都是不同的。至于坊名就更不清楚了。《乘轺录》中提到有“鬬宾、肃慎、卢龙等坊”,也就是说这三个坊或三坊以上的一些坊名是袭用了唐代幽州城坊的旧名,又有多少坊名是在辽代才出现的,也并没有交待辽南京城到底有多少个坊名是袭用了唐代的旧名,所以后人在考证唐代幽州城时常常套用辽南京城的坊名,同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鲁琪先生认为“唐代幽州城的坊名有鬬宾、卢龙、肃慎、花严、辽西、铜马、蓟北、燕都、军都、招圣、归仁、劝利、时和、遵化、平朔、归化、东通圆、隗台、永平、北罗、齐礼、显忠、棠阴、归厚、大田、骏是唐代幽州城坊名”^⑪,这其中鬬宾、卢龙等13坊名已在出土的唐志和史籍中得到了证实,其它的隗台、永平、北罗、齐礼、显忠、棠阴、归厚、大田、骏等坊名在唐代墓志中尚未出现,应视为辽时燕京坊名。此后又陆续有新的唐志出土,在不断地校正鲁琪先生当年的考证,如《唐幽州城考》中提到“东通圆坊”名,1981年在海淀区万寿路出土的《温令绶墓志》有:以咸通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歿于幽都县通圆坊之私第,证明鲁文所说的“东通圆坊”应为“通圆坊”;另“开阳坊”(见《唐故彭城夫人刘氏墓记铭》),1985年10月在丰台蒲黄榆出土;“来远坊”(见《曹朝宪夫人陶氏墓志铭》),1987年在永定门外西罗园出土;“析津坊”(见《论博言墓志》),1995年在石景山区老古城出土,以上这些都是在《唐幽州城考》发表之后出土的唐志中发现的新坊名,是鲁文中未提到的。现将《乘轺录》和已见唐代墓志中所提坊名列表如下:

坊名	路振《乘轺录》	出土墓志
卢龙坊	卢龙坊	“中和四年五月六日,歿于卢龙坊私第”《唐故隗西郡要氏夫人墓志》,“夫人……康氏……建中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终于卢龙坊”《唐故棣州司马姚(子昂)府君墓志》

续表

坊名	路振《乘轺录》	出土墓志
燕都坊		“会昌五年十一月遽之疾矣,终于燕都坊私第”《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太原王(时邕)公墓志》,“以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归全,于幽州蓟县燕都坊之私第”《唐故前蓟州刺史幽州节度押衙宋(再初)府君夫人蔡氏合附墓志铭》
花严坊		“以元和三年七月五日,垂花严坊私第”《故汝南郡夫人周氏墓志》
通園坊		“咸通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歿于幽都县通園坊之私第”《唐故幽州节度衙前讨击副使太中大夫试殿中监温(令绶)府君合附墓志》
通肆坊		“乾符五年秋季下旬,终于通肆坊私第”《口口口事兵马使充使宅将副将长沙茹(弘庆)府君墓志》
平朔坊		“元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属纻于幽州平朔坊之私第”《唐幽州节度押衙摄纳降军营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侯(元知)府君墓志》
辽西坊		“以大中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启手足于辽西坊之私第”《唐故卢龙节度衙前兵马使兼知船舫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陇西董(庆长)府君墓志》,“以咸通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卒于辽西坊私第”《唐姚季仙墓志》
肃慎坊	肃慎坊	“元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疾终于肃慎坊私第”《幽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蓟州刺史陆(日岷)府君妻王氏墓志》
蓟北坊		“贞元十五年岁次己卯朔一日癸卯,夫人……卒于幽州蓟县蓟北坊”《唐濮阳卞氏墓志》,另见云居寺《大般若波罗蜜石经》题记
铜马坊		“大中元年十一月而遽疾焉,十二月十日终于铜马坊私第”《唐故中山郡郎氏夫人墓志》
军都坊		“以咸通十一年庚寅岁夏六月二日,属纻于蓟县军都坊之私第”《唐故幽州随使节度押衙正议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太原王(公晟)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合葬墓志》
劝利坊		“咸通四年——歿于幽都县界劝利坊私第”《王公晟夫人清河张氏墓志》
闾宾坊	闾宾坊	
开阳坊		“(大和七年)三月上巳日终于蓟县开阳坊之私第”《唐故彭城刘氏墓志铭》,另见云居寺《佛说八部名经》题记
来远坊		“夫人……大和元年九月三日终于幽都县来远坊私第”《唐故卢龙征马使游击将军赐紫金鱼袋曹(朝宪)府君故夫人太原陶氏墓志铭》
析津坊		“咸通乙酉……迄秋分永逝于蓟城南部析津坊”《有唐幽州卢龙节度左都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摄檀州刺史充威武军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晋昌论(博言)公墓志铭》
遵化坊		“大中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奄垂殃罚……于幽都县遵化坊之私第”《唐故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周(屿)府君墓志铭》
敬客坊		“元和十一年……春秋挽有三十,寝疾终于蓟县敬客坊之私第也”《唐故衙前散将游击将军朔府中郎将和(元烈)公墓志铭》
玉田坊		“以咸通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终于蓟县界玉田坊之私第”《唐故幽州节度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济阴董(庆长)府君夫人太原郡王氏墓志铭》
蓟宁坊		“天宝十二载正月五日卒于范阳郡蓟宁坊之弟也”《有唐故处士纪(宽)公墓志铭》

目前还未见有墓志明确提到的坊名:

(1)显忠坊,见云居寺《题名小碑》题记:燕京显忠坊阁日大迂市井卫校尉彭城霁金佛十七尊,但题记所记的燕京是否为唐代的呢?

(2)归厚坊。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仰山寺在归厚坊”。归厚坊位于显忠坊西,显忠坊名自唐至今未变。

(3)石幢前坊,《唐幽州城考》中未见石幢前坊名,云居寺《金刚三昧经序品第一》题记“石幢南百姓等奉为习……敬选石经一条”。《佛说百佛名经一卷》题记“石幢下邑人阎忠孝男公”。二处都提到了石幢这个名字,但“石幢南”、“石幢”是否为唐代幽州的坊名,还须考证。

未见坊名而仅见里名的有:

(1)归仁里,“贞元己巳(789年)岁十二月二十日奄化于蓟县归仁里之私第”《幽州故右厢节度衙前讨击副使任(希)公墓志》。

(2)时和里,“大中二年(848年)戊辰岁在五月三日谢于幽都县界时和里私第”《南阳郡清河张氏夫人墓志》。

(3)招圣里,“元和十四年(819年)五月二十三日疾终于幽州蓟县招圣里之私第”《唐故太子洗马博陵崔(载)府君墓志》^②。

(4)归化里,“以开成二年十月二十日终于辽西县归化里之私第”《故幽州卢龙节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檀州诸军事檀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威武军团练等使汝南周(元长)墓志铭》。

(5)东通闾里,“乾符四年夏五月二十二日在疾奄然就木于蓟县界东通闾里之私第”《唐故幽州节度押衙摄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乐(邦穗)公墓志》。

目前已能准确排出唐代幽州城坊名的有20个,只见“里”名未见坊名的有5个,还有4个与坊同名的里,再加上“显忠”、“归厚”、“石幢前坊”等3坊,共有32个名

称。许多论者在谈到唐代幽州坊名时通常都认为辽南京坊名很可能就是唐代幽州坊名的沿袭,但我们仔细分析,在近年北京出土的辽志中提到的几个坊名目前并没有在唐志中出现,很可能这些坊名是在辽南京时期才出现的。这些坊名有:

(1)隗台坊,“应历七年(957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燕京隗台坊之私第”《赵德钧墓志》。

(2)永平坊,“重熙十二年(1043年)夏六月一日闰朔薨于燕京永平坊之私第”《故陇西郡夫人李氏墓志》。

(3)北罗坊,“咸雍五年(1069年)二月十二日终于燕京北罗坊之私第”《韩资道墓志》。

(4)齐礼坊,“天庆四年(1114年)二月二十八日终于燕京齐礼坊之第”,《王师儒墓志》。

(5)棠阴坊,“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燕京大昊天寺传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③。

(6)衣锦坊,“归于燕京衣锦坊之旧第”《杜愈墓志》。

(7)时和坊,“于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正月六日寝疾,薨于燕京西时和坊之私第”《李继成墓志》。

(8)单罗坊,“以开泰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属纻于燕京单罗坊之私第”《丁求瑾墓志》,“单”字在墓志中刻为繁体的“𠂔”,与北罗坊的“北”字写法大相径庭,不会是笔误。

如以上所述都成立的话,实际唐代幽州城坊数已大大超出了《乘辂录》中所载26坊的坊数了。很明显唐代幽州有通闾坊,又有东通闾里,“(中和二年)终于蓟县界东通闾里之私第”《乐邦穗墓志》),又有遵化坊和遵化里、肃慎坊和肃慎里之名、蓟宁坊和蓟宁里(见“大历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终于幽州蓟宁里之私第”《大唐故天水赵(悦)府君墓志》、“以天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终于范阳郡蓟宁里”《大唐故朝散郎试平卢军马赏绯鱼袋士(如圭)府君太原郭夫人墓志

铭》)。有几点疑问:

其一,里和坊似乎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有与坊同名的里,但里名不一定就是坊名,如与坊同名又有明确方位的里“东通圜里”,如理解为东通圜里在通圜坊的东界,是否还应有一个西通圜里存在,并非象有些人认为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坊,照此推理归仁、时和、蓟宁、招圣四里是否还应有与之相同的坊名,我认为里并不能代替坊,因此幽州城的坊数是不能用里来凑数的。

其二,辽南京的坊名有些确是唐幽州坊名的沿袭,但有些坊名则可能是在辽代才出现的。

其三,在近年出土的唐志中仍不断有新的坊名出现,所以唐代幽州城到底有多少个坊,坊数、坊名的最终确定还为时尚早,把辽南京坊数、坊名强加于唐幽州坊数、坊名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唐代所设里坊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史书记载也十分明确,“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坊设坊正”^⑭，“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家为保，每里里正一人，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⑮。里和坊应视为是城市管理中具有两种不同职能的机构，坊承担的是城市管理和安全的职责，而里主要承担的是基层行政。

有唐二百余年来，幽州领县也多有变化：^⑯

武德元年(618年)，幽州领蓟、潞、昌平、良乡四县。

武德六年(623年)，增设辽西县。

贞观八年(634年)，加归义一县。

天宝元年(742年)，分蓟县置广平县。

天宝三年(744年)，广平县旋废。

至德(756~758)后，复置广平县。

建中二年(781年)，“幽都管廓下两界与蓟分理”。

幽都县在蓟县西界，县衙设幽州子城，子城在幽州城内西南隅，(按唐制：各州县府衙都在城内筑子城)，唐代幽州历史上所领各县曾有蓟、幽都、辽西、广平、潞、昌平、良乡七县，在今北京境内。

4. 幽州村乡

唐代幽州除里坊不清外，村乡更是一笔糊涂账，“幽都十二乡，蓟县二十二乡，只记乡数，不记名称，更无村名”^⑰，是长期以来北京的史地研究者所头痛的事。

本文只着重谈蓟、幽都两县。在历史上北京地区对于村落的名称，时代不同名称也不一样，唐代北京大多称村，又“杜佑《通典》：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是否可以说里是由户的多少决定，而村是由面积大小来决定呢？”故较大的村也称里，这样一个“里”字使大家更为困惑，在唐志中不仅城内有里坊，郊外乡下也有里村。唐代幽州村乡复原主要依据的是出土的唐志和房山云居寺的石经，这一点赵其昌先生曾作过不懈的努力。从乡数来说，蓟县在东，有22乡，幽都在西，有12乡，可见唐代幽州的东部是人口稠密，比较繁华的地方，而西部相对人口稀少，面积广大，乡数少，比较荒凉。赵其昌先生在《唐幽州村乡初探》和《唐幽州村乡再探》二文^⑱中共复原了蓟县、幽都两县17个乡，其中蓟县有6乡，距22乡乡数相差尚远，幽都县12乡，已复原11乡，另对展台乡是否为幽都县属尚不能肯定，至于乡下村数，本来就不知，已复原24村，所缺更多。因篇幅有限，赵先生所述内容，请参阅《初探》、《再探》二文。

关于幽都县保大乡的樊村，除《初探》一文中所列的墓志外，2005年4月笔者在石景山区某工地收集到由建筑公司从海淀区三虎桥一带拉的渣土中携带来的一合《唐故阎府君夫人扶风马氏合附墓志文》记载：“(大中七年)改卜地于府城西北樊村先茔西北一里之原”。

另有一村为赵文未录，“乾宁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附葬于幽都县胡村之原”(《唐故大理评事檀州司马赠□□□莱阳郑公夫人扶风郡太君马氏墓志铭》)。

赵先生在《初探》中曾将展台乡归于幽都县，但展台之名只见于云居寺石经题记，

其属乡位不详,赵先生认为:“展台在北京西南,方位明确,惟里程不详,又因展台乡名仅见于云居寺石经题记,云居寺址唐时在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界,据题记习惯乡前不记县属者,常为范阳县属,这样看展台属范阳县也有可能”,但他又说:“惟两相比较,属幽都县之可能性较大,故置幽都存疑,待改正”^⑩。赵先生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基于20世纪80年代作此文时,因墓志出土的局限,故提出了以上的判断。

2002年夏,笔者应友之邀对近期在丰台长辛店迤南发现的《唐故云麾将军行右领军卫中郎将右羽林上下赠本卫将军上柱国赵郡李(神德)君志铭》考证,志载:“启殡合葬于幽府城西叁拾里福禄乡卢沟河西鹿村西北百步平原”,又有友人在其附近拾到一块“范阳都督府福禄乡 开元元年”的刻砖佐证,从《李神德基志》出土地点来看,福禄乡界正与《初探》一文所示展台乡部分重合,其东界与美锦乡之南界相属,西界在赵文所示展台乡界内,北界应与房仙乡之南界衔接。福禄乡在《李神德基志》中有十分明确的方位和里数,可见福禄乡正是《太平寰宇记》中所载幽都县十二乡之一,乃赵其昌先生苦苦求索而未得之最后一乡,至此是否可以说唐代幽都县十二乡业已全部复原了呢?如果真是如此的话,真应算是北京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福禄乡不仅是近年新见,而且还录得一村,可谓收获不小。福禄乡的西鹿村在房仙乡庞村正南,两村相距仅十余里。

又1996年,在石景山区老古城出土了《刘鰲及妻张氏墓志》、《唐清河郡张氏墓志》和《论博言墓志》共三盒,三志中都提到了“葬于房仙乡新安之原”。可为房仙乡增添了一村“新安村”。

另现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刻于武周时一题为《周故刘(基)君墓志之文铭》: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二十二日与夫人合葬于“张口村西南一里”,但未详张口村在何县、何乡。

唐代幽州除蓟、幽都二县外,其他郊县

有潞县、昌平、良乡等。

潞县:按《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幽州“潞县十乡”,今见《唐故正议大夫试怀州别驾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渤海高(行晖)府君墓志铭》:“葬于潞县高义乡庞村(今通州徐辛庄镇大庞村)之原”。潞城乡,见《唐故处士南阳公孙(封)府君墓志》:“权厝于潞城南潞城乡之平原”,《平州卢龙府折冲都尉乐安孙(如玉)公墓志铭》:“发引于潞城乡临河里(今通州区梨镇小街村)。”另有“采贵里”,见《彭兑墓志》,“临高村”,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良乡县:有《唐故瀛州司仓参军吴郡朱(绅)府君墓志铭》:“葬幽州良乡县房山乡永定之源。”《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陇州诸军事行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张(道升)府君墓志铭》:“窆于幽州良乡县闫沟山。”《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申国公蔡(雄)府君墓志》:“贞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迁窆于良乡邑复业乡之原”,仅与《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的复叶乡差一个字。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收录有复叶乡白水里、董村,观音乡成村,昌乐乡北陶村,尚义乡北乐城村,金山乡中继村、五口村及未见乡属的北郑村、团圆村、弁城村、交道村、砖头村、上落村、北张村、南张村、北李村、独树村、鲁张村等,良乡县已见六乡。

昌平县也已见六乡,《王仙墓志》葬于幽州昌平县东北十五里太尉乡之北,出土于今昌平区何家营东南洼。《王恭墓志》亦出于同地,《唐故钜鹿郡曹(秀)府君夫人清河郡张氏墓志铭》:合附于昌平县东太尉乡白浮之原。《安氏夫人墓志》:葬于昌平县安集乡怀居里,《唐故陇西郡要氏夫人墓志铭》亦出土于同一地点,在今海淀区温泉乡白家滩,《故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上柱国宋(俨)公墓志铭》:葬于幽州昌平县东北十里武安乡,《郎氏夫人墓志》:“葬于府城北昌平县东南相公显固村东南一里”。《黄直墓志》:“咸通十三祀冬十二月有五日终于桃林里之”(下转第83页)

试论五代前期幽州的军事与战争

郝志群·王新迎

一、五代初期幽州的军事态势

公元8世纪中叶,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一蹶不振,各地藩镇纷纷据守一方,脱离中央政府的管理,外重内轻、藩镇擅命是唐朝晚期中央与地方的真实写照。907年(唐天祐四年、后梁开平元年),宣武节度使、梁王朱温废唐哀帝,建立梁国,史称后梁,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就此灭亡。此时,在北方地区其他强藩也要分一杯羹,亦纷纷称王称帝。晋王李克用据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李茂贞据凤翔(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刘仁恭据卢龙(治幽州,今北京城西南),罗绍威据魏博(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王镕据镇、冀(今河北正定、冀县),形成诸强藩称雄之势。在此后的五十余年间,梁、唐、晋、汉、周政权迭相更替,战乱频仍。在北部边疆,日益强盛的契丹(辽)国趁乱袭掠中原,战争在中原王朝与诸藩、契丹之间交织并作,而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幽州则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幽州地势雄要,西倚太行,北枕燕山,东临大海,南面中原,又有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居庸关(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北)、渝关(今河北省山海关)等重要关隘作为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安史之乱以后,幽燕卢龙之镇雄踞北方并握有重兵,已形成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势。又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袭扰,使得幽燕地区

胡风甚炽,所以唐朝廷对此地采取的是“因而抚之”的态度。^①节度使刘仁恭利用朱温与李克用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进占沧、景、德三州之地,赶走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并命其子刘守文为义昌节度留后,这时的幽州节镇,其势力范围已经向南扩展,包括了原义昌节镇的三州之地。刘仁恭的势力范围辖有幽州、瀛州、涿州、莫州、妫州、檀州、蓟州、顺州、营州、平州、新州、武州等,其下又辖有诸县。及朱温灭唐前后,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发动兵变,囚其父而自领幽州卢龙节镇之务,任节度使。驻守于沧州的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讯起兵相攻,义昌节镇遂与幽州节镇决裂,脱离其管辖范围。到909年(开平三年)底,刘守光击败刘守文,再次占有义昌节镇之地。因此,后梁时期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实际上是控制着幽、沧两节镇的地盘。而从地理位置看,卢龙节镇正好夹在黄河流域的后梁和占据河东的晋两大北方割据势力之间,其势力范围的消长甚至生死存亡也必然受到威胁,因此割据兼并战争不可避免的要在三者之间爆发。

二、梁、燕、晋之间的战争

唐末,原投于晋王李克用名下的刘仁恭据守幽州,为了在割据混战中扩张地盘,他联合黄河流域的朱温共同对抗河东的晋王。在与李克用公开决裂后,刘仁恭不断向南拓展势力范围。在幽州军队进攻魏州大败以

后,朱温又联合魏博节镇反过来攻打刘仁恭。刘仁恭马上又向河东求救,李克用在其子李存勖的劝说下出兵救援,欲牵制朱温兵力,限制其在北方的扩张。

907年,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发动政变,囚禁其父,自任卢龙节度使。受政变影响,幽州最有战斗力的银胡箛都指挥使王思同、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均率军投奔河东李克用。^②刘守光在幽州的残暴统治比其父刘仁恭有过之而无不及,“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失势,谓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铁笼盛之,薪火四逼,又为铁刷刮别人面”。^③在910年攻占沧州后,刘守光更是自以为得到天助,恣行淫虐,妄自尊大。911年(后梁乾化元年)三月,晋王李存勖为使刘守光放松对晋军的戒备,联合其他节镇推他为尚书令、尚父,“乙未,帝至晋阳宫,召监军张承业诸将等议幽州之事,乃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炽日甚,遂邀六镇奉册。”^④而刘守光却叫嚣:“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尚父何足为哉!”^⑤八月,刘守光僭越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⑥。

而晋王为达到麻痹刘守光的目的,还特意遣使祝贺,欲擒故纵。十一月,刘守光派兵2万人进攻易州容城县(今河北容城西北),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向晋王告急。十二月,晋王派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领兵3万出代州(今山西代县)东进,经飞狐关(今河北涞源)攻燕,以解易定之围。912年正月,周德威军与王镕部将王德明、王处直部将程岩会于易水(今河北易县),三路大军攻克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南),燕涿州刺史刘知温被迫投降,三军进逼幽州。刘守光见势只得下令退守幽州城,并求教于后梁。

后梁太祖朱温与晋王李存勖素有世仇,又加之此前的潞州、柏乡两战^⑦失败,于是决计出兵救燕。二月初一,命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节度使杨师厚为都招讨使、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李周彝为副,率兵趋镇州(今河北正定)攻打枣强(今枣强东);令

青州(今属山东)贺德伦为招讨应援使、郛州(今东平西北)袁象先为副,率兵趋定州(今属河北)进围蓑县(今景县);朱温亲率军从洛阳出发直趋魏州。朱温率军昼夜兼程驰进,于三月初二进至下博(今河北衡水县北)南,登观津(今武邑东南)东南之青山,猝遇晋军数百骑侦察巡逻,误以为晋大军至,急引兵南趋枣强与杨师厚会合。不久,攻下枣强城。随后朱温又引兵5万人与贺德伦合力攻打蓑县,但被晋忻州刺史李存审设计破之,2万梁军被杀,朱温不胜悲愤,重病倒下。^⑧军队不得不南撤,二十八日回到魏州,五月退回到洛阳,不久即被儿子朱友珪所杀。

梁军的作战失利导致了刘守光、朱温军事联合的企图彻底破灭,晋军遂将注意力集中到卢龙,准备围攻幽州。其战略是先将幽州周围大燕所属的其他州县攻下,然后将幽州孤立起来,最后再集中攻坚。三月,周德威派裨将李存晖攻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守军将领、官吏和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县)刺史李严皆投降。四月,李嗣源攻占瀛州,刺史赵敬投降。五月七日,燕主刘守光派骁将单廷珪率领精兵万人出战,周德威与其在幽州城西南的羊头冈(一说龙头冈)^⑨遭遇,双方展开激烈厮杀。单廷珪扬言:“今日必擒周杨五(周德威的小名)以献。”^⑩既战,单廷珪单枪匹马追逐周德威,待枪及其背,周德威侧身避开,奋起反身回击,单廷珪坠马,被晋军生擒活提置于军门。燕军顿时乱了阵脚,周德威趁机引兵追杀,燕军大败,3000士兵被杀,活捉大将李山海等52人。十二日,周德威一鼓作气从涿州进军良乡,攻至西门,燕人出战大败而归。

自骁将单廷珪战败以后,燕军士气低落,众多州县相继归降。913年(乾化三年)春正月,周德威攻克顺州(今北京市顺义、怀柔区),刺史王在思被擒;又拔安远军,擒获燕将18人;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守将成行言投降。二月,晋将李存晖攻克燕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刺史陈确以城降”^⑪。三月,周德威攻克燕卢台军;晋将刘光浚攻

打古北口,居庸关使胡令珪等不战而降。燕主刘守光连连失城,损兵折将,便向契丹求救,派大将元行钦率兵7000在山北(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募兵,命骑将高行珪为武州(今河北宣化)刺史接应契丹援军。晋周德威派李嗣源、李思本、安金全等攻克山后八军,晋王以其弟李存矩为新州(今河北省涿鹿县)刺史。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珪向晋军投降。刘守光得知后遣元行钦围攻高行珪的军队,高行珪之弟高行周向晋军求援。李嗣源增援并与高行珪合力夹击燕军,元行钦被追至广边军(今河北省怀来县北130里)时,力屈而投降。随后,李嗣源又攻下儒州(今北京市延庆县),至此山后各州均被晋军占领,幽州陷入重围。

四月,燕将李晖等二十余人带族人来降。晋周德威进军逼至幽州城南门,二十日刘守光遣王遵化致书周德威求和,周戏谑道:“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怯劣如是耶?”^⑩周德威未答应;刘守光复致书再次乞和,语气甚是卑微,周德威将此告于晋王。二十七日,晋将刘光浚拔平州(今河北省卢龙),擒得刺史张在吉。五月,再攻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刺史杨靖投降。六月初一,晋王遣监军张承业至幽州,与周德威商议军事。秋七月,承业与德威率千名骑兵至幽州西,刘守光派人持信箭一只,乞修和好,“承业以其无信,不许”^⑪。九月,刘守光夜间引兵突围,攻占顺州。十月一日,再次率兵5000夜出,进攻檀州,欲打通北走契丹之路。第二天,周德威自涿州带兵迎击,大破燕军,刘守光只以百余残兵逃回幽州。被困守在幽州城内,刘守光一筹莫展,再次向契丹求救。契丹以其无信,不救。于是刘守光复又向晋王乞降,晋王怀疑有诈,也不许。十一月,晋王以监军张承业权知军府事,自诣幽州。二十四日,晋军从四面攻入幽州城内,擒得刘仁恭及其妻妾,刘守光携妻子出逃,至燕乐(今北京市密云县)境内被俘。刘仁恭、刘守光父子自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依李克用之力割据幽州,经十九年终又被其子李存勖所灭。晋王任命周德威

为卢龙节度使,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乾化四年(914)正月,刘仁恭父子在李克用墓前被杀,王镕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李存勖为尚书令。由此,晋王势力延及河北幽燕地区,为取代后梁奠定了基础。

刘守光的大燕之所以被出师千里的河东晋军打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刘守光据守的幽州及河北地区尽管形势雄要,物阜财丰,军队也颇为强悍,然而相比梁、晋而言还是要稍逊一筹。晋与梁有仇,其亡梁之心不移,但还不具备必胜之力。骄矜自大的刘守光,不顾别人劝阻,未能认清形势,贸然出兵引火烧身。

第二,晋王李存勖审时度势,采取了正确的击南灭北的军事策略,表面上集中兵力南下攻梁,实则暗渡陈仓,北上灭燕,扫除后方大患。

第三,刘仁恭父子的残暴统治使得幽州军民对其唾弃万分,待晋攻燕时,许多将士官员纷纷倒戈投降,众多城池不攻自破。

第四,与幽州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镇、易二镇,位于河北北部逼近幽州,分别控有井陘和飞狐两处通往河东的险要关隘,刘守光不能及时与此二镇联合共同抗击河东,于是失去了西南部屏障,任由河东军队长驱直入。

第五,晋军兵分两路,坚持围城打援、伺机进攻的策略。周德威专攻刘守光,李存审屯兵赵州阻截梁军北上,切断燕、梁联系。周德威将幽州城围而不打,攻占其周边州县,刘守光城内无援,不得不俯首就擒。

第六,刘守光妄图向后梁或契丹求救,均告失败。后梁与晋有世仇,欲解幽州之围,但内部叛乱造成自顾不暇;而契丹因刘守光反复无常,坐山观虎斗,未出手相救。

三、契丹崛起及幽州之战

晋灭燕的同时,后梁朝廷内叛乱迭起。913年(乾化三年)均王朱友贞将弑君的朱友珪杀死,夺取帝位,即梁末帝。晋王占领河北幽燕地区以后,似乎在北方只有梁、晋

两大军事集团争霸,但实际上东北的契丹族正虎视眈眈的坐观中原态势,准备南下进攻。早在刘仁恭父子统治时期,除许多百姓纷纷向契丹境内逃亡外,大批在幽州地区不得志的汉族谋士也投奔到耶律阿保机麾下,为契丹出谋划策攻城略地。随着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日益强大的阿保机于916年(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自号天皇王,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平定了内部的叛乱以后,阿保机将眼光投到垂涎已久的中原地区,静观其变。此时,阿保机已不满足于仅仅是掠夺人口、物资,更多的是占有土地,而幽州成为首要的攻占目标。

晋王在灭燕后,便将重心转移到同黄河流域的后梁作战上,幽州军事由社稷重臣周德威负责。周德威在出任卢龙节度使后,其主要职责是配合晋王南下作战,监视幽州归降军队,巩固北部边防。为了确保对幽州地区的控制,周德威对幽州有威望的降将痛下杀手,“(德威又)忌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⑭,这大大削弱了幽州军队的整体作战实力。另外周德威注意力都在南下与后梁的争夺战上,忽略了对东北契丹的遏制。契丹若要南下必须经过幽州东北的渝关,“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⑮,此为中原防范东北的第一道关口,但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后,“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⑯周德威的轻敌为契丹打开了南下的门户,这不但给当时晋与梁的争霸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更为以后的中原政权埋下了长期战争的巨大隐患。

阿保机建国之初,见李存勖在北方幽州、云州一带防务力量比较空虚,遂亲率30万大军进攻蔚州(今河北省蔚县)。契丹军队挖地道,昼夜急攻。蔚州城内兵少又无援军,契丹人攻入城内,俘虏了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及其子4人,随后又攻下新州、武州、妫州、儒州等地,接着阿保机欲乘势攻打云州。云州在蔚州西面,北控阴山及大漠,南扼太原,东连易州,西面以黄河为界,是秦汉以来

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另一重要通道。晋大同节度使李存璋顽强抵抗契丹的进攻。李存勖深怕云州失守,危及河东的安全,亲自率兵前来救援。阿保机得知晋王已达代州,急忙撤军,李存勖也回师太原。

917年(后梁贞明三年,契丹神册二年),李存勖在黄河附近的莘县(今山东省莘县)与后梁大将刘鄩对峙,命威塞军防御使(治新州,今河北涿鹿)李存矩在山北各少数民族募兵买马,并及时送到前线。李存矩带着裨将卢文进一道押送500士兵南下。走到岐沟关,士兵不愿前行,众人商量道:“我辈边人,弃父母妻子,为他血战,千里送死,固不能也。”^⑰众人响应,夜间杀死李存矩,并拥戴卢文进为将军,欲据守新州自立。卢文进带领乱兵攻打新州、武州,未攻下。李存勖急命周德威领军追讨,卢文进趁机北逃投降契丹,被阿保机授予幽州兵马留后。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再攻新州,晋新州刺史安全全弃城逃走。卢文进以部将刘殷为新州刺史,李存勖命幽州节度使周德威领兵3万攻打新州。周德威于城东安营扎寨,经过10天奋战,仍未能攻入城内。阿保机在卢文进的引领下,亲率30万大军南下进攻。周德威势单力薄,败退幽州据守。

阿保机乘胜追击,将幽州城团团围住。契丹号称有百万大军,幽州以北山谷之间,到处是契丹军队的毡车毳幕。卢文进带领汉人教授契丹军队制造飞梯、冲车等攻城器械。契丹军队挖地道,筑土山,分别从地上地下四面围攻幽州城。晋军随机应变,在地道中燃烧柴草阻止契丹军队的进入,另外在城内将烧熔的铜液泼洒攻城的契丹士兵。每天契丹士兵死亡数以千计,但是阿保机仍命军队强攻,毫无退却之意。幽州城内形势危急,周德威急命使者向李存勖求救。而此时晋王正与后梁军队相持在黄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⑱。于是晋王与诸将商议,众人皆劝晋王放弃幽州,但惟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人劝谏出兵援救。李嗣源请命,“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

身为前锋以赴之”^⑩。李存审和阎宝认为契丹军队缺少后勤供给,难以维持长久,待粮草尽无,与周德威里外夹击,给与重创。晋王采纳了三人的建议。

四月,晋王令李嗣源领兵先进驻涑水,阎宝率镇、定之兵紧随其后。李嗣源、阎宝兵力有限,难以取胜,晋王又命横海节度使李存审率兵前往增援。八月,晋军三将会师于易州,共有步骑兵7万人。此时,幽州城已被围困二百多天,形势紧迫。考虑到敌众我寡,而且契丹骑兵骁勇善战,善于平原作战,晋军步兵利于山险作战的特点,三人商议确定“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⑪的作战计划。十七日,李嗣源率兵出易州北行,二十三日翻越大房岭(今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西),沿山涧向东挺进。李嗣源与其养子李从珂率3000精兵为先锋,在距幽州60里处与契丹军相遇。契丹兵大惊,双方展开激战。当时契丹兵在山上,而晋军在山涧下,每到山谷口,契丹军奋力阻击,嗣源父子拼死冲杀,才得以冲出山口。晋军刚至山口,契丹1万多骑兵突然横列阵前。李嗣源率百余名骑兵策马扬鞭冲锋在前,怒斥道:“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⑫三破敌阵,杀死契丹酋长1名。此时,晋军大部队赶到,契丹被迫退兵。晋军继续向幽州进发,李存审命步兵每人伐木做成形似鹿角的木叉,宿卫时将叉柄埋在地下,叉头露在地上,以结寨自卫。契丹军环寨而过,晋军从寨内射出强弩,契丹士兵马匹死伤无数。在距离幽州不远处,李存审命步兵埋伏在契丹阵后,并遣部分羸弱士兵燃烧柴草,霎时烟尘满天,契丹骑兵很难发挥作用,且不明晋军兵力。晋军鼓噪合进,李存审又命伏兵自契丹阵后发起攻势,契丹军腹背受敌大败,仓皇从幽州以北山路逃去。契丹军丢车弃帐,铠甲、兵器、羊马散遍于野外。晋兵追击,斩杀数万契丹军士。二十四日,李嗣源进入幽州城与周德威会合,周德威执手而泣,幽州之围遂解。

幽州之战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以少胜多

的战役,契丹一次出动30万大军,而晋方只有以步兵为主的10万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最后晋军却斩杀契丹军数万,大获全胜。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晋军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案,扬长避短,巧妙避开契丹军善于骑兵作战的优势,充分发挥步兵特长;第二,周德威虽在新州战败,退回到幽州城坚守,利用幽州城池的坚固昼夜防御,被围困长达二百多天,拖住契丹军,待援军到来之时,里外夹攻,终保幽州不失,显示出周德威高超的军事才能。

另外,幽州之战的胜利还说明一点,尽管中原梁、晋政权实力不强,而且还互相攻伐;但此时契丹也属初兴,其虽有南下幽燕之心,然尚无人主幽燕之力。因此,只要中原王朝还有能力控制幽、云地带,就足以抵御契丹的南下进攻。

四、后唐经略幽州及幽云十六州的割让

919年(后梁贞明五年)正月,晋王李存勖遣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三月,晋王自领卢龙节度使,派中门使李绍宏提举府事,进而代替李嗣昭。晋王亲领幽州,足见其对这一区域的重视,但他的军事重心仍然是攻灭后梁。北方边陲缺少得力大将管理,契丹虽在幽州之战大败,但是阿保机仍然时常侵袭幽州地区,大肆抢掠。921年(后梁龙德元年,契丹神册六年)十二月,阿保机再次进攻幽州城,不克,而后长驱南下攻陷涿州,俘获刺史李嗣弼,再攻定州。晋王李存勖得知定州危急,亲领五千精兵救援。同时命令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在狼山(今河北易县西南)屯军防御契丹的南进。922年正月,李存勖军队抵达新城南(今河北新城东南),此时,契丹前锋3千骑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渡沙河南行,临近镇州边界。晋王采取李嗣昭、郭崇韬的主张,即坚决打击契丹前锋以迫使其全军撤退。晋王帅5千骑兵迎击,契丹惊恐退却,至沙河桥时契丹士兵溺死不少。当晚,晋王屯军

新乐,阿保机率军退至望都。正月十七日,双方在望都发生激战,晋王李存勖被围,晋将李嗣昭帅3百骑兵突出重围,打退敌人救出李存勖。晋王乘胜追击,契丹军大败。时值天寒地冻,路面积雪达数尺,契丹兵马冻饿交困,死伤无数。晋王追到幽州,代州刺史李嗣肱又收复了山北的妫州、儒州、武州等地。定州之战晋王李存勖亲自带兵作战,打击了契丹的嚣张气焰,并保卫了幽州及其以南地区。

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定州之战让他意识到防范日益强大的契丹已经是迫在眉睫。同年三月,以横海军节度使、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幽州节度使。次年三月,又以幽州节度行军司马

李存贤依前检校太保,为幽州节度使。925年(同光三年)正月,李存贤在幽州任上病故。二月,庄宗李存勖以沧州节度使李绍斌为幽州节度使,依前检校太保。李绍斌即赵德钧,原是幽州人,曾为沧州刘守文军下一员,待刘守光政变,又投到燕国;李存勖灭亡燕国以后,他又归降于晋,受到赏识,被赐名李绍斌,官至沧州节度使。从周德威到李存贤,这十余年间,幽州地区的军权都是掌握在河东大将手里,而赵德钧的到任,使得幽州节镇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被本地将军所把持,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幽州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契丹人在望都战败后,对幽州地区仍不断发动规模不等的进犯,相关情况如下表:

922年至928年契丹袭扰幽州一览表

时 间	事 件
922年(后梁龙德二年 契丹天赞元年)	二月,契丹攻略幽、蓟。 十一月,契丹皇子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略地蓟北。
923年(后梁龙德三年 契丹天赞二年)	二月,契丹攻幽州,抄掠而退。 闰四月,契丹犯幽州,至易、定而还。
924年(后唐同光二年 契丹天赞三年)	正月,契丹扰幽州,至瓦桥关。攻陷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地。 九月,幽州言契丹入寇。
925年(后唐同光三年 契丹天赞四年)	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李嗣源在涿州生擒契丹首领30人。
926年(后唐天成元年 契丹天显元年)	八月,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
928年(后唐天成三年 契丹天显三年)	七月契丹攻定州,北逃入幽州境。 八月,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諫生擒惕隐等数百人。

说明:上表根据《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和《辽史》所作。

从上表可以看出契丹对幽州几乎每年必犯,而且多是在夏秋之交或初春时节南下。其原因显然是契丹为过冬储备足够粮草,赶在中原粮食收获时节抢掠;而寒冬过后物资匮乏,又急需补给,所以再次出兵。赵德钧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抵御契丹的骚扰。一方面,为保证军粮的正常供给,征发河北地区民夫修筑运河,“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②,此举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运输效率。另一方面,在阎沟、潞河、三河县修筑城池,派驻军队,保

证运粮线的安全。三座城池,都位于要害之地,加强了幽州同蓟州、涿州等城市的联系。通过赵德钧的这些举措,幽州地区有了短暂的安宁,“由是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输饷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帐居捺剌泊,出寇云、朔之间。”^③鉴于此,后唐明宗也加强了云朔地区的防御力量,派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此举虽对契丹有所防范,但同时为石敬瑭联合契丹谋反创造了条件。

赵德钧本人也因镇守有功而加官进爵,“德钧镇幽州凡十余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北平王。”^{②4}在军事防范契丹的同时,赵德钧不同于以往的卢龙节度使,他也尽量同契丹改善关系,以达到双方修好。931年(契丹天显六年),耶律德光“遣人以诏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②5}。第二年,赵德钧遂遣人进时果于契丹。“盖德钧久在边境,尝与契丹通好也。”^{②6}由此看来,赵德钧管理幽州一方面加强了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也同契丹有所联系,这为将来他起兵叛唐投靠契丹埋下了伏笔。

936年(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五月,后唐末帝恐握有重兵的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石敬瑭联合契丹谋反,命其徙镇郢州。石敬瑭拒命,借端起兵晋阳(今太原南晋源镇)反唐,同时遣使求救于契丹,“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②7},得到契丹太宗耶律德光的应允支援。闰十一月,石敬瑭与耶律德光挥师南下,赵德钧父子降契丹。二十六日,末帝自焚,后唐灭亡。

石敬瑭称帝后,立即兑现之前向契丹所许下的承诺,将幽州、蓟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割让给契丹。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江山社稷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历史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即所谓的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塞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石敬瑭割让十六州,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

守的被动地位。又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改幽州为南京,升为陪都就是最好的证明。契丹扼守住幽云十六州这片险要之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北方,频频向中原发起进攻,成为中原王朝长期的心头大患。

有鉴于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中原后周、北宋王朝几次北伐欲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幽州也由原来北方的军事重镇,一跃成为辽朝的政治陪都、军事前哨和物资战备基地,这标志着其城市地位的上升。

五、余 论

综上所述,五代时期幽州地区的军事与战争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地方割据势力的称霸战争、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争夺战争交织混合。朱温据守黄河中下游诸多藩镇,灭唐称帝,建立后梁;晋王李存勖控制河东地区;刘守光僭越称帝成为幽燕地区统治者;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崛起,对中原虎视眈眈;幽州遂成为争夺对象,战争在几方势力之间展开。

2. 在幽州的数次战争中,将士倒戈骑墙现象频繁。刘守光囚父杀兄时,大将王思同、李承约“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②8},遂投降晋王;晋军攻打幽州周边城池时,众多首领纷纷投降,如蓟州守将成行言、居庸关使胡令珪、武州刺史高行珪等。契丹攻打幽州时,晋军将领卢文进投降契丹,复又领兵归降后唐,而后再叛逃亡契丹;赵德钧原在刘守文手下,而后投靠刘守光,李存勖灭燕时投降晋,任幽州节度使时,又刻意与契丹通好,石敬瑭反唐后,他最终投降了契丹。总之,五代时期不单单是幽州也包括其他地区,由于局势混乱,战争频繁,导致军心不稳,地方将领为保存自身实力,倒戈骑墙之风颇盛。

3. 契丹族日益强大,南下中原攻城略

地已成为必然趋势,而幽州首当其冲。尽管在与中原政权的争战中,契丹军队多次被击败,但契丹统治者却始终不放弃争夺中原的政治企图。依靠汉族士人韩延徽等人的协助,采用“远交近攻”、“以汉制汉”的策略,刘守光父子统治幽州时期,契丹与河东的李克用结盟;晋灭燕后,契丹收留晋叛将卢文进反攻幽州;待石敬瑭叛唐则趁火打劫最终占据幽州等地。

4. 后唐政权对于北方军事重镇的管理疏忽,促成了幽云十六州的割让,并导致了政权的瓦解。在选派大将镇守幽云防御契丹的同时,忽略了对守将的监督,一是石敬瑭的阴谋异志起兵叛唐,二是赵德钧父子在关键时刻的叛变。因此,中原政权在任命重臣抵御北方契丹侵扰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守将的监督,否则在动荡不安人心散乱的战争时期,极易发生将领借助契丹势力谋反之事。

5. 五代时期北方地区的战争中,大规模的骑兵作战突出,军马需要量极大。北方出现大批骁勇善战的骑将,例如周德威、李嗣源、史建瑭等。契丹骑兵也十分彪悍,攻幽州时一次就出动大军 30 万,数量庞大。战争频繁,战马损失严重,因此对战马的牧养、征用和向少数民族换购现象普遍。例如李存矩为支持晋王与梁军作战,在河北幽州等地征马,募兵数千人,强迫百姓以十头牛换一匹马从军。

总之,五代前期的 30 年间,幽州地区虽几经易手,从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到后唐李存勖,但都是控制在中原政权范围内,北方强大的割据势力争相控制此地,妄图称霸整个北方,因而战争频繁不断。石敬瑭叛唐称帝以后,将幽云十六州割让契丹,幽州成为契丹陪都南京,揭开了其通向首都之路的序幕。由此中原王朝在失去幽云等北方屏障后,也随之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收复战争。

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载:“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

②参见《新五代史》卷三十三《王恩同传》;《旧五代史》卷九十《李承约传》。

③《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守光传》。

④《旧五代史》卷二七《庄宗纪一》。

⑤《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乾化元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乾化元年”。后世为避免与安禄山“大燕”混淆,史称刘守光建立的大燕为“中燕”。

⑦ 907 年(后梁开平元年)五月至二年五月,后梁军攻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被晋王军击败。910 年十二月至第二年正月,李存勖率军出援河北赵王王镕,于柏乡(今河北柏乡西南)击败后梁军。

⑧《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乾化二年”。

⑨《旧五代史》卷二八《庄宗纪二》及《册府元龟》卷八均作“羊头冈”,而《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及《册府元龟》卷三百四十七作“龙头冈”。按:《水经注疏》卷十二“圣水”记载有“羊头阜”,杨守敬按语:“《房山县志》:羊头冈在县北六里。”今房山旧县城北仍有“羊头岗”地名。此处依《旧五代史》说。

⑩⑪《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乾化二年”。

⑫《旧五代史》卷二八《庄宗纪二》。

⑬《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乾化三年”。

⑭⑮⑯《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三年”。

⑰《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

⑱⑲《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三年”。

⑳㉑《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后梁贞明三年”。

㉒《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德钧传》。按:王马口,今河北省安次县王马口村,游口在今河北省信安镇。

㉓《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

㉔㉕㉖《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德钧传》。

㉗《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天福元年”。

㉘《旧五代史》卷九十《李承约传》。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研究生)

明熹宗天启六年地震新考

于德源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在包括北京城在内的河北遵化、蓟县、宣化,以及山西大同、山东济南、东昌等地发生强地震,史称“地大震千余里”^①。但是,由于在地震发生过程中,北京城内西南隅的王恭厂(今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西口附近)火药库发生意外大爆炸,摧毁民居10000余间,死伤500余口,方圆5里均被夷为平地,声闻数里;所以,后世在观察这年的地震时不免产生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年所谓的地震实际是王恭厂火药灾引起的震动,并非天然地震。另一种意见认为,这年北京确实发生了地震,只不过与王恭厂火药灾巧合而已。也有学者认为,王恭厂火药爆炸的巨大冲击力和震动力引发了北京地区浅地层断裂带的活动,因而诱发了地震即属于人为地震。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拟分别讨论。

首先是关于王恭厂火药灾。明代,政府在城内设厂专门制造、贮存火药和兵器。当时制造的是黑色火药,制成后装入陶坛内贮存在地窖里。明朝宦官专权,遍及政府各个部门,在火药库的管理方面也不例外。由于这些人没有知识,又擅权胡为,故火药库屡屡发生事故。例如,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九月丙申,是日申刻,京师地震,自东北向西南行,连动二次。时三大营(按,即京军)官军于盔甲厂(今北京东便门内盔甲厂胡同)关领火药。监放火药的宦官臧朝、王才因坛内旧火药已结成硬块,不便分发,就命令工匠用铁斧劈开,结果造成

爆炸,“声若雷霆,火枪、火箭迸射百步之外,烧死臧朝及把总傅钟等十员、军人李仲保等八十三名。其局内工匠人等并街市经过居民死伤者多不可稽,焚毁作坊五连,约三十余间,火药火器无算”^②。人们一般认为明代北京城内火药厂灾始于熹宗天启六年的王恭厂灾,实际如上所述,在神宗万历之世就已有发生,只不过天启六年王恭厂灾是其中最大的一次。

在其后的毅宗崇祯之世,此类事故仍然频繁不绝。如崇祯七年(1634年)“九月庚申,王恭厂火药灾,伤毙数千人。”^③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一年之中,竟连续发生3次之多。《明史·五行志二》记载:“十一年四月戊戌,新火药局灾,伤人甚众。六月癸巳,安民厂灾,震毁城垣廨舍,居民死伤无算。八月丁酉,火药局又灾。”^④安民厂在北京西直门街北,是天启六年王恭厂火药灾后,熹宗另在这里择址新建的火药兵器厂。新火药局在宣武门街北口街西,是毅宗崇祯之世建立的火药兵器厂。关于此事,明末清初人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戊寅(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药之变,而四月为甚,石板平地空起……三次余皆在寓所,有声自远而至,地如簸扬,摇门窗殷殷而过。”^⑤太监刘若愚《明官史》记载更详:“崇祯戊寅(崇祯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卯时,新火药局忽震一声,损坏房屋、人民许多。至六月初二日午时,安民厂大震,略减于天启六年时也。八月初

七日卯时,局复大震,且延烧草若干棵。其涌起之烟,各如灵芝、如云、如浪,移时方散。圣明(指崇祯皇帝)矜怜之,发银分赈……复施棺或席殓埋……至庚辰(十三年,公元1640年)四月初二日,新局造火药处,复响一声,损人命房屋甚多。”^⑥

不过,崇祯年间北京发生火药灾的原因与万历年间不同。崇祯之世,大江之北,各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明朝大军疲于应付,屡受重创;关外后金大军动辄溃长城而进入京畿,甚至深入山东、河北腹地,犹入无人之境,明军根本不敢拦截。由于明军全部调出作战,京师特别是皇宫大内防守空虚。崇祯皇帝竟然异想天开,把手无束鸡之力的太监组织成军伍,进行操练,称之为“内操”。太监操练,支领火药兵器时耀武扬威,恣意胡为,其他人不敢阻拦,所以屡屡发生火药爆炸的事故。杨士聪说:“是时内操方盛,无岁不变,而戊寅(崇祯十一年)为甚,迨辛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罢内操年余,而火变亦绝。”这就说清楚了崇祯年间北京城内火药灾频频发生的真正原因。不过,也有官军领取火药时不注意而发生事故的。如清人董含记述说:其先祖在明代任顺天巡按时“蓟州军戴光带家人同领火药,药凝结成块,以铁瓢挖之,用力过猛,搏击生火,成药十三缸,同时爆发,戴光等皆死”^⑦。根据现代常识可知,用铁瓢挖火药,即使没有凝结成块,也很容易因摩擦生热而引起火药燃烧和爆炸。这种火药意外爆炸的事情直到清朝初年还曾发生过。《广阳杂记》记载:“乙丑(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正月二十日,京城旧火药局(按,即明新火药局,在宣武门内)地轰,坏屋伤人无数。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时,即藏火药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实火药于中,上盖石板,再加横木,复覆以土,以备不虞。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忽轰,十六年更藏入穴,今复发其五。”^⑧这条材料在清代官书中皆不载,值得注意。不过,至于直接将火药埋在地穴中的传说肯定不对,那样会使火药变成废物,而且也取用不便,还应是《实录》

所记的藏于坛中为是。

明熹宗天启六年北京王恭厂火药灾,《实录》记载:“天启六年五月戊申(初七日),巳刻,王恭厂灾……王恭厂之变,地内有声如霹雳不绝,火药自焚,烟尘廓空,椽瓦飘地,白昼晦暝,西北一带相连五里许,房舍尽碎……塌房一万九百三十余间,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名口……己酉(初八日)谕云:‘乃五月初六日(丁未)巳时,地鸣震兢,屋宇动摇,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厂一带,其房屋尽属倾颓,震压多命。’”^⑨在以上记载中,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王恭厂灾究竟是发生在五月戊申初七,还是丁未初六?《明史·熹宗纪》载:“天启六年五月戊申(初七日)王恭厂灾,死者甚众。”《明史·五行志二》也从本纪,称事在五月戊申即初七日,但同书《五行志三》在记述王恭厂灾造成石狮掷出城外时却记在五月丁未即初六日^⑩。另外,前述熹宗的上谕中也明确说是“乃五月初六日(丁未)巳时,地鸣震兢”,发生王恭厂灾。更何况,当时人刘若愚《明宫史》中也记载五月初六日王恭厂灾。由此可见,王恭厂灾确实是发生在五月丁未即初六日,初七日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确定这一点,对于以下的分析工作十分重要。

天启六年北京王恭厂火药灾发生在五月丁未初六日,而就在同一天“昌平州地震”^⑪。密云县则是在初六日“巳时,从西南来,有声如雷;至初九日丑时,复巨声西来,门窗皆响,几座倾摇”。蓟辽总督闫鸣泰奏称:密云县报告,五月初六日巳时地微震,初九日丑时复大震^⑫。可见密云县所谓有巨声从西南来的同时也感到了地震。另外,《实录》记载,王恭厂灾的同时,“蓟门地震”。蓟门就是蓟镇,始建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当时兵部奏言:大同、陕西、宣化都有镇,“惟蓟独无”,建议在渤海所(今北京怀柔渤海寨)南建镇。至穆宗隆庆年间,以戚继光总督蓟辽军事,负责保定、永平、山海边务,蓟镇东迁到永平三屯营(今河北迁西三屯营),近世其地尚有戚继光总镇府遗址。所以,《实录》所说的“蓟门

地震”，实际就是指北京东部的河北遵化、迁安、天津蓟县等地发生了地震。只不过，《实录》将“蓟门地震”与王恭厂火药灾一样系于五月戊申初七日之下，其致误之由相同。《蓟州志》载：“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京师地震，王恭厂灾。是日，蓟地同震。”^⑬可见，所谓蓟门地震也同样是发生在五月初六日。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王恭厂火药爆炸的威力惊人，世所未见。其在京城内造成的破坏范围，一说是东到阜成门，北至刑部街（今北京民族文化宫南），“亘四里，阔十三里”^⑭；一说是“自宣武门街迤西，刑部街迤南”，“自西安门一带皆霏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爆炸现场“有坑数丈”^⑮。“药楼飞去，而陷数丈之坑”^⑯。至于伤亡人数，《实录》说是500余人，显然不确。因为明毅宗崇祯十一年六月安民厂灾，《明史》明确记载：“坏城垣，伤万余人”^⑰，而刘若愚尚称“其略减于天启六年时也”。若以此为据推算，天启六年王恭厂灾中伤亡人数应当在万人以上。关于天启六年王恭厂灾中伤亡的确切数字，刘若愚说：“杀有姓名者几千人，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⑱又一说：“死者以千数。”^⑲《明季北略》则说，毁屋数万间，伤亡人二万余，乾清宫大殿摇动，御案、御座皆翻倒，建极殿槛驾瓦飞堕^⑳。《明季北略》是明末清初人计六奇撰于清初，故于明代史事没有避忌之虑，且关于此灾变其又是据官方邸抄，所述似较他书更为可信。总而言之，天启六年王恭厂火药灾中，伤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记载比较接近实际。这场大灾难祸及周围12里，“天崩地陷，昏黑如夜，万室平沉……震声南至河西务”，为人世所罕见。可以想象，人们自然会对其做出过分的猜测。杨士聪在记其事时，便将其与同时发生的地震并为一事，说：“火药之灾始于王恭厂（按：误。前引实录已记载万历时曾有过京城火药爆炸事）。遵化去京三百里，皆闻其声。人或以为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乃王恭厂灾。”^㉑持相同看法的并不止杨氏一人。事

发当时，顺天巡抚刘诏上言：“臣循例谒陵，于初六日回至平谷县。巳时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窃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㉒他和杨士聪一样，最初认为地震，后又以为是王恭厂火药爆炸所致。

但是，我们根据现代科学知识可知，以王恭厂制造火药处那样规模的爆炸，其产生的地面震动和声响，传到通州河西务那样的距离尚属可信；如果说是远在百里之外的平谷、密云、遵化、迁安的地面都随之发生震动并听到如雷的声响，那就确实属于夸大其辞。退一步说，即使该地听到了爆炸声，按照声波在传播过程中的递减原理，其在密云等地也不会像在京城那样响声如雷。再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如果王恭厂火药爆炸真正能够引起百里之外的密云、平谷、遵化等地同震，那么北京城应当早已不存在了，决不会仅仅夷平其西南一隅的建筑。当然，地下火药爆炸可以引起地面的震动，甚至引发地震，但那是有条件的事情。美国内华达州核试验场实验证明，地下核爆炸可以引发5级左右的地震。但是，核爆炸时，在百万分之一秒内使大气压猛增加几千倍，温度增至百万度，周围岩石汽化沸腾，产生巨大的爆炸力。显然，明代仅仅贮存黑色火药的王恭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即使是内华达州那样的地下核爆炸也只是使50公里（即百里）以外的地方感到震动10秒。因此，如果说北京王恭厂火药灾能够使身在百里之外的密云、遵化居民听到雷鸣声响并感到地动；或者说，能够引发北京周边地区发生地震，那都是不真实的。事实的真相大约应该是，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在北京及河北北部地区发生地震时，恰巧北京发生了王恭厂火药爆炸灾；或者是，在王恭厂火药爆炸的同时，恰巧北京及河北北部地区发生了地震，两者其实并不相干。而且，即使两者之间真正存在什么联系的话，那也只能是地震造成地窖内火药坛倒塌、撞击，引发了火药爆炸，而不是相反。

其实,前引《蓟州志》中说得很明确,其过程是“京师地震,王恭厂灾”,蓟镇同日皆震。《实录》将日期误系于初七日,但其叙事过程并不错,称初六日巳时,地鸣震兢,屋宇动摇,然后才是王恭厂灾发生。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即使在将地震和火药灾混为一谈的杨士聪和顺天巡抚刘诏的记述中,也都不约而同的强调,在火药灾发生前的一天或数天,北京城内不同地点曾发生地鸣、地火现象^②。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地声、地火经常是地震发生的先兆。《明季北略》记载,在王恭厂火药灾发生前,北京东北方有声如吼,这就把地震前的地鸣和王恭厂火药爆炸声更加明确区分开来。

另外,从五月初六日以后发生的事情中,我们也可以判断初六日当天北京地区确实是发生了地震。前引《实录》记述,密云县在初六巳时地微震后,复于初九日丑时大震。显然这是初震和主震的关系,应该和初六日的火药灾无关。其实,真正的主震是发生在六月。《实录》记载:“六月丙子(初五日),寅时,京师地震。是日,天津三卫、宣(化)、大(同)俱连震数十次,倒压死伤更惨。山东济(南)、东昌二府,河南一州六县俱震。”^③北京方志记载,这一天北京通州地震,从西北至东南,震圯民居无算^④。这次大地震范围所及,西至山西大同,东至天津,北至宣化,南至山东、河南,影响不可谓不大。从通州的记载分析,这次地震的震源在北京的西北方向。《明史·五行志三》在记述了北京、天津、宣化、大同、山东、河南等地地震之后,又记述“山西灵丘昼夜数震,月余方止,城郭庐舍并摧,压死人民无算”^⑤。山西灵丘在北京西部、河北蔚县西南,是这次大地震的震中,震级为7级^⑥。灵丘位于河北蔚县——昌黎地层断裂带西端的蔚县附近,这次大地震的发生正是这条断裂带应变积累释放的结果。这条断裂带是燕山地地震活动带的一部分,所以山西灵丘地震也同样引发了京师地震。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同一地震活动带的一部分,此前五月初六日北京昌平、密云、平谷和河北遵化、迁安等

地与王恭厂火药爆炸恰巧同时发生的“地微震”,实际应是地层断裂带应变积累的初期缓慢释放阶段即初震。

总而言之,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至六月间北京及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的大地震,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五月份的地震灾害以北京城内为主,由于同时诱发了火药爆炸,死亡人数达20000以上,建筑倒塌上万间。六月份地震的灾害以今山西灵丘、大同,河北蔚县为主。北京以东的蓟州,地震千余里^⑦。灵丘自六月初五地震,一月不止,城郭庐舍尽倾,压死5000余人。蔚州(治今河北蔚县)地大震,城垣颓坏,官民庐舍摇毁无数,人多压死。大同府地震,自初五起,其声如雷,城郭倒塌28处,浑源州、王家堡,城垣倒塌,房舍十倾八九,积尸匝地,秽气熏天^⑧。

①⑬《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顺天府部·纪事》引《蓟州志》。

②《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十三 万历三十三年九月丙申。

③《明实录附录·崇祯实录》卷七 崇祯七年九月庚申。

④《明史》卷二十九《五行志二》。

⑤《玉堂荟记》卷上。

⑥⑬⑭《明宫史·木集》“安民厂”。

⑦《三冈识略》卷一“火药”。

⑧《广阳杂记》卷一。

⑨《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天启六年五月戊申。

⑩《明史》卷二十二《熹宗纪》;卷二十九《五行志二》;卷三十《五行志三》。

⑪《光绪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表》。

⑫《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天启六年五月戊申、庚申。

⑬《帝京景物略》卷一《城北内外》。

⑭孟森:《明清史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2页。

⑮《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纪二》。

⑯《泊水斋文抄》卷三《明故文林郎王公墓志铭》。

⑰《明季北略》卷二《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记异》。

②④《玉堂荟记》卷下。

②⑤《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天启六年五月乙卯。

②⑥《明史》卷二十九《五行志二》：“天启六年五月戊申，（误，当为丁未），王恭厂灾，地中霹雳声不绝，火药自焚”；“五月壬寅朔，厚载门火神庙红球滚出”；《玉堂荟记》卷下：王恭厂灾，“先一日，东城火神庙有声隐隐自庙中出。”

②⑦《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天启六年六月丙子。

②⑧康熙《通州志》卷十一《祿祥》。

②⑨《明史》卷三十《五行志三》。

②⑩楼宝棠主编：《中国古今地震总汇》，地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②⑪《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天启六年六月丙子。

②⑫崇祯《蔚州志》、金日升《颂天牒笔》，转引自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北京地震考古》，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上接第70页）

私第”，……乾符二年七月十一日，迁窆于海北乡兴寿里之原（今昌平区兴寿镇）。桃林里未祥属于何乡？昌平有永宁村，也未见乡属，《敬延祚墓志》：“终于昌平县界永宁村之私第”，另《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记有：（昌平）辅化乡口冠村，可见昌平区已见六乡。唐代北京地区除设有幽州外，另有顺州、檀州，檀州有密云县：见《李（休）府君及妻阳氏墓志》“（大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合附于檀州密云县东七里”，《刘（龙）府君墓志》“（大历十年）十月十九日葬于檀州城密云县城关大唐庄”。

5. 后 记

北京唐志所反映的不仅是对唐代幽州建制、官署、职官、里坊村乡考证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幽州的经济、文化、宗教、交通等各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只是限于篇幅，文中不再述及。

①（汉）桓宽《盐铁论·通有篇》。

②（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金陵书局，光绪八年版。

③（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④《新唐书·方镇表三》。

⑤《旧唐书·地理志二》。

⑥《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十九·地理二”。

⑦《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⑧《旧唐书·食货志上》。

⑨《旧唐书·五行志》。

⑩（宋）路振《乘轺录》粤雅堂丛书本第三编第二十三集。

⑪鲁琪《唐幽州城考》，《北京史论文集》（二辑）。

⑫朱士端《宝禄堂收藏金石记》卷四，23页，春雨楼丛书本，同治二年版。

⑬赵万里辑《元一统志》。

⑭《唐六典》卷三·户部，《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户部尚书”。

⑮《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 大唐令”。

⑯《旧唐书·地理志二》。

⑰《太平寰宇记》卷六九·河北道“幽州蓟县幽都”条。

⑱《初探》、《再探》二文载《首都博物馆十五周年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⑲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

（作者为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管所干部）

琉璃河桥维修纪略

孔庆普

琉璃河桥是京保公路(北京至河北省保定市)上的一座大石桥,跨于琉璃河上,因此而得名。该桥是一座 11 孔联拱石桥,建于明嘉靖年间,明代和清代曾经数次重修。民国时期曾数次修葺,均属于一般维护。

一、历史概况

1950 年 4 月,政务院命北京市人民政

府,将京保公路琉璃河镇以北的道路和桥梁进行维修,要保证交通通畅。

北京市建设局所属道路工程事务所和养路工程事务所,于 4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突击修整该段道路和桥梁。

施工期间,由于桥梁的结构比较复杂,特对沿线桥梁进行技术状况调查。其中琉璃河桥技术状况如下:

该桥为 11 孔联拱石桥,跨琉璃河上,南



琉璃河石桥桥面

北走向,西侧为上游。桥栏杆为节间式石栏杆,其中有多处用手工青砖补砌代替石件。桥面全部用石板铺砌,纵坡度有所变形,桥面总体尚属平整,车辙沟普遍较深。上部构造完整,半圆形拱碇稍有变形,尚属坚固。桥身侧墙和桥墩翼墙墙面不够平整,属年久变形,基本稳定。桥台为带燕翅形,结构稳固,燕翅墙的上部有局部石板松动。桥墩主体结构稳固,上游端有分水尖,分水体上顶的石板多有松动,墩属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桥南头至琉璃河镇有石板道,路面高低不平,石桥北头无石板道。桥梁全长约167公尺,桥身长约146.50公尺,南北桥墩各长约10公尺,桥宽约11公尺。桥北段西侧第三墩前面有一根方形铸铁长柱斜倚在桥上。

请琉璃河镇政府协助调查,镇政府热情接待、积极协助。组织当地年长农民座谈,据介绍,“卢沟桥事变”以前,琉璃河大桥的北头两边各有一通石碑,桥南东侧也有一通石碑,碑上记修琉璃河大桥的事。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宛平县城,又占领长辛店。中国军队在琉璃河南岸及桥头筑起碉堡,将琉璃河大桥上的石栏杆放倒在桥面上,将桥头立的三通石碑也都放倒,平放在地上。还把铁路上的钢桥炸坏一孔。

日本鬼子占领琉璃河镇以后,鬼子兵抓民夫将琉璃河大桥上的石栏杆重新立起来。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天,美国飞机开始沿铁路线轰炸桥梁,射击火车头。于是日本鬼子抓民夫在琉璃河火车站以南、以北的岔道两边筑起大墙,遇有空袭时,将火车头开进两道大墙之间。修筑大墙用的石料是拆除河岸上的旧碉堡和琉璃河桥上的石栏杆,以及桥以南石板道的石料。当时老百姓怕鬼子把石碑破坏,于是把石碑都扔到河里。

日本投降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河北省公路局整修京保公路,在琉璃河一带农民的配合下,拆除火车头防空墙。将其中基本完整的桥栏杆石件运回琉璃河桥

上,又用旧石料配制一部分桥栏杆石件,将琉璃河桥的栏杆重新修复。

1948年10月,驻琉璃河镇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前,将琉璃河大桥的桥面石板掀起多处,在桥头路上挖出几道壕沟,以阻止解放军行军。

国民党军队撤退后不久,据说是华北人民政府来的干部,组织本镇上的民众将琉璃河大桥修复通车。

1949年夏天,(河北)省里派来的修路工人,整修过公路和桥梁。

1950年9月初,北京市建设局与河北省公路局商定,在京保公路上的养护分界线改为北岗洼村村南。

是年9月中旬,政务院命北京市将京保公路北段(琉璃河镇至北岗洼村)按照北京市的市政道路、桥梁进行养护。此后,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对此段道路和桥梁进行养护。

1952年初,据说是政务院有计划调整北京市的边界,河北省交通厅邀请北京市建设局商量关于京保公路养护分界点的问题,又将分界点改定在忙牛河桥以南100公尺处。从此,琉璃河桥由河北省公路局养护与管理。

1958年国务院决定将北京市周围的良乡、房山等9个县划归北京市,将河北省通州专区公路局并入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原建设局)道路管理处。从此琉璃河桥正式纳入北京市的市政桥梁养护与管理。

由于琉璃河桥从前属于省管桥梁,其技术档案应在河北省交通厅或公路局。为建立琉璃河桥等设施的技术档案,由许林生、孔庆普前去河北省公路局查阅京保公路挟河桥及其以北的路桥资料。

据公路局有关人员介绍,挟河桥、琉璃河桥、小清河桥、卢沟桥属于省管桥梁,其技术资料,除小清河桥有一部分资料外,其余桥梁均无专业技术资料,只有一些养护记录。

又据许林生(原通州专区公路局工程师)介绍,京保公路北段(挟河桥以北至北

京广安门外大井村)上的桥梁,除属于省管的4座桥梁外,其余桥梁均属通专公路局管,都不曾建立过桥梁技术档案。通专公路局成立以后决定对公路实施计划养护和管理,即开始安排计划对道路、桥梁及其附属建筑物进行调查并建立专业技术档案,由于技术人员缺少,首先需培训技术人员,所以设施调查工作仅将路面调查做完大部分,桥梁调查尚未开展。

日本投降以前,京保公路上的桥梁养护资料未查阅过。日本投降以后,京保公路及其沿线桥梁,均未做过较大的工程,每年只是进行例行保养。

据说是在1948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将琉璃河桥桥面局部破坏,琉璃河镇解放以后,据说是当地政府组织民众将其修理通车。

1949年从4月开始,由河北省公路局对京汉公路(北京至汉口)分段进行整修,大概是到7月底,将安阳县以北的路面和桥梁进行一次一般性整修。

1950年4月,河北省接政务院命令,将京保公路北段(琉璃河镇以北)由北京市进行整修后代为养护。

1951年底或1951年初,北京市和河北省划定京保公路养护分界线为哑巴河村,此后,琉璃河桥又归河北省养护。

1952到1957年其间,河北省公路局曾维修过此段公路,大概是在1952年9月,修理过琉璃河桥桥栏杆,将以前用砖补修的部位拆去,用石料将其修理完整。

二、琉璃河桥纳入北京市 市政设施养护

1958年良乡县、房山县相继划入北京市以后,琉璃河桥正式属于北京市的市政桥梁。

1958年11月下旬至1959年2月上旬,由公社组织各生产队疏浚琉璃河。北京市道路管理处于1959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实施琉璃河桥维修工程。其主要工程项

目摘要如下:

(一)桥基及海漫维修工程

琉璃河清淤工程,由沿河各生产队分段施工,靠近琉璃河桥的河段,于1958年12月初开始,次年1月中旬基本完成(未验收)。疏浚工程主要是在大河道中挖出一条子河,石桥上下游的子河正对桥的北起第六、七、八孔。

道路管理处为维修石桥,将桥区内其余8孔范围的淤泥清除,上下游挖至露出桥墩及燕翅墙底部。

清淤施工中,在南桥台两边的燕翅墙前发现两只石雕镇水兽,南台燕翅墙上正缺少镇水兽,于是将此二兽安放在燕翅墙上。

在北边孔内及其下游处,挖出两个基本完整的石碑,未找到碑首和碑座。其一是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立的修琉璃河桥堤碑,另一碑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立的修琉璃河桥碑。在南边孔下游挖出两段石碑,两段碑石均为碑身段,但不是相连段,未找到碑座。在下游河床中挖出十多根桥栏杆望柱和多块石栏板。其中有十数件较为完整,遂用以替换桥上损坏较严重的栏杆石件。

道路管理处副主任王忠(原通州专区公路局局长)命施工人员在石桥东北角和东南角河岸上各砌一个石台,将石碑平放在石台上。

由道路工程管理处干部(报社通讯员)何宗(何基沔之子),将挖出修琉璃河桥石碑的事投稿给北京日报。

文化部文物局文物管理处看到此消息后,派人到现场将碑文拓印下来。

桥区清淤完成后,露出桥基和桥下海漫,桥基和海漫是用石板铺砌成的整体平台,第二、三、四、六、八、九孔内的海漫石板,均有局部高低不平,遂将第八孔内的石板掀起四块,发现下面还有石板,下面的石板很稳固。为保护原有结构,未做深入探查。于是采用水冲方法,将全部石板接缝中的泥沙冲出,用水泥砂浆将石缝灌实。对子河中露

出的海漫也做同样处理。

(二) 修理桥台、桥墩

桥台构造基本完整,仅做勾缝维护,桥墩的两端多有损坏,将其松动的石板采取归安稳定处理,缺少石板处,利用旧石料配制,将其砌筑完整。

施工中发现,各桥墩两端内部石板的联结铁件有所不同,有几个桥墩,在石板的对接缝上只嵌有银锭铁。有的桥墩,其石板接缝上除嵌有银锭铁外,在上下两层石板之间还竖置枣核形铸铁小柱。

(三) 整修驳岸石墙

驳岸石墙的倾斜处和石板松动处,采取归安和重砌办法进行修理,拆开后发现各层石板对接缝上的银锭铁不完整,对缺少铁件处未做补充,于是用水泥砂浆将其砌筑坚固。其外端部上顶缺少一部分石板,因无适当石料而未做补砌。驳岸石墙的后面有城砖加强墙。

(四) 全桥维护

将桥面的旧沥青面层修补后,又加铺一层沥青面层。

将全桥石料的对接缝,用水泥砂浆勾抹平整。

在石桥四角道路边沟的出口处,各砌筑一个水簸箕。

三、桥梁测绘

此次修桥期间,对琉璃河桥再一次进行调查,并进行测绘,桥梁状况及主要数据如下:

(一) 桥梁技术状况

(1) 桥栏杆:桥栏杆为节间式石栏杆,每侧栏杆有望柱 88 根,栏板 87 块,两端各有一块抱鼓石。栏杆石件虽不缺件,石件多有损残。望柱柱身为方形,柱头为平顶方形。栏板为实体重力式板。

(2) 地伏与金边:地伏的断面为矩形,地伏后退于金边约 10 公分。金边由单层仰天石组成,金边对侧墙、翼墙外出檐 13 至 15 公分。

(3) 桥面:桥面全部用条形石板铺砌,上面铺有沥青面层,石板的接缝已显露于沥青面上。

(4) 侧墙与翼墙:桥身侧墙与桥墩翼墙,是由条形石板砌筑而成的整体构造,石料规格及砌筑分层不整齐,墙面多处明显看出有变形。

(5) 拱碇:拱碇均为纵联式结构,均由 14 道碇石和 1 道龙门碇石构成,拱碇的矢高接近于其拱脚处跨径之半,其碇型应属半圆拱。各孔拱碇中,都有一部分碇石的规格不一致,多数拱碇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形。

碇石的外端面为碇脸,于其外缘做出拱眉线,拱眉凸出约 3 公分,拱眉与侧墙齐平。中 3 孔的碇脸龙门上各有一个石雕龙头。

(6) 桥台与桥墩:桥台属于带燕翅型,结构完整,基本稳固。修理后,四角的燕翅墙上各恢复一只石雕镇水兽。桥墩为等厚实体构造,其上游端为尖形,俗称分水尖,下游端为方形凤凰台。桥墩修理后基本稳固。

(7) 桥基与海漫:桥区内的海漫与桥基为同一石板平台,海漫石板仍有多处高低不平。桥区以外的上下游也有石板海漫,其上面与桥区的海漫为平面相接,有局部石板不够平整,其下游边沿已破损。

(8) 附属建筑物:四角燕翅墙以外均有石砌驳岸墙,四处石墙尚有半数以上的墙段外倾,处理后已基本稳固,近端部的上顶仍缺少一部分石板。石墙背后有城砖加强墙。

(9) 镇水铁杵:在石桥西侧北起第三墩前,斜倚在桥上的镇水铁杵依然稳固无位移。实属一根铸铁方形柱,其断面略呈矩形,厚度约 25 公分,宽约 30 公分,全长约 11.8 公尺,其下端插入一块方形石板中,其上端为环形。据当地年长农民说,镇水铁柱上,从前还曾系有一根铁链。经查看,柱端的圆孔内确有磨损的痕迹。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琉璃河石桥之右有铁竿倚焉,

自扶栏至水底,约五丈。

(二) 实测数据

桥长与桥宽:桥梁全长 166.90 公尺,其中桥身长 146.70 公尺,南北桥堍长度相等,均为 10.1 公尺。

桥面全宽是指两侧金边之间的距离,由于桥身侧墙的墙面有所变形,因而桥面净宽南北稍有出入,桥梁中部的桥面全宽为 11.05 公尺,桥身北端宽 10.79 公尺,南端宽 10.9 公尺。从桥下测量桥身的宽度,基本接近于 10.4 公尺。

桥梁的净跨径,按照明代的建桥规矩,应该是中孔的跨径最大,向桥的两端逐孔对称递减,该桥的跨径不符合此规律。

桥墩的厚度不完全相同,按照明代的建桥规矩,桥墩的厚度,或全桥一致,或中孔的两墩较厚,向桥的两端,逐墩依次减小。该桥的墩厚也不符合此规律。

桥墩的长度也不完全相同,多数墩长约 16.9 公尺,其主体长 10.4 公尺,墩尾长 3.24 公尺,前端(分水体)长约 3.26 公尺。其中第六墩全长约 14.7 公尺,其墩尾长仅 1.43 公尺,前部的分水体长约 2.85 公尺。

(三) 实测资料分析

关于桥面:明代石拱桥的桥面纵断面竖曲线应为正圆弧形。该桥的桥面纵坡度略呈波浪形,明显是属于桥墩不均匀沉降所致,建桥时不可能将桥面建成波浪形。

根据各孔拱顶以上至金边线的距离,有大有小的现象分析判断,当初建桥时,多次被水毁而重修,造成拱顶的高程难以按规律实现,不得不用拱顶至金边线的距离做调整,以求桥面的纵坡尽量平缓。

关于桥梁跨径:当初建桥时的定线,必然是按照建桥规律实施。该桥跨径的现状

则无此规律,其原因与桥墩的厚度有关,由于桥墩的厚度有小有大,因而影响桥孔的净跨径。如此现象,说明当初建桥时,曾多次被水毁而抢修之艰苦。此状况与碑文和史书中的记载完全相符。

四、琉璃河桥改由公路处养护管理

1960 年底,道路管理处一分为二,成立市政工程管理处和公路管理处。市政处负责市区(城近郊区)市政设施管理,公路处负责远郊区县的道路、桥梁管理。此后,琉璃河桥则属公路处养护与管理。

1966 年 5 月,公路处实施琉璃河桥中修工程。主要包括:翻修桥面沥青面层;更换桥栏杆,凡是有损残的望柱和栏板全部将其更换;桥下清淤;修理驳岸石墙。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8 月中旬“破四旧”开始。由良乡县的“红卫兵”(可能是中学生)将倚在琉璃河桥旁的镇水铁柱运走,据说是运到良乡炼铁厂将其熔化。

1974 年汛前疏浚河道时,发现镇水铁柱的下端与其基石还在河床中。

进入 80 年代以后,琉璃河桥上通过的车辆逐年增多,因而桥栏杆经常被撞坏,由于当时已不再实行计划养护,缺少资金,不能用石料及时将其修理,遂用混凝土代替石料修补。

1984 年 5 月 20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琉璃河桥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0 年 10 月,在琉璃河桥的西侧建成一座混凝土大桥。从此,琉璃河桥则由公路桥梁改为文物桥。

(作者为北京市政局退休干部)

清末民国国家体制的转型

与北京寺庙历史变迁

——以北京外城西部寺庙为例

何岩巍

清代,儒释道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三种主要信仰,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十分紧密。清王朝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基础,儒教成为清政权的国教,尊天成为帝国礼仪的重要部分。《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规定了国家的祭祀等级,清初时圜丘、方泽社稷为大祀,最为皇帝重视。从皇太极以至光绪,各帝共亲诣祭天304次。当时的天坛地位十分重要,礼部《太常寺则例》称:“天坛内不许放鹰、打枪、饮酒、嬉戏……并不许无事人员进坛游玩。由太常寺派员前往稽查。以昭敬谨。”于敏中编纂的《日下旧闻考》收录前朝及清朝的许多文献,对京师天坛的建制沿革、主要建筑物及皇帝祭天仪式的程序介绍颇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坛作为国家宗教的祭祀场所在清代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①。其时清帝不仅相信国运天赐,而且非常重视天人感应,对咎征^②甚为恐惧,遇到大旱时,皇帝往往要亲临天坛祈雨,以表示自己的虔诚。如康熙十八年时曾下谕旨给礼部称“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应于上,接如影响,岂曰罔稽。”^③与此同时,清王朝也很重视对有利于其统治的诸神祭祀,文昌帝君、关帝等皆为清帝崇祀^④。对于佛道二教,清政权认为他们虽不是治国之道,但还有补于世,因此采取了对二教限制、利用的政策^⑤。这是因为清政府虽然尊崇儒教,但官方儒教与佛道及民间信仰之间具有传统社会的内在相通性。一方面,佛道教在清代时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亦吸收了各种民间信仰的神灵,在官方与民间二者的互动之中,北京城内寺庙呈现出复杂状况。1906年京师警察厅的一份《清末北京外城寺庙调查表》^⑥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清代末期北京寺庙的珍贵资料。笔者认真阅读了这份调查表,得出以下结论:

1. 很难将各类寺庙和儒释道三教恰当的一一对应。首先,佛教僧人住持的庙宇种类繁多,祭祀神灵也十分庞杂;其次,道教的影响似乎不应估计过高,据笔者统计,在这份调查表中记录的两百座寺庙里,住持为道士的仅26座,僧尼为住持的寺庙有110座。

同时,名为“庵”的庙宇不一定住持为尼。这一切均说明晚清佛教受民间影响之大以及戒律的松弛化。

2. 关帝、观音类寺庙数量最多。在这份登记表收录的两百座寺庙中,各类崇祀关帝的庙宇达 27 座,崇祀观音的寺庙有 19 座,分别占第一、第二位。

以上结论虽然来自于北京外城西部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清代末期北京寺庙的基本状况。这是因为北京内外城的寺庙分布状况在近代逐渐趋同^⑦。关帝、文昌帝君都是清政府大力宣扬的神灵,而崇祀这些神灵的庙宇由僧人或道士为住持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官方儒教与佛道思想是相互依存的。为什么官方儒教不可能彻底摒弃佛道教及民间信仰的影响呢?韦伯对此作出了解释:“不管儒教如何贬低道教,当他面对巫术的宇宙观时,同样显得束手无策。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使得儒教徒无法从内心深处根除道教徒基本的、纯巫术式的观念。对巫术的任何触犯,只会危及儒教本身的威力。一位士人对试图触犯巫术的动议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应该结束这种胡说八道,他说:‘当皇帝不再相信征兆预示而为所欲为时,谁还能阻挡得了他呢?’”^⑧。正是因为二者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才形成了清代北京寺庙的繁盛景象。

20 世纪前期清王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由一传统朝代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体制的转型使中国国家政权的立法理念由君权神授转向主权在民^⑨。国家立法基础的转变使儒教的神圣地位彻底动摇,其间虽有人屡次提倡孔教立国,但到 1928 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时,三民主义已确立为国家新的立法基础。在此背景下,清代官方崇祀庙宇已由神圣的祭祀空间转变为文物古迹。当时的内政部设坛庙管理所对北平坛庙实施管理,据 1934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天坛分内外两坛,外坛为实业部模范林场,种植松柏榆槐等树,培植树苗出售,内坛包括圜丘及祈谷两坛,祈年殿在祈谷坛之上,内坛之地出租,熟田

每亩租金三元五角,每年可得租金七百元,内有菜园七十亩,余皆种植五谷,共有租户十五,游览门票每人三角”^⑩。由此可见,天坛在清代的神圣地位已经彻底丧失。除天坛外,清代的官方祭祀庙宇有的成了公园(如社稷坛改为中山公园),有的成了中学(如夕月坛被坛庙管理所出租给宏达中学)。

除国家崇祀庙宇外,北京外城的其它寺庙也随着国家的转型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清代到民国,国家政权对于佛道信仰的政策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在清代,国家政权并不关心宗教对于一般民众的信仰意义,其宗教政策完全从维护其统治出发^⑪。虽然清代帝王出于统治需要对佛道教的发展有所限制,但是佛道教信徒们还是千方百计的让自己的理念能和官方宣传保持一致,以便获得政府的支持。如《藏外道书》中收录了顺治所作《劝善要言序》^⑫。这说明在传统社会中非正统的佛道教力求向官方靠拢的一种努力。同时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正统与非正统思想在传统社会中的互动。民国以后,政府在立法上以民为上,特别是在三民主义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以后,宗教成为个人信仰,不仅儒教的作用基本丧失,佛道二教也逐渐被边缘化。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为推进其倡导的国民革命,先后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寺庙登记条令》、《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限制宗教团体设立学校训令》等政策。现以 1929 年《寺庙管理条例》^⑬为例做一说明。该条例第四条称:寺庙僧道有破坏清规、违反党治及妨害善良风俗者,得有该管市县呈报直辖上级政府转报内政部核准后,以命令废止或解散之。第五条则称:寺庙废止或解散时,应将所有财产移归该管市县或地方公共团体保管,并得酌量地方情形,呈准兴办各项公益事业。更有甚者,当时的北平市政府训令^⑭第三条竟称:佛教会仅属关于宗教之文化团体,不得谓为地方公共团体;第四条更称:荒废之寺庙既无地方自治团体受理,其财产如为私人占有,应由该管地方官署本其监督职权收回。国民政府通过上述这些政

策对各类宗教团体进行整顿,一方面对之实行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以兴办学校为名,剥夺庙产。国民政府对于寺庙的政策可见一斑。在这种形势下,北京的寺庙数量相比于清代大大减少。据《清末北京外城寺庙调查表》和《北京外城寺庙历史资料》^⑤中《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⑥进行统计,外城西城1906年有243座寺庙(其中包括《清末北京外城寺庙调查表》漏载的43座寺庙),1928年时这一数字已减少到157座。现将这些废弃的寺庙列举如下:

外二区

真武庙(车辇胡同)、七圣祠(三府菜园,住持人李茂看庙)、三官庙(余家胡同,住持人俞成宗,家庙)、土地祠(厂甸,江禹臣管理,铺户二)、关帝庙(永光寺街)、娘娘庙(娘娘庙夹道,住持人瑞观,僧人)、五圣祠(西河沿)、关帝庙(赶驴市,住持人于秦信,道士)、土地庙(蔡家胡同,住持人蒋兆祺,道士)、观音阁(牟俸管理,住户一,铺户二十五)、五圣祠(成瑞林看庙,住户一)、天龙寺(抬头庵,住持人明亮,僧人,住户四,铺户五)、玉皇庙(王锡珍,道士,铺户十)、李姓家庙(椿树下三条)、火祖殿(琉璃厂,住持人孙立荣,道士,住户一,铺户十三)、火神庙(李纱帽胡同西火神庙夹道,俞林之,家庙,僧人,住户三,铺户一)、天仙庵(棉花九条胡同,住持人性空,尼僧,住户二,铺户三)、仁威观(琉璃厂火神庙西,薛立荣,道士,铺户一)、永兴寺(西草厂东南柳巷,住持人海泉,铺户二)、地藏庵(西河沿排子胡同,又称白衣庵,住持人本玉,僧人,住户二,铺户十三)、马神庙(大马神庙2号,住持人瑞林,僧人,铺户二)、闻喜庵(赶驴市,赁居住户四)

外四及外五区

关帝庙(宣武门大街)、广灵观(广安门大街)、关帝庙(上斜街9号,住持人启照,僧人,赁居铺户二)、关帝庙(上斜街,赁居住户三,赁居铺户一)、关帝庙(金井胡同,赁居住户二,赁居铺户一)、关帝庙(营房东南头条)、五圣祠(东宽街)、普佛寺(张相公

庙,住持人修起,僧人)、关帝庙(达子营,住持人汪复兴,道士,赁居住户五)、三官庙(米市胡同,赁居铺户一)、伏魔寺(九间房,赁居住户一)、观音寺(盆儿胡同,秀山,尼僧,赁居铺户一)、七圣庵(樱桃园15号,住户一)、真武庙(樱桃园26号,住户一)、观音阁(南横街)、千佛寺(南横街30号,住持人永惠,赁居铺户一)、福缘庵(南堂子胡同,住持人郭守善,道士)、晋太高庙(南堂子南)、火神庙(窑台,赁居住户一)、皂君庙(东砖胡同,住持人宽亮,僧人,赁居住户六,铺户一)、四圣庙(四圣庙,赁居住户一)、地藏庙(阡儿胡同,住持人慧若,僧人,赁居住户二,铺户)、七圣庙(七圣庙胡同,赁居住户一,铺户一)、华严寺(香厂河北,住持人静养,赁居住户一,铺户三)、关帝庙(三元庵,住持人志果,僧人,赁居铺户二)、宏慈道院(灵佑宫,住持人魏明文,道士,与灵佑宫同)、天仙庵(灵佑宫,同前)、药王庙(住持人任元震,道士,赁居铺户一)、三官庙(枣林街西,住持人化尘,僧人,赁居住户二)、大悲院(法源寺前街,住持人春山,僧人,赁居住户一)、五道庙(枣林街西)、妙光阁(下斜街一茎庵后,住持人怀空,僧人)、松筠庵^⑦(达智桥40号,住持人学真,僧人)、净土寺(南老君地,住持人正果,僧人,铺户一)

根据上述材料,现将一些废弃的寺庙归类列表如下:

关帝类寺庙	9座
各类圣庙	6座
观音类寺庙	5座
土地庙	2座
火神庙	3座
真武庙	2座

由上述列举的废弃寺庙可以发现关帝庙数量的减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明清以来,在政府和民众共同倡导之下,关帝庙的修建数量与日俱增。虽然有清两百年来,关帝庙时有废弃,但是新建庙宇甚多,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关帝庙的总量维持了

一个很高的数字。但是民国以来,几乎很少建新的寺庙;这是因为关帝庙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失去了国家政权的支持是关帝庙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当然关帝信仰在一般民众中虽有所降低,但影响仍不容忽视。不过就总体而言,到1928年时关帝庙已经前所未有的衰落了。受到清代国家政权支持的其他神祠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例如火神庙、土地庙、真武庙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正统佛教寺庙数量的减少程度明显少于上述寺庙。笔者认为这与佛教信仰的相对独立性有关。时移事易,封建帝王和传统社会民众崇祀的神灵在国家转型以后,理所当然的受到新政权的抵制,甚至被视为邪神。佛教相比于中国传统信仰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信仰体系,这一点反而使佛教寺庙能够在民国时期较多地保存下来。民国时期,民间寺庙受到的冲击极大,但正统佛教寺院得以保留。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政权自清代向民国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与寺庙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不再需要寺庙的教化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寺庙被边缘化了。但在这种对寺庙的边缘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因寺庙崇祀神明的不同造成的差异。这种差异说明虽然佛教寺庙和那些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关系更加紧密的民间寺庙都在民国时期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配合官方的教化作用,变得不再重要,但是正统的佛教寺庙相比于民间寺庙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独立地位。

① 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天坛,参见该书915~943页。

② 所谓咎征,指的是那些预示着灾祸的自然现象。

③ 《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5639页。

④ 《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9819~9820页。

⑤ 具体内容可参见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124~134页,154~157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北京外城寺庙调查表》,《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

⑦ 清初,因为满清政权的民族分治政策,内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由此也影响到了寺庙的兴建。而外城地区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寺庙的兴建与分布呈现出比较自然的状态。清代后期,随着清政权对内城管理的废弛,内外城的寺庙分布也逐渐趋同。

⑧ 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226页。

⑨ 关于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请参阅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90~100页。

⑩ 《北平市坛庙调查报告(附整理办法)》,1934年5月17日。

⑪ 于本源认为清代帝王从世俗和功利的角度出发,自然不会去思考臣民的宗教需要,不会考虑人们出家为僧为道的深层原因,只了解为奸民逃税,或为营生之一术。参见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119~124页。

⑫ 《太上宝筏图说》,《藏外道书》,第27册,582页,巴蜀书社影印本。

⑬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页及第5页。

⑭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训令京第2277号,J2-7-67。

⑮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1月。

⑯ 此次登记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主持,并由北平特别市政府社会局具体负责登记工作。

⑰ 《北平寺庙概览》称其为河北会馆购置。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实习研究员)

吴佩孚与故宫三大殿

张小林

北京故宫是世界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北京市中心,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期间历经重建和改建,仍保持原有规模,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筑群。故宫造型庄重,结构严谨,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独特风格。紫禁城按功能分前朝与内廷。前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历代皇帝举行大典,召见大臣,办理政务的地方。三大殿建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体型宽阔,气势宏伟,雕梁画栋。三大殿又以太和殿最为壮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为主体,是皇帝办事和居住的场所。

民国建立之后,于1914年在紫禁城前半部成立古物陈列所。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其后,经过内战、日军侵华乃至种种天灾人祸,故宫历经沧海桑田之变,清宫所藏文物虽有部分流失,宫殿在国人殚心竭智的保护之下,基本完好,实属难能。在故宫博物院建立之前,北洋军阀政府曾经动议将参议院、众议院迁入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办公,因直系军阀吴佩孚发表电报反对,两院搬迁之议被阻止。这件事牵扯到当时的时局,也牵扯到吴佩孚的为人。

民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于1912年初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1923年,北京政府因国会会场狭小,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闻讯,立即(1923年5月20日)从洛阳发电报至京,表示强烈反对,从而阻止了国会改建三大殿。

1923年5月22日《顺天时报》刊登吴佩孚电报全文,内容如下: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总理、内务部、财政部钧鉴:

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查三殿规模闳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太和门灾,补修之费,每柱靡国帑至五万。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断断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印度已逐蒙古帝,英人已灭印度王,而施爹利,鸭加喇两地,蒙古皇帝宫殿,至今珍护,坏则修之。其勒橈各王宫至今巍然。英灭缅甸,其阿瓦金殿,庄严如故。今埃及六千年之故宫,希腊之雅典故宫,意大利之罗马故宫,至今猷在。累经百劫,灵光巍然,凡此故宫,指不胜屈。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喟,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吴佩孚:号、印。^①

吴佩孚电文发表之后,新闻界广泛报道,甚至称国会计划拆除三大殿,在原址另盖西式议院。一时间,社会舆论大哗,对北京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月26日,主持

国会迁移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致电吴佩孚，解释国会迁移三大殿的理由，称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大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

吴景濂等电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号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悖，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所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圯，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

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维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事实，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吴景濂、王家襄、张伯烈、汤漪、有。^②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于舆论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吴佩孚的电报所以能够产生如此轰动，应该从吴佩孚的为人说起。吴佩孚在中国的军阀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吴佩孚为北洋军阀著名将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由秀才投身行伍，在军中摸爬滚打，凭借军事才能和胆略突出而爬升，成为军阀。北洋军阀的鼻祖是袁世凯，继起者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冯国璋死后，段祺瑞把持北洋政府。其后，直系吴佩孚崛起。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直奉战争，吴佩孚帅军击败段祺瑞及奉系军阀张作霖，从此声誉鹊起，以能战敢言著称，成为北洋军阀领军人物，一代枭雄。当时国内外都有人对吴佩孚寄予期望。国外如美、英、日甚至苏联，国内包括北京的文化界名人如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都与吴佩孚联络。南方的政治军

事人物,寄希望于孙中山,北方则有人指望吴佩孚,甚至希望孙中山、吴佩孚联手,重振国家。

1922年~1924年为吴佩孚的极盛时期,他的权势如日中天,直隶、河南、湖北等十五省区或由他直接掌控,或惟其马首是瞻,吴佩孚也准备以武力统一中国。吴佩孚驻地洛阳实际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总长、次长及英、美、日本、苏联等国军政人物负有公开的或秘密的使命,时常现身于洛阳。1923年4月吴佩孚五十寿辰,显要人物赴中州祝寿者达五、六百人。康有为为拉拢吴佩孚支持清室复辟,亲至洛阳,并送上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吴佩孚在军阀中有不少独特之处,他以能战敢言著称,除了会打仗,还擅长造舆论,搞宣传。与其他军阀开战,他事先发电报,揭对方阴私,争舆论。有时,他也能够抓住国人关心的大题目,尤其是爱国的题目,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在报刊发表电文,言人所不敢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五四运动时期,他发电报,公开敦请段祺瑞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释放被捕的学生。吴佩孚电文称:“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可想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他说,学生“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既非为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沽誉,其心可闵,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他更表示自己“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制后盾,愿效前驱”。^③这些电文博得舆论好评,以致人们对吴佩孚反对段祺瑞寄予很大希望,甚至视其为“革命将军”。这也为他发迹奠定了政治基础。

吴佩孚虽然不同寻常,但毕竟是军阀。他自以为所向无敌,兵戈不休,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参与直皖、直奉战争,涂炭生灵及支持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均遭人诟病。尤其曹锟贿选之后,奉系、皖系及孙中山成立反直联

合战线,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军前反戈,造成直系崩溃,吴佩孚的势力也从此败落。1925年初冯玉祥占有北京,驱逐宣统皇帝溥仪出宫。国人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于同年10月10日建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至今已建立80年。

吴佩孚是封建军阀,残民以逞,争权夺势是军阀的特性。但是,军阀也可以有大局观,有民族意识,爱国情感。可以设想,如果国会迁移三大殿,三大殿不可避免会遭到毁坏。吴佩孚坚决反对国会迁移三大殿,是否有其他考虑,不得而知。但是,在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危害的关键时刻,吴佩孚的一纸电报,确实起到了他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就此而言,他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中华民族后世子孙,功莫大焉。

而曾经谋划迁移三大殿的民国第一届国会,不仅迁移之议成为一枕黄粱,自身也来日无多。国会在1923年已经失去建立之初的威信与地位,不仅内部涣散,也失去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特别是曹锟贿选之后,国会为国人所不齿,甚至有人称之为“猪仔国会”^④。1924年11月21日的《晨报》刊载《时局巨变之国会问题》称,国人对国会产生厌恶心理,“此十三年寿命无疆老灰物,断无可以存在之理”。更有政治团体致电冯玉祥,建议立即解散国会,“国会议员早失代表资格,须立时解散”。^⑤在一片“嘘”声中,第一届国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① 1923年5月22日《顺天时报》。

② 1923年5月27日《顺天时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351~355页。

④ 虽然有部分议员拒贿、拒选,但这部分人势单力孤,无力阻止贿选的发生,也无法改变国会在人们心目中堕落的形象。

⑤ 1924年10月28日《申报》,《国民民主政会致冯玉祥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四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10 月 9 日 “西山银杏节”在大觉寺开幕。

10 月 10 日 - 20 日 市文物局组织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六个区县文委对长城进行安全执法大检查。此次检查旨在了解各区县执行《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情况,了解各区县在长城保护、安全执法等问题上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并交流经验,促进我市长城保护管理工作。这次安全大检查是近年来我市规模最大、力度最大的一次对长城的执法检查。

10 月 11 日 张茅副市长视察大高玄殿、皇史宬、崇礼住宅、孚王府、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和宁郡王府等部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梅局长的陪同下,详细了解了文物保护单位的占用情况,并对一些安全隐患提出了整改要求。

10 月 11 日 白塔寺意珠心境殿“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改陈工程开工。

辽金城垣博物馆石刻展区改造工程全面开工。

10 月 12 日 北京市政协委员参观智

化寺和老舍纪念馆。

10 月 13 日 “北京地区非文物系统文物收藏单位建档备案工作研讨会”在北京文博大厦 16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共同组织。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雍和宫等 20 余家博物馆的馆长和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对非文物系统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文物建档备案工作现状、文物建档备案工作中的困难与问题及“十一五”期间开展文物建档备案工作应采取的措施与方法进行了研讨。

10 月 20 日 - 31 日 《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在北京文博网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10 月 25 日 正阳门城楼、箭楼修缮工程正式启动。本次修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也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修缮项目之一。工程投资 900 余万元,修缮项目包括:箭楼加固和局部修缮、城楼墙体裂缝处理、恢复城楼平台地面、重做彩画等。

10 月 25 日 - 26 日 “北京市区县文物文物保护管理培训班”在大觉寺培训中心举办。

10月28日 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举办的“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正式开幕。

10月份 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的戒台寺消防水工程顺利完工并通过验收。该工程总投资318万元人民币,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更新戒台寺消防管网及消火栓、新建消防水池等。经过测试,完工后的消防水系统完全满足戒台寺的消防需求。

10月份 在“2001-2004年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评”工作中,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推出的“考古小奇兵”科普系列活动被评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优秀活动。

11月14日-16日 由市文物局主办,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承办的“部分地区汉墓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在和敬公主府宾馆举行。北京、山东、广东、河南、江苏、湖南六省市共10家汉墓博物馆的馆长及业务骨干参加了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的召开,意在为全国汉墓博物馆之间的业务交流提供平台,共同推进汉墓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11月18日 张茅副市长视察了首博新馆多媒体视听室及瓷器厅、佛造像厅、文玩厅等七个展厅的布展情况,观看了高清晰数字电影《辉煌的北京》,并对安全、展陈、服务等工作做出指示。

11月22日 市文物局会同东城、西城和海淀区政府对大高玄殿、孚王府、崇礼住宅、皇史宬、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宁郡王府、万寿寺东路等7家文物保护单位的18个管理使用单位的负责人进行了《文物保护法》教育,并当场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11月29日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北京市文物局和徐悲鸿纪念馆共同举办的、“纪念徐悲鸿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暨大型画集《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1月份 经北京市博物馆资格评审委员会实地考察,批准成立了“北京百工博物馆”和“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北京百工

博物馆”是在北京京城百工坊的基础上筹建而成,是一个主要以保护、传承、展示传统技艺为主的博物馆。“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则是在长椿寺的基础上建立,主要展示宣南地区文化的博物馆。

11月份 对正在申办的“德隆佑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老爷车博物馆”再次进行实地考察,对两个博物馆的布展、筹办等做出指导。

12月1日 召开全市文物系统落实《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暨2006年元旦春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使用单位及市文物局局属单位的主管领导100余人参加了动员大会。会议对全市文物系统2006年元旦春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动员,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12月8日 会同东城区、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召开了古观象台、陈独秀旧居、嵩祝寺及智珠寺、法国邮政局旧址、原中法大学、南新仓、地安门西大街153号四合院、雪池冰窖、拈花寺等9家文物保护单位的11家管理使用单位参加的文物法宣讲大会,宣读并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2006年北京地区博物馆通票》首发式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2006年《通票》自12月中旬起在各大邮政支局、纸老虎连锁书店开始进行销售。

12月9日 在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的带领下,国家文物局中心组成员及业务处室相关人员一行百余人来到首博新馆视察。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舒小峰、于平、刚杰副局长陪同。

12月15日 由张茅副市长主持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外国驻华使节新年招待会”在首博新馆礼仪大厅举行,王岐山市长到会并致辞。首博新馆为参加招待会的12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举办了参观专场。

12月16日 由市文物局主办、北京文博交流馆承办的“智化寺历史文化展”在北京古刹智化寺内开幕。

接受由北京市发改委组织的联合验收组对我局网上审批项目的验收并顺利通过。

12月18日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一家及使馆人员一行15人到首博新馆参观访问。

12月20日 与市规委联合印发北京市第五批6项、第六批51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说明及图纸的通知。

12月21日 全市文物系统工作总结会在首博新馆多功能厅举行,北京市副市长张茅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全面总结了2005年全市文物工作情况,并对2006年的工作做出部署。

12月23日 纪念胡絮青诞辰100周年,暨画作捐献仪式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其家属从胡絮青生前创作的作品中选出67幅精品捐献给老舍纪念馆。

12月27日 召开2005年度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工作会议。各区县文委,各文物建筑设计、施工企业,以及部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副司长柴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12月28日 《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的撰写工作完成。

12月29日 向全市各区县文委发放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警示标志12000份,这些标志由各区县文委下发给全市近900处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使用单位。

12月31日 梅宁华局长和四位副局长分别带队对我市部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旦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12月31日 文化部公布了“关于公示第一批国家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智化寺京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部分名录。

12月份 下发《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局属博物馆开展经营性活动的管理规定》,对局属博物馆的各类经营性活动进行规范。

12月份 组织首都博物馆、市文物研

究所、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石刻艺术博物馆、文博交流馆等六家单位完成《北京市“十一五”期间文物保护领域科技需求调研报告》并上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2月份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工艺品卷》脱稿,交送北京出版社,至此,《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全套17卷编写工作全部完成。同时大系的《精选本》也已全部编写完毕,交送出版社审核。

12月份 《北京文物》报复刊。《北京文物》报是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局图书资料中心承办的内部刊物,内容主要介绍、宣传北京地区的文物研究成果及文物工作动态信息,反映在文物、考古、博物馆、史地、古建筑、民俗等领域里的新发现、新观点。

4季度 局属博物馆多语种语音导览机和导览册制作前期的文字翻译、编辑基本完成,转入录音阶段。

4季度 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家单位联合推出巡回展览。

年内 列入今年市政府“实事”和“折子工程”的项目全部完成。

年内 配合奥运场馆建设,先期对五棵松篮球馆、国家体育场、新奥公司体育场配套工程、国家体育馆、奥林匹克会议中心、数字北京大厦、奥运村工程、奥运一期工程等8处奥运场馆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勘探面积达110余万平方米,发掘清理古墓葬450余处,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年内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考古勘探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全线勘探面积达到272万平方米,发现文化遗址和墓葬12处。部分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启动。

年内 完成了1-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的制订工作。

年内 完成了第六批53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项目的编制和上报。

年内 对6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两次巡视检查,对8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抽查,共查出问题和隐患200

余处,已责令有关部门进行整改。

年内 查处文物违法违章案件 20 起,行政罚款 10.5 万元。

年内 文物艺术品拍卖交易额再创新

高,全市各大拍卖公司举行大小拍卖会共计 137 场次(不含专场),拍卖标的 71285 件套,拍卖成交额达到 91.6 亿元人民币。

2005 年第四季度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 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30163	16507	13656	15000	13000
大觉寺	42221	30843	11378	1136	5696
正阳门	闭馆				
徐悲鸿纪念馆	10053	2193	7860	985	3092
智化寺	3467	835	2632	32	1219
辽金馆	2741	1285	1456	241	1038
西周馆	347	258	89	32	168
北京艺术博物馆	20480	15630	4850	880	4500
团城	4683	3662	1021	2001	605
大葆台	10640	2860	7780	3243	1757
大钟寺	15376	11451	3925	2132	1113
古建馆	13868	11748	2120	0	2120
白塔寺	24975	6212	18763	731	10413
老舍纪念馆	8218	2737	5481	1183	1849
德胜门	56506	53806	2700	812	1888
石刻馆	6833	6131	702	213	702

(上接第 19 页)

做好先期地下文物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重点做好规划市区的城市考古调查、勘探和清理发掘工作。继续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工程做好沿线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确保工程顺利进展。落实金陵遗址的考古清理发掘的成果研究。做好毛家湾瓷器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7. 加强规范和引导,进一步扶持文物市场的发展。继续加大扶持和指导力度,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引导文物市场健康发展。对文物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规律进行深层次调研,形成有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用以指导今后文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从近几年文物拍卖市场的发展趋势看,明年拍卖成交额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8. 切实加强文博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

机制,完善学习制度,加强组织建设,全面提高文物系统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一是紧紧围绕北京市文物工作的发展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为主线,以首博新馆为重点,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实施人才战略,广泛吸引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二是继续抓好和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举办新进局人员业务培训班,党政领导干部业务培训班;开展公务员任职培训;继续与高校联合,举办内容丰富的专业培训;分类办好文委主任、文管所长、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同时,为迎接奥运,全面启动博物馆工作人员培训工作。三是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完善各项廉政制度,加强对文博工程招投标的监察力度,为文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供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2006. 1/ 张展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3

ISBN 7-5402-1754-5

I. 北… II. 张… III. 文物工作-北京市-丛刊

IV. G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523 号

北京文博(2006 * 1)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定价: 10 元

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

(续五)

北顶娘娘庙

- 年代：明
- 说明：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五顶八庙”之一。是北京城中轴线北延长线一个坐标，有着重要的文物保护价值。对北京城市规划发展是重要的历史实物。
- 地址：朝阳区亚运村西



山门背面



前殿

无碍禅师塔

- 年代：元
- 说明：建于至元九年（1272年）。塔六面形，通高10米，塔身六面向内凹进，转角处磨砖凸起，形似框柱。塔身以上为密檐六层。全塔造型和谐大方，刻工简练生动，基本保留原建筑的原貌。是研究金元时期建筑的可贵实物资料。
- 地址：大兴区于堡乡里河村



无碍禅师塔



ISBN 7-5402-1754-5



9 787540 217549 >

定价: 10 元

